

清华校友通讯

二〇二五
秋季号
复一〇三期

103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103

清华校友通讯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二〇二五
秋季号

清华校友总会



传播母校信息
报道校友业绩
联络校友感情
弘扬清华精神

ISSN 1006-7663



刊 址 清华大学新林院 7 号
电 话 010-62792246
邮 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 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定 价 20 元

CN 10-1674/G4
ISSN 1006-7663



▲ 苏世民书院院长、公管学院教授薛澜，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总工程师张作义获第十一届“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



▲ 国际著名统计学家刘军（右2）全职加盟清华



▲ 清华大学数据科学交叉研究院成立



◀ 清华学生超算团队获得2025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总冠军



▲ 清华火神队夺得2025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冠军



◀ 首届“移动友谊杯”全英华人高校校友网球赛落幕



▲ 北欧校友会首届年会举行



▲ 日本校友会组织水上运动



▶ 奥地利校友会接待母校学生暑期实践支队



▲ 2025西雅图清北校友夏日聚会活动举行



清华师生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清华师生深度参与九三阅兵，并以丰富多彩活动纪念抗战胜利。本刊选取部分活动图片展示，以志纪念。



▲ 参加九三阅兵广场合唱团的清华大学师生合影



▲ “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清华”专题展开幕
(匡林华 摄)



▲ 清华大学师生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师生座谈会召开



▲ 参加九三阅兵的清华大学部分学生志愿者合影



清华师生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



▲ 校党委副书记许庆红（右2）带队看望抗战老同志孙启元（中）



▲ 校友总会副会长吉俊民（右2）、上海校友会秘书长韩威（左1）看望105岁抗战老兵夏世铎学长（左2）



▲ 美术学院何洁教授团队设计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标识



▲ 美术学院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创作了五件大型主题雕塑，时任院长马赛为项目总负责人。图为由马天羽教授、宿志鹏副研究员创作，朱全俊、刘志、王成伟等制作的雕塑《一二·九运动》



▲ 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宿志鹏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创作的雕塑《号兵》



▲ 美术学院教授陈辉创作，朱全俊、刘志、王成伟、邱慕冰、范晓辰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制作的雕塑《我要去延安》

2025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举行

6月21日上午，清华大学2025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举行，3551人被授予学士学位。



▲ 校党委书记邱勇为本科毕业同学颁发学位证书



▲ 校友代表张剑辉在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言



▲ 来，毕业合个影



▲ 你好，未来



▼ 我们要飞得更高

2025 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

6月22日上午，清华大学2025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5133人被授予硕士学位、2001人被授予博士学位。



▲ 校长李路明为研究生毕业同学颁发学位证书



▲ 校友代表杨光军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言



▲ 再见了，母校！



▲ 梦想，启航

► 我们将踏上新的征途





◀ 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举行



▲ 物理系党委书记肖志刚（右1）一行看望朱高峰院士（中）



▲ 物理系党委副书记张卫华（右2）一行看望钱绍钧院士（中）

► 清华大学2025届本科毕业生校友年级理事聘任会议举行



▲ 第六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举行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石家庄校友会开展七一走进西柏坡活动



▲ 深圳清华校友迎新日活动举行



▲ 江西校友会2025送新座谈会举行



▲ 安徽校友会开展党建研学活动



▲ 内蒙古自治区清华大学校友会注册成立大会举行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海南校友会2025年送新生座谈会举行



◀ 四川成都校友会2025迎新送新会举行



▲ 洛阳校友会2025送新生座谈会举行



▲ 无锡校友会迎新活动举行



▲ 南京校友会2025年会举行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密歇根校友会举办2025夏季校友聚会



▲ 2025级天津新生与校友座谈会举行



▲ 波士顿校友会青青快船队在2025 Springfield龙舟赛中勇夺季军



▲ 美国马里兰州2025梅竹松网球团体赛落幕，清华队重夺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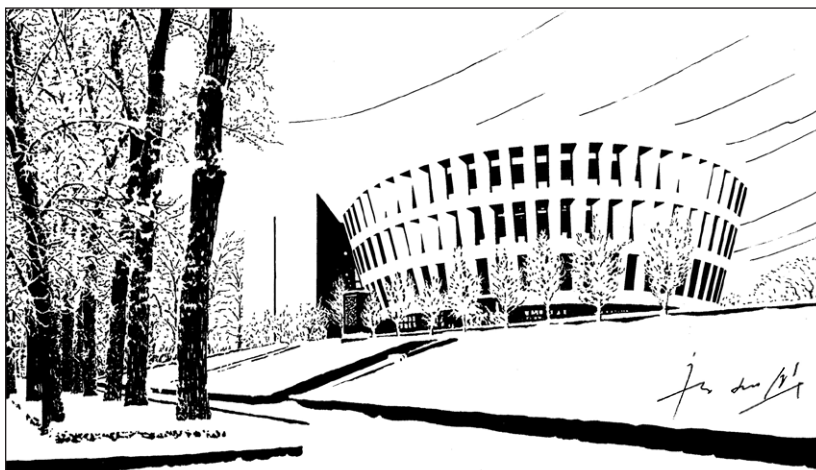


▲ 2025清华莞邑新生“学习与成长”交流会举行

清华校友通讯

二〇二五
秋季号
复一〇三期

Qinghua
Xiaoyou
Tongxun



- ◆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
- ◆纪念一二·九运动 90 周年
- ◆杨振宁、邓稼先：五十年的友谊亲如兄弟（许鹿希等）
- ◆清华人栾恩杰、庞众望，感动中国！（王晓霞）
- ◆师恩长忆，教泽永存——深切缅怀林泰教授
- ◆八载同窗，半生筑梦——清华人与二汽的生命史诗（王红珊）
- ◆与水结缘：从缺水的童年到智慧治水（黄绵松）
- ◆皆取其妙，美美与共（郭 樑）

清华校友总会 2025 年 10 月

清华校友通讯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103

复秋二
一
〇季
〇季二
三期
期号五



刊 址 清华大学新林院 7 号
邮 编 100084
电 话 010-62792246
投稿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 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国内刊号 CN 10-1674/G4
国际刊号 ISSN 1006-7663
发 行 清华校友总会
印 刷 北京精彩世纪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定 价 20 元

1934 年创刊 1980 年复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
编辑单位 《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出版单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委员会 华建敏 贾春旺 李 蒙 方惠坚 贺美英
柳斌杰 王凤生 胡显章 庄丽君 万俊人
白永毅 钱锡康 徐心坦 田 芊 周家恂
孙 哲
编辑委员会 向波涛 史宗恺 赵劲松 邱显清 刘涛雄
孙海涛 金兼斌 胡 钰 杨士强 李 军
郭 谦 王亚华

刊名题字 刘 达
名誉主编 贺美英
主 编 向波涛
常务副主编 赵劲松
执行主编 曾卓崑
副 主 编 杨 帆 黄文辉 解红岩
编 辑 李 萍 陈 禾

订阅金额 中国内地 80 元 / 年、200 元 / 3 年，港澳台 160 港币 / 年，
国外 40 美元 / 年
线上订阅 “清华人” 小程序认证校友可通过【校友服务—期刊订阅】
在线订阅



邮局汇款 收款人 清华校友总会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现场订阅 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C1903
发行电话 010-62792246

目录

Contents

今日清华

- 7 约 4000 名本科新生、9000 余名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
2025 届本科生、研究生已于 6 月底毕业 / 黄思南 杨滨华 等
- 8 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举行 / 王晓霞
- 9 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 / 李 含
- 9 国际著名统计学家刘军全职加盟清华大学 / 曲 田
- 清华之光
 - 10 法学院团队入选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 10 薛澜、张作义荣获第十一届“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
 - 10 清华学生超算团队获得 2025 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总冠军 / 计算机系
 - 10 清华火神队夺得 2025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冠军 / 自动化系

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

- 11 清华人深度参与九三阅兵 师生以丰富多彩活动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 / 宗 禾
- 12 清华大学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师生座谈会 / 曲 田 杨雪文
- 12 “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清华”专题展开幕 / 陈晓姝 薛建团
- 13 吉俊民副会长看望 105 岁抗战老兵夏世铎 / 曾卓崑
- 14 梅汝璈：“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 姚 坚（1980 级自动化）
- 18 1937：孙立人浴血苏州河 / 袁 帆（1975 级建工）
- 22 吴新之：刀光血色映高地 / 王 媛
- 26 为抗战牺牲的清华校工阎裕昌 / 郭故事
- 28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的父亲高原 / 高永云
- 33 西南联大抗战飞行员马豫实物捐赠清华 / 吴 霜
- 32 沁园春·抗战胜利八秩志 / 胡显章（1963 届精仪）

纪念一二·九运动 90 周年

- 34 姚依林同志早期革命生涯 / 《唤起全民族的抗战》编委会
- 41 杨学诚：革命青年的光辉典范 / 杨冬明 何吉林（1970 届无线电）
- 45 一二·九：父亲熊向晖革命生涯的指路明灯 / 熊 蕾

我与清华

- 52 我在非洲的足迹 / 马 绅（1965 届土木）

- 57 阅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 杨宝林（1979 级电机）
- 59 念兹在兹——回忆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滋养 / 周庆安（1996 级中文）
- 63 与水结缘：从缺水的童年到智慧治水 / 黄绵松（2001 级水利）
- 69 我画青春，也被青春画下 / 陈博贤（2011 级美院）

清芬挺秀

榜上有名

- 72 5 位清华人获得 2025 年科学探索奖 / 杨帆
- 72 3 位校友当选“2025 年度 AI 人物” / 李萍
- 73 清华人栾恩杰、庞众望，感动中国！ / 王晓霞（2018 级硕，新闻）
- 76 刘文顺：用热血与担当铸就多彩人生 / 张超
- 79 闫建斌：破译“抗癌密码”，让“救命药”不再昂贵 / 刘帆
- 81 杨光军：匠心雕琢中国“芯” / 赵铭
- 85 李俊：有些角落，需要有人去照亮 / 洛文

紫荆花开

- 89 李婧雯：在设计中雕刻自我的形状 / 曾卓崑（2003 级硕，新闻）

校友联络

- 93 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2025 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举行 / 曾卓崑
- 93 校党委书记邱勇调研校友工作 / 关悦
- 94 第六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举行 / 黄婧
- 94 清华大学 2025 年第二次院系校友工作会议举行 / 李萍

行业兴趣

- 95 先进制造专委会理事会举行 / 先进制造专委会
- 95 2025 年清华校友集成电路论坛举行 / 集成电路学院

各地校友会简讯

- 96 内蒙古自治区清华大学校友会注册成立大会举行 / 胡泊
- 96 石家庄校友会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 石家庄校友会
- 96 嘉兴清华校友会（筹）举办迎新座谈会 / 嘉兴清华校友会（筹）
- 96 2025 清华莞邑新生“学习与成长”交流会举办 / 东莞校友会
- 97 奥地利校友会接待母校学生实践支队 / 奥地利校友会
- 97 2025 年南京校友会送新活动举行 / 南京校友会
- 97 四川成都校友会举办 2025 迎新送新会 / 四川成都校友会

- 97 海南校友会举行 2025 年送新生座谈会 / 海南校友会
- 97 青岛校友会迎新送新座谈会举行 / 青岛校友会
- 98 2025 级天津新生与校友座谈会举行 / 天津校友会
- 98 江西校友会 2025 年送新座谈会举行 / 江西校友会
- 98 常州校友会 2025 年迎新送新座谈会举行 / 常州校友会
- 98 汕头校友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 / 汕头校友会

校友消息

- 92 严大凡教授从教七十周年座谈会在沪召开 / 中石大机械学院

人物剪影

- 99 杨振宁、邓稼先：五十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 许鹿希 邓志典 邓志平 邓昱友
- 105 廉洁做人、廉洁做事的楷模——朱高峰 / 刘建辉
- 108 徐心坦：将清华党组织珍贵史料留住 / 李 萍

史料一页

- 113 天津戈登道 27 号的清华抗战秘闻 / 袁 帆（1975 级建工）

怀念师友

- 119 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王大珩科学人生的清华印记 / 陈晓姝（2011 级中文）
- 124 师恩长忆，教泽永存——深切缅怀林泰教授 / 马克思主义学院
- 127 八载同窗，半生筑梦——清华人与二汽的生命史诗 / 王红珊
- 132 追忆恩师崔福斋教授 / 杜 昶（1989 级材料） 王秀梅（1996 级材料） 孔祥东（2001 级博，材料）
- 134 铸盾人生——追忆核防护科学家骆亿生的忠诚与奉献 / 物 24 班全体同学
- 137 法三同学沉痛悼念恩师李兆杰教授 / 法三全体同学
- 139 吴大年同志逝世 享年 100 岁
- 139 王念梅同志逝世 享年 96 岁
- 140 环境工程专家胡纪萃教授逝世
- 140 建筑设计大师李高岚逝世
- 141 建筑教育家俞靖芝逝世
- 141 悼念简讯

荷花池

- 143 刚毅坚卓 奋发有为——在 2025 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李路明

- 145 理解他人，实现更好的自己，贡献于所有人的共同未来
——在 2025 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 张 利
- 147 蒋南翔的精神传承与新时代启示 / 杨宜勇（1980 级机械）
- 149 皆取其妙，美美与共 / 郭 樑（1981 级电机）
- 151 《生于 1968·我的清华》作品选登 / 唐前锋（1986 级精仪）

清华真情

- 152 最爱清华图书馆 / 姚 坚（1980 级自动化）

诗词书画

- 157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 吴硕贤（1970 届建筑）
- 157 贺清华百十四华诞 / 胡 平（1970 届工化）
- 157 七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 王伯雄（1970 届精仪）
- 157 篆刻 / 王伯雄（1970 届精仪）
- 157 唐多令·清华园 / 殷惠民（1981 级物理）
- 157 入学清华六十年聚会感怀 / 姜大源（1970 届自控）
- 157 望海潮·入学六十周年感怀 / 徐友春（1970 届精仪）

回馈母校

- 158 吕大龙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仪式举行 / 基金会
- 158 孙家广院士捐赠仪式举行 / 关 悦
- 159 计算机系举行郑纬民奖学金启动仪式 / 计算机系
- 160 “清华校友—龚晓南土木工程启杰优秀大学生奖”设立 / 土木系
- 156 郝锁柱老师捐款支持《清华校友通讯》期刊工作 / 李 萍

封 面 秋染 绘画 吴冠英 设计 王 鹏

扉 页 文科图书馆 绘画 唐前锋

封 二 清华要闻

封 三 海角天涯

插 页 清华师生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2025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举行

2025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

校友联络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摄 影 李 派 孙 波 匡林华 等

设计排版 吴振鹏

约4000名本科新生、9000余名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 2025届本科生、研究生已于6月底毕业

2025年8月20日，清华园迎来约4000名“五字班”本科新生。21日上午，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举行，校党委书记邱勇为新生代表戴上了清华大学徽章，校长李路明发表讲话。

2025年，清华大学有序适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录取内地学生约3700人，覆盖全国31个省份1100多所生源中学；港澳台学生约90人；国际学生300余人，涵盖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成为学校国际生的主体。

一直以来，清华大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教育公平。2025年，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录取270余人，覆盖全国近200个县域中学，涵盖所有招生大类和书院；国家专项计划录取280余人。

围绕“为国选材、厚植强基、拔尖领军、创新未来”的人才选拔培养定位，清华大学强基计划选拔出900名优秀学子，进入致理、日新、未央、探微、行健等五个强基计划书院学习。

与此同时，学校高度重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吸引和选拔。通过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物理人才培养攀登计划、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推进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2025年共通过三个项目录取约190名学生。

近年来，清华大学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清华特色中国书院制发展。2025年，学校新成立无穹书院、紫荆书院、自强书院、水木书院，这四所书

院共迎来600余位新生。目前，清华大学已拥有15个承担本科生培养任务的书院，2025级本科生已有约56%进入书院培养。

8月28日，9000余名2025级研究生新生来到清华，其中近1900名新同学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注册报到。29日上午，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举行，邱勇为新生代表送上清华大学徽章，李路明为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

又讯 6月21日上午，清华大学2025年本科生毕业典礼在东大操场举行。副校长、教务长彭刚通报了本科生毕业及学士学位授予情况，授予3551人学士学位。邱勇宣布：经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授予10个班级“清华大学毕业生先进班集体”称号、75名同学“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340名同学“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称号。李路明发表题为“鉴往知来，智启新程”的讲话。电机系1995级校友、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剑辉作为校友代表发言。致理书院2021级本科生党杰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学位授予仪式在综合体育馆举行，校领导为毕业生逐一拨穗、授予学位并合影留念。

6月22日上午，清华大学2025年研究生毕业典礼在东大操场举行。副校长姜培学通报了2025届研究生毕业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情况，授予2001人博士学位、5133人硕士学位。邱勇宣布：经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授予111名博士毕业生“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授予84名硕士毕业生“清华大学优秀硕士毕业

生”称号。李路明发表题为“破除自我界限 树立高远格局”的讲话。电子系1999级校友，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部级工程师、设计部副部长杨光军作为校

友代表发言。能动系2020级研究生冯晨龙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随后，校领导在综合体育馆为毕业生逐一拨穗、授予学位并合影留念。（黄思南 杨滨华 刘书田 曲田）

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学术研讨会举行

9月9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大礼堂开幕。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志强，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主持开幕式。

孙春兰表示，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史，始终关联着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时代课题。一百年前，清华国学院自觉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重拾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复建以来，清华国学院心怀“国之大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践行“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探索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知识、概念、方法、命题、理论。要始终坚守“根脉”，广泛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积极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人文研究深度融合。国际儒学联合会期待与清华大学、清华国学院以及广大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化合作，勇担新的文化使命，共同服务文化强国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徐青森表示，清华国学院跨越百年的

实践探索，深刻诠释了只有扎根中国大地，才能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只有回答时代之问，才能激发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活力；只有胸怀国际眼光，才能拓展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影响。

邱勇表示，面向未来，国学研究院要深化“中国主体”、拓展“世界眼光”，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上续写“文化救国”“文化爱国”与“文化强国”的壮阔篇章，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不断贡献清华力量。

张志强表示，让学术成为在不同时代探究文明历史之道的方

式，已经成为清华国学院的传统。陈来表示，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肩负起推动中华文化“创造转化，创新发展”的时代使命。梁启超、王国维后人代表，国学院“四大导师”故乡代表等出席开幕式，200余位学者参与圆桌论坛和分会场讨论。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创立，汇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虽于1929年停办，但其精神持续引领清华文科建设和中国人文领域的研究发展。2009年复建后，国学院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显著成就。

（王晓霞）

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

7月3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拉开帷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以“共促世界和平与繁荣：共担、共享、共赢”为主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发表午餐演讲。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比利时前首相、欧洲理事会前主席赫尔曼·范龙佩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出席论坛开幕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出席开幕式，校长、世界和平论坛主席李路明致欢迎辞，校党委副书记过勇出席论坛，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杨斌主持开幕式。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事

业遭遇严峻挑战。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国愿同各国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史为鉴，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二是坚持团结协作，共同完善全球治理；三是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繁荣发展；四是坚持同舟共济，共同迈向现代化。

为期三天的论坛设有四场大会讨论、十八场小组讨论，旨在汇聚全球智慧，探讨如何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承担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责任，共享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最终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和持久和平。

（李 含）

国际著名统计学家刘军全职加盟清华大学

8月30日，清华大学在丙所会议室举行刘军教授“清华大学兴华卓越讲席教授”聘任仪式，国际著名统计学家刘军全职加盟清华。校党委书记邱勇、校长李路明出席聘任仪式。副校长姜培学主持仪式。

李路明代表学校向刘军教授全职加盟清华表示热烈欢迎。期待刘军教授充分发挥自身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推动清华统计学、数据科学等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为学校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贡献力量。

刘军表示，自己在清华园出生、长大，如今跨越一甲子选择回来，是对教育科研事业的热爱，也是家国情怀的召唤。

未来将助力统计与数据科学系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产学研一体化学术重镇。

刘军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统计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统计学会会士、国际数理统计学会会士和国际计算生物学会会士。他在贝叶斯推断、计算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工作，曾获考普斯会长奖、晨兴应用数学金奖。刘军从2005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2015年主导创建清华大学统计学研究中心并担任名誉主任，积极吸纳多位海外优秀教师来校任职。2024年，他作为筹建发展委员会主任，帮助清华大学建立了统计与数据科学系。

（曲 田）

● 清华之光

法学院团队入选 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入围名单，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负责的刑事法学与司法改革创新教师团队入选。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明楷为团队负责人。团队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因材施教与教研融合的教学模式，重视教学改革创新，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过程，在教学中注重实践导向，同时基于育人理念开展课程思政，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团队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开展有组织科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立法、司法工作贡献智识，对重要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有效建议并被采纳，围绕刑事法学与司法改革开展系统性研究，倡导中国自主刑法学知识体系建设。

薛澜、张作义荣获 第十一届“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

第十一届“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于近日揭晓。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总工程师张作义获奖。薛澜以坚定的政治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前瞻的学术视野，在构建清华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推进清华教育国际化、打造高端智库等方面贡献卓著。张作义带领产学研团队持续20年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工程设计，领导全球首座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HTR-PM）建成运行，使我国第四代核能技术实现国际领先。“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于2004年设立，是学校对在人才

培养和学校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者的特别奖励。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不超过3名。

清华学生超算团队获得 2025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总冠军

当地时间6月12日下午，2025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ISC25）总决赛在德国汉堡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清华大学学生超算团队夺得现场总冠军，同时获得LINPACK基准测试最高性能奖。本次现场决赛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0支队伍参赛。竞赛要求各参赛队伍在6千瓦功率的限制条件下自行搭建计算机集群系统。清华团队凭借扎实的系统能力、良好的团队协作和稳定的现场发挥获得总冠军，同时在LINPACK基准测试比赛中以340 TFLOPS（每秒万亿次浮点运算）的成绩获得该单项的第一名并打破赛事纪录。参加此次比赛的清华大学学生超算团队由6名本科生组成，包括计算机系杨雨晴、李双宇、吕嘉鑫，致理书院杨恺、贾朝蓬、张扬，计算机系岳章乔、施程予、王宇澄也参与了备赛训练。（计算机系）

清华火神队夺得 2025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冠军

当地时间7月17日至20日，2025 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年度全球总决赛在巴西萨尔瓦多举行，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0余支队伍会战巴西。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赵明国研究员指导的清华火神队夺得人形组冠军，这是中国机器人足球队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自小组赛开战以来，清华火神队使用加速进化T1机器人连胜对手，顺利打入决赛，最终捧起中国首座“大力神杯”。（自动化系）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清华人深度参与九三阅兵 师生以丰富多彩活动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校长李路明、副校长姜培学等师生代表受邀现场观礼。校园里，师生们相聚在会议室、实验室等地，共同观看大会直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讴歌伟大抗战精神，凝聚起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清华大学师生校友深度参与多个装备方阵和空中梯队的核心装备研制工作，为相关设计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为相关装备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技術基础，在无人机设计、导航、控制及智能驾驶等方面攻克了众多技术难题。

当天，在天安门广场，189名清华师生参加了广场合唱或志愿服务。广场合唱团中有81名清华师生参加演唱《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远端集结点、观礼台、饮水点等重要点位，活跃着108名清华师生志愿者的身影，他们默默守护这场盛会的多个环节。

清华美术学院的师生校友参与并完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标识设计、阅兵标志徽设计、纪念活动的长安街及城市环境景观设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五件大型主题雕塑的创作、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展览定位策划空间区域设计及整体呈

现、宛平抗战核心片区环境提升工程深化设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金银纪念币设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设计等。

今年以来，清华师生以丰富多样的活动为载体，重温先辈的英勇事迹，从历史的回响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学校组织了系列学习、参观和培训活动，筑牢信仰根基，凝聚奋斗力量。“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清华”专题展在校史馆开幕，展览清晰勾勒出清华师生在烽火岁月中教学不辍、科研报国、毅然从戎的壮阔图景。清华大学共有七位老同志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近日，校党委副书记许庆红带队看望慰问抗战老同志，为他们佩戴纪念章并代表学校党委表达敬意。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吉俊民带队看望105岁的抗战老兵夏世铎学长。

此前，千余名清华学子或与北大、南开、云南师大的同龄人一道，相聚西南联大旧址，探寻刚毅坚卓的精神底色；或通过“思政实践”课，走进一个个抗战纪念地，体悟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全校各级党组织纷纷组织师生员工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学习，离退休教职工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唱响对党、对祖国的拳拳热爱之心。学校还以举办纪念座谈会、学术研讨会、原创话剧《马兰花开》专场演出等方式，持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勠力同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奋斗。（宗 禾）

清华大学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师生座谈会

9月4日上午，清华大学在校史馆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师生座谈会。校党委书记邱勇出席并讲话，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向波涛主持座谈会。常务副校长曾嵘，副校长彭刚、姜培学，清华英烈及革命先辈后代代表，师生代表等40余人出席座谈会。

邱勇向为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作出贡献的清华先辈和民族英雄致以崇高敬意。他说，清华大学始终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清华先辈在抗日战争中知耻图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的清华人正在用挺膺担当的实际行动铭记历史、缅怀先辈，继续书写学校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文化传统的崭新故事。邱勇说，2025年是学校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谋划编制“十五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锤炼刚健自强的坚毅品格，走好团结奋斗的“必由之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努力创造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清华英烈阎裕昌之孙阎禄德讲述了祖父从清华工友到抗日根据地技术人才，再到为国捐躯成为烈士的英勇事迹。土木系退休教授、抗战将领过家芳之女过静琚追忆了父亲的峥嵘岁月，希望以此激励年轻一代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数学中心教授吴昊分享了纪念大会现场观礼的真切感受，表达了潜心教书育人的志向。航院学生组组长姜辰讲述了面向国家需要开展科研攻关及带飞行学员班的经历。精仪系硕士生景雁南、为先书院本科生李与涵、工物系本科生张誉洸回顾了参加纪念大会天安门广场合唱与志愿服务的难忘时刻。社科学院本科生迪丽努尔·依力亚斯说，很荣幸现场观礼阅兵式，深刻感受到“家国”二字的分量。退役大学生士兵、电机系硕士生项梓纭表达了坚守军人底色，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奋勇拼搏的决心。与会师生代表围绕阅兵观礼感受、传承清华传统、自觉投身科技创新主战场等进行了交流。相关部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曲田 杨雪文）

“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清华”专题展开幕

8月28日上午，“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清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在清华大学校史馆开幕。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向波涛，校务委员

会副主任李一兵，清华校友、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冯仲云的长子冯松光、次子冯江华、长孙冯星，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清华大学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新闻中心主任刘涛雄，图书馆党委

书记冯劲涛，校友办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赵劲松，以及清华40余位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校史馆馆长、档案馆馆长孙海涛主持。

李一兵表示，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举办“烽火弦歌——抗战时期的清华”专题展览，对铭记清华抗战历史、缅怀英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与清华爱国奉献光荣传统具有深远意义。冯江华作为冯仲云家属代表发言，他讲述了父亲冯仲云与张甲洲、于天放东北抗联中“清华三杰”的故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校史编委会委员欧阳军喜，李红英，

清华大学土水学院硕士研究生肖航也分别发言。

本次展览设有“师生救亡，抗日先锋”“南下西迁，弦歌不辍”“科学救国，学术抗战”“投笔从戎，共赴国难”“故园蒙难，复员重生”“碧血丹心，英烈丰碑”“铭记历史，赓续精神”7个篇章，通过41块图文展板、173幅珍贵历史照片及档案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清华师生在战火纷飞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教育教学、以科技支持抗战、投笔从戎走上前线的历程。

（陈晓姝 薛建团）

吉俊民副会长看望 105 岁抗战老兵夏世铎

8月26日，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吉俊民、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秘书长韩威一行看望了105岁的西南联大老学长夏世铎（1939—1940联大，法律）。

夏世铎学长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看到母校来宾非常高兴，和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吉俊民副会长说，清华校友总会与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看望夏学长，是为了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赓续传承红色文化。当年，1100余名联大学子投笔从戎，夏学长也是其中之一，是清华师生校友学习的榜样。

在交流中，夏老学长回忆了求学时的美好时光以及与同窗学友、母校师生的细节过往。他说，如果再回到从前，他仍然会选择申请上前线，为争取民族独立作贡献。

离别时，105岁的学长坚持要将来宾们送到门口。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征程，先辈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新时代的清华人，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续写荣光。

夏世铎，安徽巢湖人，1920年出生。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法律。1940年10月，夏世铎进入黄埔军校17期炮兵科。1942年毕业留校任教，但他不甘心，给老乡张治中将军写信，要求到前线去。将军回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训练学生、为前线培养干部很重要……留给你们的任务比前线还要重要”，勉励其在学校安心工作。1943年和1945年，夏世铎又两次申请上前线。1945年时他已经开始接受训练，准备入缅作战。不过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夏世铎上阵杀敌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始终为抗战贡献力量。

1949年，夏世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并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政治。1956年，夏世铎参加民进上海市委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他还是上海市普陀区政协第八、九、十、十一届委员。（曾卓崑）

梅汝璈：“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姚 坚（1980级自动化）



办公室内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梅汝璈（1904—1973），江西南昌人。1916年至1924年在清华学校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46年至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工作，同某些庇护日本战犯的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1948年底，梅汝璈拒绝国民政府的任命避居香港，1949年底秘密抵达北京，随即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此后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中国指派时年42岁、熟悉英美法系的梅汝璈为中国法官，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之一。

1946年3月，梅汝璈博士受命挺身而出离开上海，媒体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

《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在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同时也是曾创立清华大学电机系、工学院并任院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军民伤亡在3500万人以上，无数前辈先烈牺牲在战场上，日本的这笔血债必须清算。梅汝璈作为四万万中国人的代表，背负着祖国人民的血海深仇前往东京，为中国打赢了二战最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开庭818次。梅汝璈既要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交涉、斡旋，还要面对浩如烟海的证据资料并且据理力争。梅汝璈深知，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会因为战争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受到应有的维护。为此，他曾在日记中警示自己：“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决不马

马虎虎。”当时的盟军最高统帅指定由澳大利亚法官韦伯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庭长右边的第一座位是美国法官，其余座次如何排列特别是庭长左边的第一把交椅该属于谁，各方各执一词。由于当时中国国力弱小，开庭前预演时，庭长宣布的入场顺序把中国排在英国之后，甚至以盟军总部的决定相威胁。梅汝璈坚定地脱下法袍表达强烈抗议，义正词严地说：

“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战时间最久，牺牲最大，理应排在第二位！”

面对侵华日军铁证如山的暴行，各国法官对于战犯的定罪与量刑却存在严重分歧。当时有些人主张将战犯流放，有些人所在国家在二战中没有过多地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甚至主张在量刑时体现所谓的“宽宏、谅解、慈悲”。要说服其他法官同意对主要战犯判处死刑是极大挑战。对此，梅汝璈明确表示，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惨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宽大固然是美德，但姑息则是怯懦，“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除了据理力争，当时对日本侵华暴行证据的收集变得十分关键和重要，1948年梅汝璈给国内的电文写道：“我国此部分证据至为脆弱，起诉书中我国诉项虽占暴行项目中约半数之行动，但所提证据则不足道。除南京屠杀外，其他汉口长沙广州衡阳桂林柳州等项下，证据几等于零。”

对此，另一位清华校友、1917年从清



向哲潜学长

华学校毕业的向哲潜，作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在东京开展了繁重而艰巨的工作。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向哲潜根据带去的战犯名单要求国内迅速提供日军在华暴行的各种证据，同时积极要求盟军最高司令部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方档案，到日本内阁和陆军省档案库中查找到极度机密的日方文件，从而获得了日本战犯的第一手罪证。同时，经过据理力争，将起诉书的起始日最终确定为“皇姑屯事件”事发年1928年1月1日，以此作为日本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起点，而没有采纳国际检察局有人提议的从“珍珠港事件”之后的1941年12月算起，否则许多日本战争罪犯就会逃脱惩罚，导致重罪轻判。

1946年12月29日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辩护中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向哲潜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唇枪舌剑的辩控，当庭展示了许多资料，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罪证，并当场出示了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

根据详实的日军暴行证据，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他说：“如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本法庭的宗旨，也违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在最后投票之前，梅汝璈预见到力主死刑的法官可能只占少数，便就严惩日本战犯之事与韦伯庭长严正交涉，并激动地说：“审判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谢国人！”

在东京审判最后的法庭陈述中，梅汝璈作了坚定而专业地表达：“先生们，这里不是大学的课堂，这里也不是寺庙，这里是法律的殿堂，所以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惩罚这些罪犯，我认为宗教是告诉世人如何做才能到达天堂，而法律则明确规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否则，就要受惩罚，就要上断头台，就要上绞刑架，这就是法律，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对战犯们适用死刑的原因”。

梅汝璈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后，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远东军事法庭最终于1948年11月12日做出决定，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和广田弘毅等7名主要日本战犯判处绞刑。这其中有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有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侵华阴谋家，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五省自治的幕后人物、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还有2名日本前首相（第40任首相东条英机、第32任首相广田弘毅）。此外，还有2名日本首相被判处了

无期徒刑（第35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第41任首相小矶国昭），加上日本第34任、第38任、第39任首相近卫文磨于实施强制逮捕的总部宪兵到达前畏罪自杀，共有5人7任前日本首相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在东京审判中，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仅有17人，工作量之大、工作难度之巨难以想象。这当中梅汝璈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2名病死狱中，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京审判的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民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当时有人主张统一书写判决书，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



梅汝璈（右5）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席上（20世纪40年代，日本东京）

分，中国人民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的暴行比当年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更加惨绝人寰。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决定由他负责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面对各种资料、证据堆积如山，其时间跨度之长，达17年之久；涉及地域之广，从东北三省到江南大片中国国土，期间发生的日寇罪行罄竹难书。梅汝璈和他的助手们竭尽全力，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页、长达十余万字的判决书章节内容，获得了法官会议的认可，为东京审判作出了重大贡献。梅汝璈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理有节，特别是在“法官席位之争”“坚持死刑处罚”和“起草判决书”等关键时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清华法学院校友王铁崖在《远东军事法庭》一书序言所说：“作为一个法学家，参加国际战犯审判，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梅汝璈博士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排除各种困难——当时国内政府的不重视、不支持，以及国际上的反动势力的拖延和阻挠——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主要战犯作出了基本上符合正义要求的判决，这是难能可贵的。”

如今，由梅汝璈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和梅汝璈当时身穿的法袍，已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在东京审判最后的法庭陈述中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回响：“除了掠夺别国的资源，扩张自己的领土，日本还杀害了无数无辜的平民。



梅汝璈（右）与韦伯庭长在审判席上

日本军队抢掠、强奸、放火、杀戮，杀害了无数中国、菲律宾、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难道这还不足以被判处死刑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次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在座的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想说的、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们可以投票了，为了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人，为了让他们瞑目，请各位慎重，因为他们在看着我们。”

据梅汝璈先生家人回忆，其思想和行为带着明显的清华烙印。2004年4月24日校庆期间，清华法学院在明理楼举行了“梅汝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201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表彰称号，梅汝璈学长作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个时期的先进分子、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之一，被评为全国“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最美奋斗者”。如今，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楼层墙壁上，依然悬挂着梅汝璈学长等多位清华法学前辈的画像，设置有“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的教席，让清华法学的文脉接续传承。

2025年9月7日修订

1937：孙立人浴血苏州河

○袁 帆（1975级建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此时，年仅37岁的孙立人担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他就做好准备，随时冲上抗战前线，一展“精忠报国”之志。不久他如愿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身先士卒，英勇负伤，浴血战场。

随着近年来公众对孙立人（1900—1990）抗战事迹的高度关注，有关他在淞沪战场的经历、负伤时间及地点等详细情况出现了各种说法与演绎，有些符合情理，有些明显臆造。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为此，笔者试图通过检索当年的媒体报道、比对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方式，努力将碎片化信息形成较为可靠的“证据链”，尽可能还原史实真相；在深切缅怀前辈史迹中，致敬所有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流血牺牲的抗战英烈。



（一九三八年春）
孙立人伤愈后的留影

一、税警总团参战概述

1937年9月下旬，已编入陆军第八军的税警总团，“从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五日止，在全战役期间，参加蕴藻浜及苏州河阵地守备战斗，及敌人在杭州湾登陆后，担负掩护大军转进作战等任务，历时六十六天”。这是时任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总团长的黄杰（1903—1995）在回忆录中的讲述。

10月1日，税警总团正式投入战斗时，惨烈的“淞沪会战”从8月中旬开始已进行了近50天。从吴淞地区源源不断登陆的日军，虽然凭借陆海空立体攻势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但中国军队拼死抵抗，将战线控制在距离上海市中心区域约15公里的蕴藻浜一线。

经过三星期的血战后，上海北面的重要支撑点大场镇于10月25日失陷，中国军队按照统一部署，向南撤退约8公里至苏州河一带再设防



《申报》1937年10月28日报道

线，意欲利用天然屏障，阻挡日军从西面进入上海市区。1937年10月28日《申报》记载：“沪西周家桥附近激战，我军扼守苏州河南岸。”

孙立人率领所部防守苏州河防线的东翼周家桥地区，此地距离市区仅咫尺之遥，是进入上海中心的门户，必定成为敌人攻击的首要目标。从10月25日开始的一周内，敌军试图从孙立人部防守的苏州河段渡河，因此税警总团经历了进入淞沪战场后又一场激烈的战斗，官兵伤亡惨重，包括第五团团团长邱之纪、第四团一营营长李邦钦等多名团营级指挥官阵亡。战斗进行到第六天，孙立人也在前线遭敌炮击，身负重伤，为抗战血洒战场。随后，孙立人被转移至市区内法租界的体仁医院抢救，在11月中旬再被转送到香港治伤，此为后话。

二、周家桥和丰田纱厂在哪里？

在当年的苏州河战场报道中，“周家桥”“丰田纱厂”屡被提起。那么，这两处战场要地在哪里呢？

由当年《申报》记者编绘的“沪西战区形势图”可知：丰田纱厂贴近中山路，往西即是周家桥镇所在。“周家桥”是形成于清末的一个集镇，苏州河在镇区北面流过，并贴近连接沪西市区的“百利南路”（今长宁路），是由西面进入上海市区的必经之地。

“丰田”的字号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日本著名汽车品牌正是发家于始建于1919年的丰田纱厂。当年的《申报》特别介绍过，“敌商丰田纱厂在苏州河南岸中山路以西，敌军原筑有坚固工事，现我军驻防该处，为重要据点之一。”

三、苏州河防御战与上海沦陷

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后的第一场中心城市保卫战。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中日双方投入了上百万人，中国军队不但使用了几乎全部的中央军精锐部队，还调集了川、桂、黔军等地方部队奔赴前线，但最终的结果是以上海沦陷而告终。苏州河防卫战是淞沪会战临近结尾的局部战斗，造成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时的战场环境与防守难度到底有多大，以税警总团防区为例：

1. **地势与阵地**：从东面中山路开始到西面刘家宅，其正面防守宽度约为3公里，地势平坦，基本无险可守。由于战争爆发突然，根本无暇进行预先的“战场规划”，没有提前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

2. **天气与消耗**：苏州河防御战开始于10月下旬，彼时已进入深秋时节，气温下降。“苏州河南岸一带，除了少数建筑物之外不是水田就是沼泽和河汊，工事如掩蔽部和交通壕很难构筑，只有泡在水里作战，天寒水冷，使官兵两脚麻痹，难以行动，同时受敌人炮火无情的摧残，伤亡惨重”（引自《孙立人回忆录》）。与此同时，由于缺乏野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体系，没有坚固掩体，官兵无法正常睡眠，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啃干粮、喝冷水，体力消耗极大。

3. **兵力与武器**：经过前一阶段的蕴藻浜阻击战，中国军队战损率较高，且无兵员补充。到苏州河防卫战时，部队没有重型火力和防空火力支援，轻武器的弹药损耗量很高，而且弹药补充困难，“补给品能送达前方者，不及所需三分之一”。

在与日军“空中飞机助攻，地面重

炮轰击，后勤补给充足”的对比中，中国军队的防御难度越来越大，虽然官兵以巨大伤亡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失利的结果已不可避免。11月1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告上海同胞书》，宣告中国守军撤退。风雨凄凄，上海于11月12日沦陷。

四、孙立人浴血苏州河

面对强敌，中国军人英勇杀敌，表现出顽强斗志。孙立人在苏州河防御战中身负重伤，用鲜血与生命诠释了精忠报国的崇高志向。

1. 他人对孙立人负伤情况的回忆

关于孙立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负伤，现在的坊间说法主要来自第八军军长黄杰的回忆录，“十一月三日，敌乘我伤亡惨重，不断增援猛攻，税警总团第二支队司令孙立人身负重伤”。更详细的说法来自第二支队司令部参谋郑殿起的回忆录，“四日凌晨三时许，……（孙立人）走出（第五团）指挥所掩蔽部，弯腰低头用手电筒看地雷，一颗榴散弹在他的上空

爆炸，将他的背部、臀部及两个上臂炸伤十几处，有八九块弹片进入体内。”

2. 孙立人本人的回忆

对于苏州河战斗及负伤的经过，孙立人本人的回忆是这样的：

10月25日，“带着本团的营长第一营李邦钦、第二营李鸿、第三营张在平，到苏州河南岸去观察地形及阵地配备、工事的构筑”；“我沿着河岸观察判断敌人有可能使用的渡河点，发现纱厂高楼前的河身最利于敌人渡河。所以告诉第一营营长李邦钦说，（这里）要特别注意，防止敌人夜间渡河”；“对于各种地形的利用、阵地的部署，都一一详加指示，并要各营务必在天黑之前将阵地筑好，预料敌人会在一天两天内就可能向我们阵地攻击”。这里所说的“纱厂”，就是“丰田纱厂”。

10月26日，“拂晓，我再度去查看各营的防御工事，以及火线配备，一切做得都很好，而士气尤其高昂”；告诉士兵“日本人的火力比我们强，我们必须以智取，以谋胜，切不可鲁莽而作无谓的牺牲。”

10月27日，“对岸有零散的枪声传来”，指示部队“要阵地严加戒备，敌人在晚上可能就要开始行动了”；“半夜时，敌人在我所料定的地方以橡皮舟强行渡河，那个地方河宽不到四十公尺。”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至拂晓“枪声平息下来，敌人完全被消灭”。

10月28日，自前一



《申报》1937年10月29日报道

日敌军开始渡河，双方经过一夜的战斗后，孙立人部打退日军进攻。当夜，敌军再次发起渡河攻击，孙立人接到黄杰总团长电话，“说左翼（第五团）防线敌人已强行渡河，我方阵地已被突破，现调第三团至该团防区增援，以歼灭渡河之敌”；“我接了电话之后，马上前往第五团指挥所。”

整个夜晚，孙立人往返于各处战场之间，但第三团未能有效增援，部分敌军渗透进苏州河南岸，情况十分紧急。

10月29日，整个上午孙立人都在为调预备队第一营做准备，“由营长李邦钦率领，以肃清已渡河的日军为目的，限正午十二时开始威力搜索，攻击前进。”

到下午三点十分，得到报告“李营长受重伤”（后牺牲），孙立人即刻赶往前线。这时一营已攻抵苏州河边，他到达后，发现敌人“两岸工事非常坚固，对岸地势较南岸高，浮桥做得约三公尺，人与步兵重武器都可以通过，对我方威胁很大，所以我决心要在黄昏后把浮桥及桥头堡破坏，以免后患”。

《申报》随军记者10月29日晚间报道中记述：“今晨起，敌以大炮向苏州河南岸丰田纱厂以西我军阵地轰击，尤集中于

华漕镇，敌机亦来回侦查投弹，至午稍形沉寂，惟至午四时半，炮声又起，丰田纱厂中弹起火，迄报告时尚未熄灭。”所述情况与孙立人回忆相互印证。

黄昏后，孙立人召集一营的代理营长及各连长讨论如何破坏敌桥头堡和浮桥，提出了火攻、潜水爆破、火力强攻等三个方案。孙立人始终都在前线督战，战斗进行到半夜，苏州河南岸敌人阵地被攻克。正当部队开始破坏浮桥时，“河对岸一阵火炮向我们射击过来，弹片齐飞，我只觉得身上一麻就人事不知晕过去了。但我心中仍然有些明白，我任务还未了，也还未交代，我死了是不甘心的”（《孙立人回忆录》）。

结语

让我们记住：孙立人负伤时间是1937年10月29日深夜至10月30凌晨之间，地点在苏州河南岸的周家桥地区。

88年过去，当年周家桥地区的战场遗迹只留下了日商丰田纱厂的办公楼。站在这栋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百年历史建筑前，我仿佛又看到孙立人的身影，我相信他一定来过这里！

虽然物是人非，但历史并未湮灭。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找寻战争的遗迹，探究抗战将士的战斗经历，只为“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因为我们深知：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一代代保家卫国的战士在为我们流血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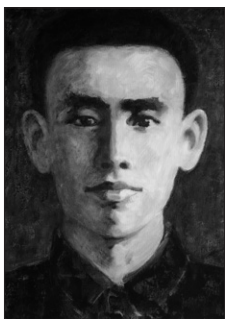
2025年9月5日修订于上海



日军拍摄的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阵地概貌（1937年11月）

吴新之：刀光血色映高地

○王 媛



吴新之烈士画像

吴新之，山东栖霞人。1934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七七”事变前，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10月，到山东聊城堂邑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与当地爱国青年一起，组成了第一游击大队。1940年6月，八路军129师新八旅组建后，他调任22团政治处主任。1942年1月24日，在曲周吕洞岗反日军“扫荡”作战中牺牲，时年29岁。

幼承家教 追求进步

吴新之，原名吴振民，曾用名吴新芝，1913年生于山东省栖霞市苏家店镇集东沟村。吴新之出身中农家庭，祖父吴忠道勤劳忠厚、治家严谨、教子有方。父亲吴克章，读私塾6年后考入县师范讲习所，初为小学教师，1930年左右任县立中学庶务主任、县教育科视导员。吴新之幼承家教，聪明精细，刻苦好学，1931年县立中学毕业后，由于学业成绩优异，被推荐留校担任教员。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情绪日

趋高涨。1932年春，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莱阳乡师”）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周树谱被学校开除，转学到栖霞县立中学开展党的工作。在吴新之等进步教师支持下，周树谱、隋之灿发动同学揭露国民党县党部压制学生抗日活动。同年，在栖霞城隍庙举行“五三”国耻纪念大会上，时任县党部执委马琅斋借演说污蔑学生宣传抗日是行为不轨，遭到县立中学校长王培滋和进步学生的反驳，双方撕打起来，会场一片混乱。被激怒的学生遂即进行罢课。不久，县立中学学生周树谱等7人被开除学籍。吴新之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辞退。

他回到农村后，重新思考未来，决计继续升学。1934年，吴新之以备取生身份自平大农院附中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号是2708。

求学清华 加入组织

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国立清华大学学生历年修习学程成绩记载表》记

金夢燕	嚴克信	楊學成	楊治平	翁同文	吳新之	吳其瑞	吳繼周	吳錫銓	王作霖	王家棟	董家銘	段家愛	崔思媛	崔芳棠	左大新	曾福如
十九	二十	十九	二十	十九	廿一	廿二	十九	十九	廿六	二十	廿一	二十	廿一	二十	廿一	廿一
湖南	江蘇	湖北	江西	浙江	山東	江西	江西	廣東	河北	山東	福建	江西	安徽	河北	廣東	四川
南開	浦東	湖北	大同	秀州	平大	南昌	大同	中華	河北	烟台	文治	宜泰	南京	育德	培英	成都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附屬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外文	化學	物理	機械	歷史	土木	電機	機械	物理	政治	土木	電機	化學	社會	外文	社會	電機

《清华副刊》1934年42卷第2期上刊登的吴新之信息

录了吴新之1934年至1937年修读课程和成绩情况。1934年到1935年第一学年，他修读了“国文”“第一年英文”“普通物理”“高级算学”“制模实习”“体育”“军事训练”等课程；1935年至1936年第二学年，上半学期他修读的是“机件学”“金工实习”“工程材料学”“微积分”等课程，下半学期则修读的是“哲学概论”“西洋现代史”“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等6门课程，此时他已从土木工程系转入历史系。1936年至1937年第三学年的成绩只有上半学期，修读的是“日文”“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欧洲近代史初期”“日本通史”等课程。此后，成绩卡片无记录。

在清华大学，吴新之遇到了在中学时的同乡好友宫尚行（原名宫曰健），吴新之曾就读的栖霞县立职业（蚕科）学校就是宫曰健的父亲宫焕文创建的。宫尚行先后两次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在宫尚行的影响下，吴新之积极参加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传播进步思想。1936年1月吴新之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沿津浦铁路深入河北农村工厂进行抗日宣传。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立，吴新之出席了在北平大学召开的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入民先总队部工作。暑假回栖霞时，他带回《我们的队伍》（民先总部队刊）、《少年漂泊者》《新青年》《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嘱外甥范罗宾阅读。

在学生时期，吴新之常穿一件阴丹士林布大褂、一双农民布鞋，没有什么洋学生的派头，言行表情像一个乡村教师，像一个农村的庄稼孩子。他热心民众教育，

1936年3月，在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干事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学生自治会民众教育科干事，任民众学校校长。1936年暑假，他因操劳过度生了病，无法继续工作，民众学校工作由李冠英接任。

政治工作能手“本地打”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吴新之在平津党组织领导下，与平津流亡同学会同伴一起经天津渡海来到烟台，之后转赴济南。离开清华后，吴新之开始了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

在济南，吴新之参加了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政训人员训练班，1937年10月，结业后根据组织的安排到聊城范筑先部参加抗战工作。抵聊城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黄河以北政府官吏、军队人员纷纷撤退，吴新之等42位热血青年坚守聊城，誓死抗日。撤出聊城以后，决定留下来打游击的28人中又有吴新之。到聊城不久，吴新之与其他14名政训服务员一起来到堂邑县办事处，与地方共产党的组织一起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游击队，发展抗日武装。1937年11月，由吴新之参与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一大队在堂邑正式成立，吴新之任一中队指导员。

在抗日战争前线，吴新之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他政治态度和工作作风好，善于团结同志，能深入群众，和群众在一起。他言不惊人，语不压众，不引人注意，从不拍桌子、瞪眼睛，不恶语伤人，不仗势欺人，说话总是满面笑容，不急不躁，循循善诱地给人讲道理。抗战初期一些刚脱下西装、长袍大褂的青年学生和群众说起话来满嘴名词术语，老百姓听不懂，不解其意。吴新之从农村长大，对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农民熟悉，他非常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和他有共同语言。农民、老百姓也喜欢找他拉拉家常。找他的群众多，一天到晚忙个不可开交。在工作中，他不发牢骚，没有怨言。他也不计较个人生活，地瓜、小米饭，吃得蛮香。在组织部队时，有的拎上了盒子枪（驳壳枪），有的带上枪牌的橹子（手枪），有的背上了汉阳造、水连珠（步枪），吴新之还是扛着一支“本地打”（土枪）。他的相貌、衣着、表情再加上这支土枪，人们就给他一个绰号叫“本地打”，又叫“老千万”。吴新之的布背包里，装满了书籍和笔记本，他一坐下来，就拿出书来学习，常在油灯下学习和工作到深夜。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了他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调查了解的情况和问题、学习的心得和体会。

“艰苦工作都要他来做，困难地方都要他去。因为他和群众、干部声息相关，血肉相连，他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群众也信赖他。”卫西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张谭说。

1939年，党组织派吴新之到馆陶郝国藩的独立团工作。郝国藩出身于地主家庭，国民党统治时期，郝国藩曾任馆陶县第八区区长。“七七”事变后，郝国藩就地组织民团。党组织为了争取这支队伍，先后派一些干部去工作。在党组织领导下，经过吴新之等同志的帮助，郝国藩进步很快。为了打破这支队伍的家乡地域观念，吴新之和张谭商量，把这支队伍带到临清、馆陶、堂邑三县交界的地区活动，又到邱县、大名、曲周一带打游击。1939年到1940年，独立团参加了讨伐石友三的战役，使这支队伍受到了锻炼。1940年6月，八路军129师新八旅成立，郝国藩的独立团编入新八旅，组建为新八旅第23

团，郝国藩任团长。对于争取和改造这支部队，建设党所领导的武装，吴新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吴新之在太行山辽县桐峪附近的北方局党校学习时，被选为支部委员，学习和工作很忙，但是只要有空暇时间，就和同志们在漳河边谈学习心得，交换意见。他对抗战战争、游击战术、党的建设、发动群众等均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北方局曾想留下他，因为前方坚决不放才未被留下。

1941年，吴新之结束在北方局党校的学习，回到新八旅，调任22团政治处主任。吴新之是这个团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对22团部队的团结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22团在百团大战的对敌斗争中打了很多胜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吴新之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英勇顽强地粉碎了日军一次次“扫荡”、合围，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掩护突围 中弹牺牲

自1941年下半年开始，日寇对我华北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全方位的、连续不断的、更加疯狂的进攻，兵力一次比一次多，范围一次比一次大，时间一次比一次长，连续不断地进行围剿、扫荡，目的只有一个：妄图消灭我华北八路军和抗日力量。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接着又入侵美、英、荷兰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殖民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进一步加强其军事、政治的进攻和经济的掠夺，妄图尽快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推行所谓“总力战”，

消灭中国的抗日力量，叫嚣“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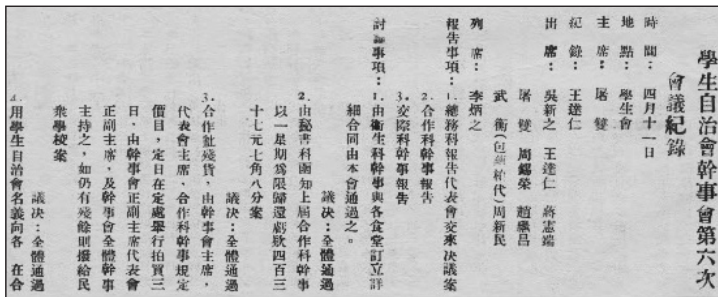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及时部署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1年12月17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敌后抗战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1942年初，129师首长指示：“野战军也主要是分遣成连或营，强化游击战争。”22团在政委于笑虹、政治处主任吴新之和代理团长徐国富的领导下展开英勇的反“扫荡”斗争。

1942年1月23日夜，我22团刚刚转移到广平县北下堡村宿营。24日凌晨，吴新之等几位指挥同志几乎同时发现敌人从平固店地区向东南移动。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铃木纠集了5000多日伪军在大炮10余门、坦克6辆和十几辆汽车的配合下，合击我冀南三分区，妄图歼灭我冀南第三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及八路军129师新八旅22团。为避开敌人的“扫荡”，22团立刻向东北方向转移。部队转移到东西张孟村时，从东北方向合围过来的敌人已赶到，封锁了我军前进的路沟，转移受阻。于是，部队由东西张孟村向崔庄方向转移，

不料敌人在崔庄一带也集结了重兵。22团到达崔庄一带时，与敌之主力遭遇。敌人以机枪、大炮组成密集的火力，疯狂向我射击。我军奋力冲杀，打开了一个缺口，到达侯村。从侯村向西转移时，于杨固村又遭敌人拦截，突围未成。于是，又转向侯村南边的高固村方向，边走边打，最后到达吕洞窑。然而，各路之敌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将第22团层层包围在吕洞窑。我军英勇顽强团结奋战，敌几次进攻，均被我打退。战斗异常惨烈。吴新之率一排人在前冲锋，掩护部队转移。他隐身在沟道里，正抬起身来，带领部队冲杀时，敌寇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不幸光荣牺牲。经过艰苦奋战，我军冲出了敌人包围圈。1月24日的这次突围战，22团共有98人牺牲、139人负伤。吴新之是牺牲的烈士中职务最高的一位。

吴新之，一个从胶东半岛走出来的优秀青年，像千千万万进步青年一样，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冀鲁交界的华北平原上。1969年，河北省曲周县侯村公社吕洞窑大队在此地建立了吕洞窑烈士公墓，建有烈士纪念碑一座，吴新之和牺牲的90多名烈士一起埋葬在这里。后来吴新之被迁往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

2020年，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了《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吴新之烈士位列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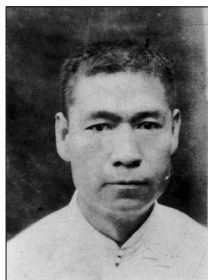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6年4月20日)记载：吴新之作为学生自治会干事参加学生自治会干事第六次会议

为抗战牺牲的清华校工阎裕昌

○郭故事

在名师档案云集的清华大学档案馆，一张编号为“京烈字第080351号”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主人是清华园一名普通校工阎裕昌。据记载，阎裕昌于1938年8月入党，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为冀中军区制药厂技师，1942年2月5日在河北省安平武莫营村被日伪抓捕和杀害。2016年阎裕昌之孙阎禄德将这张革命烈士证书及阎裕昌生前用品、学习笔记、实验器材等，悉数捐赠给清华大学。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默默地记录了这位清华校工的动人事迹。

阎裕昌（1896—1942），又名门本中，北京人。幼年因家庭贫困，仅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1919年，他经人介绍到清华学校当工友，因勤奋好学，被物理系教授叶企孙提升为仪器设备管理员，负责保管仪器设备，并在课堂中协助进行实验操作演示。想要做好实验，首先要理解课本中的理论知识。毫无物理学基础的阎裕昌，时常利用工作之余刻苦自学，一张张名片大小的纸张上密密麻麻地写满物理学知识。为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实验过程和结



阎裕昌烈士

果，他努力钻研，自制了很多实验器材。阎裕昌敦厚的品格、勤勉的态度和精深的技能，深受师生好评。清华物理学系毕业生、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曾评价：“阎先生为人正直，工作勤恳，手艺高超，思维敏捷，我们同学都从他那里得益不少，受他教益不少。”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为保护北平校产，学校成立“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阎裕昌与四十余名教员留校担任该委员会保管员。不久，北平沦陷，日军占领清华园，在校内耀武扬威，肆意掠夺校产。《清华大学一百年》中记载：

“1937年10月3日，日军竹内部队进入清华园，以‘参观’为名行检查之实，临行将图书仪器等用大汽车装载而去，是为日军窃取本校什物之始。自此，每日‘参观’，每日攫取。”

物理学系珍贵的仪器设备自然也在日军的觊觎范围之内。他们威逼阎裕昌交出实验室钥匙，阎裕昌坚贞不屈，冒着生命危险据理抗争，始终不肯交出钥匙，遭到日军毒打，满身伤痕。他回到家中愤恨地对家人说：“一定要打日本鬼子，将这些



阎裕昌革命烈士证明书

强盗赶出中国去！”为保护学校财产，他设法避开监视，偷偷将物理实验室的稀有贵金属转移到家中，再送交在天津的叶企孙先生运往昆明。这些贵金属后来在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阎裕昌协助叶企孙办理完清华物理学系师生南撤之事，经叶企孙的指导介绍，与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改名门本中，经保定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阎裕昌来到根据地后，克服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运用所学知识，迅速投入雷管、炸弹、手榴弹、地雷的研制中，为冀中军区军工生产做出重要贡献，后成为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主要成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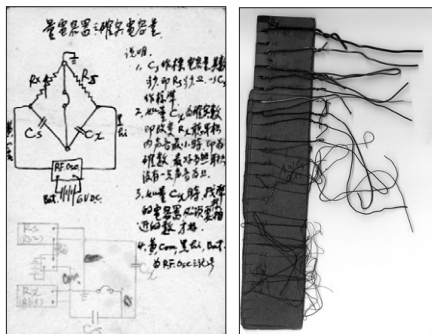
阎裕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多次往来于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筹集根据地各种军需物资，并帮助更多平津地区的人员前往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清华物理学系毕业生、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抗战之初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当助教，他曾回忆说：“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阎裕昌突然来到我的宿舍，他说：‘我参加了游击队，此次是奉命来要求你利用燕京大学作掩护为游击队做一些事：搞一些关键器材，如雷管和无线电元件；查阅一些资料，提供一些技术书刊；介绍

科技人员去游击区工作。’这些要求我当然义不容辞地答应。”最终在阎裕昌的帮助下，葛庭燧也来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根据地贡献力量。

为解决冀中抗战物资问题，阎裕昌奉命驻守冀中安平县武莫营村生产炸药。1942年，日军对冀中地区“扫荡”，阎裕昌不幸被捕并惨遭杀害。关于阎裕昌被捕和牺牲的经过，担任过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写道：“一次敌人进了村，阎裕昌把器材坚壁好就藏在大街上的一条大船底下，敌人走时到处抓鸡，一只鸡钻到船下，结果他被搜了出来。敌人对他用刑，他就大骂。他说顶多是死，毫不在乎。敌人用铁丝穿着他的锁子骨在街上转，问老百姓谁认识他。老乡都说认识他，但没有一个人揭发他是制造炸药、雷管的，没有一个人不为他哭泣。他高呼：日本鬼子一定失败，日本鬼子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最后，敌人把他残杀了。”

阎裕昌去世后，阎家人在张家口艰难度日。中共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封永顺等4人致信张家口市市长杨春甫，希望政府调查了解他家境贫寒的情况，予以帮助。信中介阎裕昌不畏严刑拷打与利诱、为国壮烈牺牲的经过，写道：“阎裕昌同志当时表现有高度的民族气节，意志非常坚强。敌人用各种方法，未获得半点效果。阎裕昌同志未吐露半点秘密，堪称民族英雄，革命军人模范。”1983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阎裕昌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证书正文写道：“阎裕昌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转自《北平抗日斗争文物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



阎裕昌手写的物理学习卡和自制的实验线规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我的父亲高原

○高永云



高原学长

我的父亲高原，原名高葆琦，河北省永清县人，1915年5月出生。我的爷爷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后无论是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还是自己开诊所，都给了父亲一个崇尚科学文化、平等幸福的家庭，培养了父亲疾恶如仇的热血男儿性格。他自小看不惯老家封建思想对妇女的歧视，在严厉的祖母眼皮底下，为母亲留了一碗白面面条。他不能容忍美国大兵的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驾着自家的老爷车与其一争高下。高中毕业，他报名参加中国空军，幻想着驾驶战机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1933年，父亲进入清华大学土木系，求学的四年里（1933—1937），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还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启蒙教育。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我党地下党员蒋南翔、李昌、曹言行（曹桂馥）等同志都是他的良师。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在寒风中走上街头，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在清华大学的学生队伍里也有我父亲高葆琦的身影。他与同学们向广大民众揭露侵华日寇烧杀抢掠的暴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拯救危难的祖国。军警的棍棒、高压水龙没能驱散游行队伍，汉奸特务的盯梢和抓捕也吓不退爱国学子，反而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之情。七天之后，他们再次走上街头，举行了“一二·一六”抗日宣传游行。

两次示威游行后，被唤醒的人们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民抵制日货等各种方式声援北平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更加深入全面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的父亲以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带领钱伟长、伍崇让、吴瀚等21名同学组成的民先自行车队，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

一路上，他们深入农村、乡镇、厂矿，向更多的劳苦大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1936年初，他们到达了南京，在南京街头、国民政府门前，向南京市民讲解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战必亡的危机形势，介绍殖民地人民及亡国奴的悲惨生活，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发动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救国。

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正义主张得到的是政府的漠视和训斥。当他与同学们被军警押解着返回学校的时候，父亲终于看清了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丑恶嘴脸，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回到学校后，他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37年寒假，父亲再次带领民先队40余名同学赴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参加薄一波同志亲自授课的牺盟会干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成为牺盟会会员。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也改变了一批爱国志士的命运。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的座谈会上，父亲说：“七十年前，我只是一个拥有爱国热情的学生，是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先烈们带着我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那时起，我把跟着共产党参加抗日斗争，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

1937年6月，父亲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了，随后悄然离开了温暖的家，带着爷爷的旧大衣，按照地下党员的指引，沿着太行山，从山西武乡走进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不久，我的爷爷也在父亲“不当亡国奴，不给日本人做事”的思想影响下，毅然关闭了诊所，举家搬离了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北平城。

我小时候，父亲经常用自行车推着我走进他的母校清华园，他如数家珍一般地告诉我，这是教学楼，那边是宿舍，还有踢足球的大操场。他还常常提起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和出国深造科技兴国的清华同学。

父亲参军后改名高原，

留在左权参谋长身边工作，这段时间他进步很快，1938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日战争愈加残酷，仅靠大刀长矛和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已经不能满足战场的需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于3月底成立了军工部，建起兵工厂，开创了自己的军工事业。

柳沟铁厂是军工部收购组建的第一家兵工厂，该厂前身是几家私营小厂集资合股开办的土法炼铁厂。由于经营不善，开工仅半年就不敷出濒临倒闭。4月1日，军工部派我父亲与股东们谈判，晓以大义、施以实利，顺利接管了工厂，改名柳沟铁厂，父亲出任厂长。父亲和他的工友，还有海外归来的学子们白手起家共同创业。他们对仅有的一台破旧炼铁炉进行了彻底改造和整修，制作了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小车床。铁炉终于燃起熊熊炉火，每月可生产22500公斤生铁，平均每天生产数千颗手榴弹、上千枚爆发管，以及拉管和雷管等。



1936年11月，清华大学师生为绥远抗日前线将士缝制棉衣完工后在大食堂门前合影。1 高葆琦（高原）、2 李立睿、3 吴瀚、4 傅梅芳、5 高秉洁、6 沈如瑜、7 沈海清、8 林传鼎、9 赵儒洵（赵石）、10 邱永权（李伟学长之女李慧政提供）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他们组织技术力量，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改造研发新式爆破武器。如：改进了生产黑炸药的配方比例和制作方法；用雄黄氯酸钾制作的手榴弹拉火索引药代替了传统的磷制火柴头，提高了手榴弹的爆炸率；把圆柱形手榴弹改为椭圆形，并将表面铸上凹凸方格，以增加爆炸碎片，提高杀伤力。百团大战以后，遵照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增加了五零型炮弹的弹坯铸造，之后又陆续生产了八二迫击炮弹和更大口径炮弹的弹坯，之后黄岩洞厂灌注弹药，做成炮弹。炮弹的试制成功极大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生产正常化后，柳沟铁厂按照军工部制定的统一规格和标准规范了自家产品。而后派出干部和技术工人到太行各分区帮助组建小工厂，推广生产统一规格的手榴弹及其他武器弹药。同时到区县武装部向民兵传授爆破知识，指导制作地雷方法，开展“人人会做雷，家家有地雷”的爆破运动。

在那个工业落后、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年代，工厂扩大，工人也必然增多。工厂采用军事化管理，工人、干部一视同仁，定工定岗，超额有奖，多劳多得，同时设立技术津贴补助，鼓励职工钻研技术发明创造。由于赏罚分明，管理得当，职工们心情舒畅，干劲倍增，经常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职工家属以及柳沟的乡亲们也把自家的命运与工厂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但督促亲人努力工作，更把支持和保护工厂作为己任。在完成农业生产之余，他们到小煤窑挖煤，走街串户收集废铜烂铁为工厂提供燃料和原料。每当日寇来扫荡，便会有人



20 世纪 70 年代，高原（中）和同级好友曹言行（曹桂馥、土木，左）、彭平（裴昆山、地学，右）合影

通风报信，全村出动，乡亲们牵着自家的毛驴，推着小车，协助工厂职工把拆卸的机械设备、原料成品等运进深山隐藏。扫荡过后，又运回工厂。就连老人孩子也会主动站到村口或山顶望风放哨。即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困难的时期，工友和乡亲们也是同甘共患难，从没有出现过汉奸和叛徒。

有乡亲的呵护，有全厂职工的努力，柳沟铁厂迅速壮大，成为军工部的支柱产业，不但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还培养了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为新中国的军工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后期，根据形势变化，柳沟铁厂一分为三，分别迁往他地设厂。工厂规模缩小了，但更专业化，也更便于发展。

1945年8月，父亲调到长治市负责筹建刘伯承兵工厂。之后又奉调太行行署，任公路局局长、华北交通部工程处长，负责修建长治到邯郸前线的公路。他的团队用原始落后的设备，成功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浊漳河公路桥，修复了从邯郸到北京的公路和石家庄到北京的铁路，为解放战争和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京作出了很大贡献。

父亲去世后，我曾经到山西柳沟探访他工作过的地方。柳沟的老人们还记得父亲和他的故事。他们说父亲是个很能干的厂长，那时工厂红火得很。他经常在夜晚带人去扒日寇占领区的铁轨充当炼铁原料，也敢在鬼子刚撤离的战场上收集枪支弹壳，作为研制新产品的样本。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历任中央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副局长、水运设计院院长、京杭运河建设工程局长，参加指导了南京浦口码头、厦门集美海堤工程、海南岛秀英码头、湛江港、松辽运河、京杭运河等诸多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修复及施工建设。

1959年夏，父亲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长春机械所所长，期间完成了机械所与光机所合并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工作。1963年父亲调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主任。为了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国防工业新技术，1965年父亲又兼任刚成立的新技术学部副主任，与众多著名科学家并肩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全国科学规划的制定，组织“两弹一星”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及分项试验等工作。

十年动乱中，父亲深受迫害，但他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信念始终不变。平反后，父亲暂时被安排在物理所担任副所长。对此他只是说：“只要让我继续工作，我就知足。”

俗称“人造小太阳”的托卡马克装置，或称等离子体受控热核反应堆是一个

庞大的系统工程。我国从事此项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陈春先先生在国外研学时了解到西方已经有几个国家建造了这个装置，并开始研究受控热核反应。回国后，他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时任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的父亲，并提出我国也应该立刻开展这种新型能源的研究。他的想法和建议取得了父亲的完全认可和支持，很快父亲便与同学也是邻居的钱三强先生沟通，俩人一拍即合。后经中科院党组批准，由钱三强同志主持开展此项研究工作，物理所负责具体实施。

物理所首先建起了托卡马克模拟装置的研究室，以便陈春先团队尽快开展研究工作，同时筹建更大的研究单位，当时取名为“受控站”。我父亲立刻组织有关人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确定“受控站”建在安徽省合肥市。随后父亲带领潘友信、崔长吉等同志多次前往合肥，与当地同志协调，为“受控站”选址、建站，购买、安装和调试设备，并调



1995年清华九级土木系在京学友聚会留影。左起：张志信、姚汉源、李远义夫人、高原夫人李汉唐、黄震东、高原、罗道坦、贾承文、李为驖、王世威、李远义、苑毓英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同时为他们解决户口、住房、交通、家属安置等生活问题。他们周到细致的工作，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短短的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受控站”的基本建设，开始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此后，父亲继续提出“受控站”应与全国有关科研院校和工厂紧密合作，并同时选派留学生，培养科研技术骨干。

经过几代科研人员的开拓性研究和实验，目前“受控站”发展扩大为“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正在建设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BEST），该装置将在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基础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预计2027年建成BEST，最迟2030年看到核聚变点亮的第一盏灯。受控热核反应装置在长三角经济建设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父亲在中科院工作期间，支持并开发组建了多项前沿科研项目，选拔培养了大量科研干部和专业人才，发挥了科技管理干部的作用。

1972年父亲调回交通部，任交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人。1979年11月任交通部科学技术局局长。在这期间，他参与了交通科学院、天津水运科学研究所、中国航海学会、上海打捞工程院的组建工作，并担任交通科学院院长和航海学会副理事长。同时参加了上海打捞局打捞阿波丸号沉船等工作。

1982年12月父亲离休了，离休后他曾担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顾问等职务，继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父亲曾在1996年11期《综合运输》月刊上发表了《再论改善长江口航道水深，建设上海深水大港的设

想》，这个设想是父亲多年对当地航道资料的研究和实地考察后提出的。1997年父亲在参加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座谈会上，提出了用中国自己的电池开发电动汽车和轻型摩托车的建议。这项建议来自父亲参观瑞典镍铁电池启动汽车的科研项目。如今，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已经遍布全国、走向世界，父亲知道了必然会感到欣慰。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父亲的一生体现了一位清华学子、一名老共产党员对祖国的热爱，对事业的不懈追求。

父亲于2007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他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怀念父亲的文章也在我心里写了十余年，在父亲的母校《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同志的关照下，我终于鼓起勇气，让《我的父亲高原》一文面世了。

2025年5月6日

沁园春·抗战胜利八秩志

○胡显章（1963届精仪）

烽火狼烟，倭寇猖狂，赤县危亡。痛江山破壁，书台擎鼎；奔波呼号，铁血文章。唤起民心，一同对外，雄壮先锋赤帜扬。冬雷震，举“一二·九”炬，灼破玄黄。

休言南渡仓惶，弦歌起，黄门即战场。念联辉八载，星河璀璨；讲帷千日，赤子戎装。茅舍成梁，千秋耻雪，教育长征砺锐芒。今昂首，锻神兵天剑，圆梦恒昌！

西南联大抗战飞行员马豫实物捐赠清华

○吴 霜

2024年6月25日，马庆芳先生、项立成女士向清华捐赠马庆芳的叔叔——西南联大校友、抗战飞行员马豫的珍贵资料：马豫在1944年使用过的美制军用投弹参数计算器，从美国带回的美国空军警徽、名片以及出访美国的老照片翻拍底片等。

马庆芳的祖父、马豫的父亲马鉴和他的四个亲兄弟马裕藻、马衡、马准、马廉都是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著名的文史教授，并称“五马”，他们在抗战时期表现出的爱国精神深深影响了后辈。

马豫于1941年1月考入西南联大化工学系，不久投笔从戎报考空军。1942年初，马豫进入位于昆明巫家坝的空军军官学校，成为第15期学员。学校大门两侧书写的“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使他热血沸腾。在云南接受一年的初级飞行训练之后，通过考核的空军学员分三批赴美继续学习，作为其中的一员，马豫也赴美接受高级飞行训练。

1943年3月初，马豫等空军学员抵达美国位于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的空军训练基地。当时正值宋美龄访美，马豫与另

外七位空军学员被选为侍卫并获其接见。

1944年9月，马豫回到祖国，被分配在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他们驻扎在云南，任务是轰炸日寇在湖南、广东、广西的机场、舰艇、仓库等军事目标。虽然接近抗战尾声，但马豫仍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也曾亲历过军校同学的牺牲。始终跟随着他的美制军用投弹参数计算器，成为他报国的见证。

抗战胜利后，马豫在香港随两航起义人员回到北京，曾在民航局担任过C-47运输机机长和飞行教练，更多的是在各地执行航空石油勘察任务。1956年至“文革”前，他累计飞行六千多小时，获取了大量航测资料，为开发大庆、胜利、大港及塔里木油田作出了贡献，连续六次被评为优秀飞行员。改革开放后，马豫任中国民航驻旧金山办事处主任，为中美通航作出了开创性工作。

退休后，马豫定居香港。1998年，他回到北京探亲，给侄子马庆芳带回了1943年在美的老照片的翻拍底片。次年，又将美制军用投弹参数计算器和空军警徽交给马庆芳保存。马庆芳曾问马豫：“您多次升空作战，竟然毫发无伤，是因为飞行技术高明吗？”马豫笑着回答：“每次出发执行任务，登机时都抱定有去无回的决心，只不过死神放过了我。”相比家族中的另外两位空军飞行员烈士——马庆芳的姨父柳东辉和表舅翁心瀚，马豫是幸运的。作为西南联大的一名学子，马豫投笔从戎，以实际行动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马豫与妻子摄于1994年秋

姚依林同志早期革命生涯



1981年，姚依林副总理（左）与清华学生座谈

姚依林，曾用名姚克广，1917年9月6日出生于香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曾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第十一和十二届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第十三届政治局常委。1994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不平静的清华园

姚依林祖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祖父辈是个大家族，父辈中几个兄弟都担任过北洋政府的高官。他幼年丧父，随母亲投奔了江苏武进的二伯父。母亲擅长英语，曾在洋学堂任教，思想比较开明，她把孩子们带到上海读书，希望他们学有所成。

姚依林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上高中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

变，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在抗日爱国运动的激励及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他寻觅探索着，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刊物，并与上海青年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抗日示威游行。

1934年秋天，姚依林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初入清华就遭遇到“拖尸”（英文“TOSS”的译音，清华学生照搬的美国高年级学生欺负入学新生的恶作剧）。新生们对此行为异常气愤，群起反对。姚依林和新入学的同学们团结起来，发表了一个《反TOSS宣言》，在学校里形成了一个“反TOSS”运动。

当年的一年级新生有300多人，由此涌现出一批活动积极分子，从此他们抱成了团儿，例如黄诚、吴承明、杨述、杨学诚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学会，号召同学们学习世界语。当时的世界语学会分为两派：一派是绿色世界语，是和平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用世界语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姚依林参加的另一派则是以清华大学为主的红色世界语派，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用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姚依林在世界语学习班上认识了清华邮局职员王慎之（王经方，共产党员），两人共同创办了名为《北方话新文字》的不定期刊物。他们时常在学校夜里12点熄灯后点燃蜡烛，刻版印刷，一直忙到凌

晨，然后将刊物通过邮局分发出售，由此联系、团结了校外的很多有志之士。

1935年初，清华中国社会科学界联盟组织了一个现代座谈会，请旅欧经苏联回国的冯友兰教授作报告。冯友兰讲了旅欧见闻，并如实介绍了苏联的情况。不料国民党宪兵三团隔日便来清华抓走了冯友兰，说他是共产国际特务。虽然三天之后蒋介石下令释放了冯友兰教授，但冯友兰教授因被关押非常气愤，清华同学们也因此事认识到时局的严峻。

当时国民党宪兵三团异常嚣张，动不动就去清华大学抓人。姚依林很痛心地看着一些高年级同学被抓走，其中大多数是清华校园内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他记得其中一位山西籍同学李一清（共产党员）被抓走，后被释放。宪兵三团的恶行激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慨。

50年后，姚依林回忆说：“由于到清华大学以后接连地遇见了几件事，才把我这样一个有民主感情、对共产主义有朦胧认识的青年最终推到了革命阵营中去。”

革命生涯的开端

在红色世界语派的活动中，姚依林结识了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周小舟，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换对时局和社会的看法。后经周小舟介绍，姚依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一天，周小舟来清华大学找他，给他带来了武卫会的传单《告同胞书》，要他翻印散发。他会刻蜡版，便立即通过在清华学生会中办事的同学取来了印刷工具，将传单很快印好，趁夜间无人时去清华图

书馆张贴。

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北平的街头也出现了许多灾民。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北平党的组织要领导群众开展水灾救济活动。武卫会北平分会负责人周小舟召集彭涛、黄敬（俞启威）、姚依林和女一中学生郭明秋（郭桂英）等人在西山开会，研究为黄河水灾发起救灾活动。会上讨论通过了组织一个公开的群众团体——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曾任女一中校长的孙荪荃同情抗日活动，对此事立即表示支持。8月29日，黄河水灾赈济会在南长街的女一中正式成立，女一中学生吴闰箴为临时主席，姚依林为记录员并担任了秘书长。

黄河水灾赈济会成立之后，很快有20多个学校的学生进步团体参加进来，公开到社会上为救济水灾募捐。姚依林作为秘书长，要组织大家出去募捐，还要管好钱，工作异常繁重。这个阶段，在西郊清华上学的他却经常在城里活动，白天东奔西跑，有时夜晚就借住在女一中或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旅舍。因旅舍房租昂贵，他和黄敬合租了一间破旧的民房，住了几个月。

从当年8月到10月，赈济会共募集了2000来块银元，大部分捐给了山东赈灾。剩下的几百元，加上“一二·九”游行后不久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的100多块银元，还有清华大学张申府、民国大学潘怀素、中国大学吴承仕等左翼教授捐的200块银元，都成为后来“一二·九”运动的活动经费，用来印传单、出版《学联日报》等刊物。

这年11月初，经周小舟介绍，姚依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参与组建北平学联和领导 “一二·九”运动

1935年6月至7月，日寇通过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日寇又扶植汉奸在通县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了冀东22个县。华北面临沦亡的严重威胁。

这时，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下，北平学生在募捐救灾活动中已形成了一支有力的基本队伍。救灾工作结束之后，应当如何把北平学生更好地组织起来？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建立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11月18日，由十多个学校发起的北平学联在女一中正式成立。当天的会议指定燕京大学学生陈絮（陈矩孙）起草学联宣言，推举郭明秋（女一中）为学联主席，姚依林（清华大学）为秘书长，孙敬文（镜湖中学）为总交通，邹鲁风（东北大学）为总纠察，黄华（燕京大学）为总交际，北平工委宣传部长彭涛担任学联的党团书记。学联机关

设在女一中，学联的刊物或传单则由南池子一个私人的大学出版社承印。

在此期间，中共北平市工委领导人内部在是否可以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公开请愿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彭涛和周小舟、谷景生等人认为，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应利用请愿活动等形式宣传抗日。王学明和冷楚等人认为，还是应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北方苏维埃，不同意和平请愿。中共河北省委在听取了两种意见后，决定支持彭涛等人的看法，并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李常青为河北省委特派员指导北平临委的工作，后兼任北平临委书记。

北平学联成立后，立即着手酝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等两项决议。6日，学联再次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就在这一天，传来了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这是国民党当局屈从日寇的野心，任凭华北逐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又一卖国行径！

北平临委得到消息后果断决定发动一次抗日救亡的请愿游行。由于北平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北平学联担负了贯彻这一决定的历史重任。12月7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20余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9日组织全市同学向北平国民党当局请愿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



1934年至1935年，清华开展抗日运动的学生代表，
后排左5为姚依林，前排右2为赵石

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会议研讨了游行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对游行的组织工作进行了部署。

12月8日晚，彭涛、黄敬、姚依林、孙敬文和郭明秋等人又在女一中碰头，检查准备情况，商定游行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姚依林和郭明秋在那里指挥，孙敬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交通。

“一二·九”游行用的传单，早在12月6日就印好了。8日晚，姚依林找了一辆车到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取传单，把传单运到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进行次日示威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口号和宣言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声。游行口号是按照彭涛和学联的意见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等，没有提“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保卫苏联”等口号，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姚依林在《一二·九运动回忆》一文中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后，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的。”

12月9日一早，姚依林和郭明秋即去西单亚北咖啡馆二楼“喝茶”。孙敬文、孙荪荃、张申府也去了。不久就听说原定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京两校的队伍因军警关闭城门，被阻于城外。指挥部已无法且不必等待与城外学校取得联系，便决定离开咖啡馆，靠近学生队伍。

因清华、燕京两校的队伍和原定的两

校请愿代表未能到达，集中在新华门前的同学们当场推选出中国大学董毓华、东北大学宋黎和北平师大于刚等12名代表临时草拟了请愿书，进入中南海向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的何应钦请愿。学生们在新华门前开大会、示威、呼口号。但何拒不接见学生代表，只派出其秘书敷衍。请愿未成，指挥部决定按计划将请愿转为游行示威，宋黎担任队伍的总指挥。

游行队伍在西单和西四冲破军警的两道封锁线，奔向沙滩、王府井，一路上高呼口号，声势浩荡，而且越走人越多。其中有新加入的辅仁、北大等众多学校的大批学生以及市民。下午3时走到王府井，游行队伍已有数千人。当天北风呼啸天气严寒，姚依林穿着一件老羊皮袄，和指挥部一起，跟随着游行队伍就近指挥。

这一天，指挥部姚依林与郭明秋在西单街头都挨了军警的皮鞭和枪托，但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影响对游行示威的指挥。

“一二·九”运动喊出了广大爱国学生拯救民族危亡的心声，点燃了他们心中抗日救国的烈火，促使北平各校学生会迅猛发展，爱国学生的队伍空前壮大。同时，因为组织发动这次运动的时间只有两天，许多学校和同学没能参加12月9日的请愿游行。例如，因没有接到通知，请愿之后游行队伍经过沙滩时北大同学才去敲钟集合队伍；东北中山中学未能参加的同学迫切地希望北平学联“再来一次”；清华、燕京等校当天未能进城的1000多名学生心里更是憋着一股劲。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北平学联在市委的领导下，决定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多次开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85年，姚依林（前排左1）、何东昌（前排左2）等来校出席“一二·九”运动50周年、“一二·一”运动40周年纪念活动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坚持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将第二次大游行定在16日这天。

12月15日晚，北平学联在王府井南口的长安饭店开会。由姚依林和郭明秋出面开房间，到会的有彭涛、黄敬、孙敬文、董毓华及李常青等人。他们以打扑克作掩护，商量和确定研究次日的行动，检查示威游行的准备情况。此时中共河北省委任命的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已抵北平，正和李常青办理交接。

16日上午，学生和市民在天桥聚集了两三万人，天桥市民大会顺利召开。黄敬被拥上一辆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市民大会当场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8个决议案之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由东北大学的宋黎和邹鲁风担任指挥。游行队伍按原定路线准备从前门进入内城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地点）示威抗议。哪知前门已被军警关闭，游行队伍便在前门外火车站广场举行了第二次市民大会。当晚，宣武门内

外的学生队伍分别受到大批军警的野蛮镇压。当天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多人受伤。反动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满腔义愤。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组织得更好，规模和声势都超过了“一二·九”游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行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

12月16日晚，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高慧如和李润娥在西单辟才胡同彭涛的家中开会，研究讨论运动怎样深入持久地发展。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同中共北平市委交换的意见。后来彭涛先走了，剩下的同志继续讨论。黄敬、姚依林还互相摔跤取暖，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一二·一六”游行之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令师大教务长杨立奎通过师大学生会负责人高锦明（敖白枫）和江明（江文彬），请学联负责人在12月18日谈话，谈话方式是由杨立奎出面在西单请客吃饭。北平学联决定由黄敬、姚依林等人去参加会谈，由黄敬出面作答。会上，杨立奎提出要北平学联接受国民党领导，遭到了学联代表的严词拒绝，会谈无果而终。

12月20日，北平市社会局发出训令，强迫各校提前放假。23日蒋介石令各省市专科以上学校派学生代表和校长到南京“聆训”。

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12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召集北平学联领导骨干开会，决定组织北平、天津各校学生的宣传团，由平津南下，到农村扩大抗日宣

传。北平学联随即开会贯彻市委决策，在燕京大学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反对南京“聆训”，开展南下宣传。

南下宣传队整装待发之际，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介绍姚依林和市委书记林枫见了面。林枫在谈话中提出，希望北平学联协助解决一个问题：设法联系上居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已长时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希望能通过鲁迅先生恢复与中央的联系。1935年12月31日夜晚，林枫将河北省委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交给姚依林，姚依林立即找到东北大学认识曹靖华教授的邹鲁风同学与林枫见面。在曹靖华教授的帮助下，邹持信到上海见到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很快就帮助河北省委转交了信件。

1936年1月2日，平津学联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彭涛担任宣传团党团书记。宣传团4个分团于1月3日陆续出发。姚依林、郭明秋等留守北平。南下宣传团出发不久，北平市委正式改组了北平学联党团，姚依林任党团书记，黄敬、郭明秋、孙敬文、王其梅为党团成员。南下期间，留守北平的学联党团与宣传团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时，北平学联已经在女一中待不住

了，转移到了汇文中学的一个地窖子里。这个地窖子是汇文中学学生会的会议室，成了姚依林的栖身之所。他还找了清华大学杨述等几个人在这里编起了《学联日报》。南下宣传团出发的十几天内，《学联日报》向各方报道了相关的详细情况。

姚依林和黄敬曾派孙敬文和另一唐姓的同志代表学联慰问宣传团，并带去200元钱。宣传团党团成员江明还曾回北平向姚依林汇报过工作，听说宣传团党团内部对是否在保定收兵有不同意见，姚依林让江了解一下情况，做些工作。

1月下旬，南下宣传团回来后，林枫找姚依林和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姚依林的住处开会，商定筹建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新的青年组织。随后，彭涛和学联党团成员黄敬、董毓华、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在西山开会总结南下宣传，决定第一、二团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与第三团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北平民先在北师大成立，之后天津等地也相继建立起民先，民先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壮大，为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各抗日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

三次脱险

1936年2月20日，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把抗日救国活动称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危害国家”。从2月21日开始，北平当局对进步学生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当时北平学联的办公地点已迁至中国大学，中大同学每天有人给学联放哨。一天，放哨的同学突然跑来，向姚依林、黄



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刘达校长（右）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在一起

敬和女一中的魏宜娴报告：“快走！警察来了！”他们立即跳墙逃跑。姚依林跑到后海附近亲戚家藏身，恰好碰到母亲来北平找他。母亲非常担心儿子，说想卖掉杭州的房子，用这笔款送儿子到苏联去留学。“我革命在中国，干吗要去苏联！”儿子干脆地回答。最后，母亲终于被儿子说服。自此之后，她不再勉强儿子走她安排的路，而是儿子革命到何方，她都心甘情愿、不辞辛苦地追随到何方。

清华大学因前一个学期提前放寒假未考试，通知学生2月29日返校补考。姚依林就是否回校参加考试的事有些犹豫，便去征求林枫的意见。林枫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29日早上，姚依林从城内米市大街坐校车回清华，还带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在校车上看。校车到了西校门口，没想到正赶上大搜捕，一下车就被警察当作嫌犯抓住，关在校警室。接着，警察把蒋南翔、方左英也抓了进来。不久，清华的200多名民先队员们闻讯冲过来，把警察特务赶走了，从校警室将他们3人救出。

当日下午，宋哲元的29军、保安队和警察包围了清华大学，要进校抓人。党支部书记蒋南翔立即召集党员和民先队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布置应对办法。姚依林、黄诚被安排到冯友兰教授家里去躲避。晚上两点钟的光景，军警来冯友兰家查问，被冯友兰应付走了。

5000多军警在学校各处搜查，到所有教授家都去查问过，闹腾了一晚上，“黑名单”上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抓到，只好胡乱抓走了二十几人回去交差。第二天早上，见军警已撤走，姚依林和黄诚分别离开冯友兰家，就此脱险。

针对反动军警在各校大搜捕的情况，学联党团准备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对策。3月5日，姚依林和孙敬文一起去党团成员王其梅的住处开会。到后，却发现王其梅和魏宜娴已被特务拘押在住房内。特务对姚、孙进行了一番盘查。

幸而他们应答机智，躲过了一劫。两人离开王其梅住处后，姚依林乘电车赶到盔甲厂的美国记者斯诺家，正好把要去开会的黄敬拦下来了。

为防止国民党逮捕，组织上要姚依林隐蔽一段时间。6月初，党组织调姚依林去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自此，他结束了北平的学运生涯，转到另一个战场。18岁的姚依林，从参加武卫会到离开北平，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50年后有人问他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是哪一段，他深情地回答：“最难忘的还是‘一二·九’运动。”

转战天津，参与组织冀东大暴动

到天津后，姚依林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主持编辑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刊物《世界》，并协助编辑北方局机关刊物《长城》，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批平津学生有组织地撤离，多数从天津乘船去山东再转赴各地。作为曾经的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此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为平津学生撤离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新形势下重新组建了天津的民先领导机构。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中共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支部书记周彬（张淑贞），后来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平津沦陷后不久，姚依林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他利用自己大家族在天津的社会关系，在领导华北各界

抗日救国联合会时，积极开展上层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筹划了冀东大暴动，姚依林参与了冀东暴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并成立了党团，姚依林为党团成员。

1938年5月，天津武卫会做出冀东大暴动的具体安排，并决定成立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组建冀东抗日联军。为同党

中央接通电信联系，姚依林设法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使党中央能够及时指导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8年7月6日，以滦县港北起义为开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为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转自《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沈学明、李炎主编）

杨学诚：革命青年的光辉典范

○杨冬明 何吉林（1970届无线电）



杨学诚烈士

杨学诚，1915年8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宁岗村。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转哲学系学习。

1935年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以后又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城西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南下，9月初到武汉，根据中共长江局指示组建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组建武汉青年救国团，任青年救国团总团书记。翌年6月，

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任省委委员、省青运部部长。

1938年4月起，历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豫鄂边区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江南指挥部）政治委员。1942年当选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

1944年3月7日病逝于抗日前线的大悟山高家洼，时年29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从寒门学子到热血青年

杨学诚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杨祥和给地主当长工，母亲黄氏操持家务，养育杨学诚兄妹5人，家境十分贫困。

杨学诚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因家贫无钱上学，经常到私塾的窗下偷听先生讲课，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学着写字。父亲感其诚，卖掉仅有的一点薄地，送他入私

□ 纪念一二·九运动90周年

塾读书。后来本家二伯父杨祥华见他既聪明又勤奋，就资助他到汉口蔡家巷新民小学学习。1927年杨学诚考入武汉市第一中学，时值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少年杨学诚心中种下了向往社会进步和革命的种子。

1930年他考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由于经费困难，他只好白天读书，晚上做工。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武汉和其他全国大城市一样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杨学诚这位热血青年，早已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官僚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积极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他斗争坚决、言辞激烈、令人注目，是学生运动的中坚骨干，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逮捕。由于武汉三镇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大力营救，才获释放。通过这次斗争，使他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也更坚定了献身革命的决心。

爱国学生运动的“少壮派”

1934年秋，杨学诚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杨学诚积极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

为了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华北农村，党通过北平学联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杨学诚在由清华、燕京、辅仁、中法等校学生组成的第三团中担任先遣队员，每天打前站，给全团同学准备伙食、住宿，每天天没亮就起身。数九寒天的北方，严寒刺骨，杨学诚没有自行车，徒步跟着骑自行车的先遣队员赶路，特别辛苦，完全是竞走式的半跑半走，如此奔波了一个多星期，当宣传团走到固安的时候，他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

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南下宣传团三团半途被迫返回北平。返校后，杨学诚参加了爱国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他在参加民先组织的救亡活动中，一贯积极、认真和负责。在寒风刺骨的冬夜，他冒着冷风守夜；在开大会的时候，他为会场巡逻放哨；一切比较艰苦且一般学生不大乐意做的事，都是他积极去做。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原本温良谦逊的杨学诚，性格也变得更加激烈和坚定，同学们都视他为“少壮派”。他对于恶劣倾向，如眼睛对灰尘一样不能容忍，一见到有对工作不负责的事情，他会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至于对造谣、污蔑、蓄意破坏救亡运动的少数右翼学生，他就更加怒不可遏。每逢这些卑劣的家伙胡吵胡闹，在开会时故意扰乱会场秩序的时候，他常常气得面红耳赤。在清华学生会主办的一个反法西斯晚会上，有个丧失民族天良的东北籍学生，跑到会场来破坏捣乱，一面破口大骂，一面打翻了立在会场门口写着抗日口号的红绿灯笼，乱撕会场标语。杨学诚带头振臂而起，率领同学们给了他一顿迎头痛击，使他后来再不敢出头捣乱。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军警到清华



准备出发
参加南下宣传团的杨学诚

大学抓人，清华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北平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和清华民先纠察队长方左英相继被捕。杨学诚和同学们奋力将蒋南翔等夺回，并且将开到学校来的几辆警车砸毁。傍晚，又发生了5000军警包围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的严重事件。在那几天紧急的日子里，杨学诚毫不顾及自己的危险，为蒋南翔提供掩护，帮他打听消息，最后帮他设法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大搜捕之后，白色恐怖一直笼罩着清华园，特务活动猖獗，右派势力气焰嚣张。面对这股政治寒流，清华民先重新改选了领导班子，选举杨学诚、李昌等5名同学组成新的大队部，从此清华民先又活跃起来，他们同右派学生组织的“护校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河北北平高中一位18岁的学生郭清被捕入狱后，遭到惨无人道的拷打和折磨，于3月9日惨死狱中。北平学联决定于3月31日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郭清的大会，一位东北籍学生弄来一口白木棺材，摆在礼堂中央，棺前挂着郭清的速写像，会场一片悲痛的气氛。由于国民党军警封锁了校门，愤怒的学生们把墙拆开了一个缺口，打头阵的清华学生杨学诚、李昌等抬起棺材就冲上街头，显示了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

在党组织中成长为成熟的革命战士

当时清华进步同学把入团叫作“入中学”，入党叫作“入大学”。杨学诚经过多时的观察，机敏地发现李昌似已是在党的人了。有一天杨学诚和李昌、凌松如等在宿舍闲谈，杨对李说：“老李，看样子你入了‘大学’了，你不能一个人‘入大学’，把我们丢在外边呀！”李昌直率地答道：“好吧，我就做你们的入党介绍

人。”杨学诚于1936年5月6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学诚入党后，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进步十分鲜明。入党前，他在救亡运动中还只是一位怒目挥拳、见义勇为的斗士；入党以后，经过党的教育，他逐渐地习惯于全面思考问题、分析是非、以智取人、以理服人。

同年秋，杨学诚担任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当时清华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最激烈的斗争阵地之一。各派政治势力交混庞杂，就是左派学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杨学诚头脑非常清醒，他在各种会议上，都以自己在演说和雄辩方面的出色才能，极有说服力地宣传着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批驳了国民党卖国投降的无耻滥调。在一二百人的民先大会上，他常常能以一篇热烈的演说，使大家都振奋起来。斗争的实践使他成为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之一。

1937年5月，作为北平学生运动中的党员代表之一，他和黄敬、李昌、林一山一起，随着刘少奇、彭真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并亲自同北方青年谈了话。杨学诚和李昌在会议上发了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见，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学生的思想。后来，毛主席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的结论部分，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使杨学诚心悦诚服，并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返回北平后，杨学诚任中共北平市学委委员、城西区委书记，参与领导北平的

学生运动。

以身殉国，血洒疆场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杨学诚和蒋南翔一起组织进步学生撤离。1937年7月29日上午，他俩设法通过日寇的重重岗哨返回清华园，分别将藏在那里的秘密文件烧毁。后又集合起城内部分民先队员，撤到天津并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民先队员北上参加抗日游击队，另一部分南下传播抗日救亡的火种。杨学诚和蒋南翔等随队南下，先后建立和领导济南和南京的平津流亡同学会，并为平津流亡学生会的主要领导成员。

1937年9月初，杨学诚根据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的指示，从南京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委青运部长，把“一二·九”运动的火种播向武汉三镇。在武昌三道街39号、15号两栋房子里办补习学校，作为活动据点。杨学诚根据“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工作的经验，认为必须组织一个包括工农青年在内的青年骨干团体，才能带动广大青年。经与蒋南翔等商议后，决定在12月9日那天召开“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宣布成立青年救国团，会议由杨学诚主持。那天，会场的气氛很热烈，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救亡歌曲。会后，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从武昌走到汉口，热烈的抗日气氛大大活跃了武汉三镇，推动了抗日救亡的浪潮。接着省青委又召开了会议，围绕抗战形势、青年救国团的性质和宗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1937年12月28日，武汉青

年救国团（简称“青救”）正式诞生，杨学诚担任总团书记。青救的发展异常迅速，1938年武汉就有青救团员1万多名，再加上各地团员包括农民达5万多名。当时曾有“北有民先，中有青救，南有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之说。他们活跃在工厂、矿山、农村、街头，发动市民，使武汉三镇抗日热情沸腾起来。

当南京沦陷，武汉成为日寇进犯的主要目标时，杨学诚同姜纪常、孙世实等同国民党省党部经过三番五次的斗争，终于组成了武汉第一个救亡宣传组织——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该团逐渐发展到30多个队，在湖北各地城乡宣传抗日，有力地推动了湖北省的抗日救亡运动。

武汉失守前不久，他在与蒋南翔商议工作时，见到清华老同学何礼，他说：“老何，我们正在商量下乡打游击的事。我是湖北人，更得下乡去自己干了。你帮我买个滚筒油印机，这样印东西快一点。”

1938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派他前往鄂中应城开辟鄂中根据地，他率领一支只有8支枪的“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首先拉到大洪山区的丁家冲准备打游击。他很珍惜这8支枪，日夜不离，甚至亲自站岗放哨。正是这支队伍和其他不断汇集来的队伍最后组成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后来成为鄂中我党领导的主要抗日武装。

杨学诚本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当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他拿起武器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他很快就学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领导者。先后担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鄂中区党委组织部长、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江南指挥部）政治委员、鄂豫边区

行政公署副主席。

在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6年，杨学诚生活在前线，战斗在前线，领导十分复杂的抗击敌、伪、顽的斗争，终致积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肋膜炎。他在已不能骑马的情况下，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鞠躬尽瘁。最后不幸于1944年3月7日在转战途中病逝于湖北省大悟山北麓的高家洼。

杨学诚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干部，经过艰苦锻炼和战火考验，最后成长为战斗在抗战前线的指挥员，把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转自《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沈学明、李炎主编）

一二·九：父亲熊向晖革命生涯的指路明灯

○熊 蕾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原名熊汇荃。1936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蒋南翔、杨学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得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国常任代办、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于父亲熊向晖来说，“一二·九”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更是他找到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灯。

寻找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发生时，我父亲正



1991年，熊向晖（右）与宋平两位学长亲切交谈

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读高三，时年16岁。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是当时全省最好的中学，荟萃了来自不同省份的优秀学子。父亲在南京中学高中部的学习成绩优异，在他们1936届毕业生纪念册中，一位名叫杨承栋的同学这样描述父亲：“明敏的头脑，干练的才能！在功课上，获得全级最高的Marks（分数）；在年龄上，是全级最小的数字——十七。”

这位杨承栋比我父亲年长两岁，后来改名许立群，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宣

□ 纪念一二·九运动90周年

部常务副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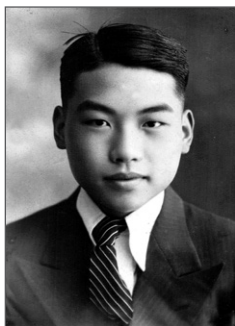
父亲不仅学习成绩出众，而且热心社会公益活动。他是这一级学生会的代表，也是毕业纪念册编委会的委员。为了顺利出好纪念册，他们还发起了募捐活动，父亲兼任募捐委员会的委员，很是活跃。

南京中学的校园宁静幽雅，但是当时的中国却风雨飘摇。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沈阳，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3000万中国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战，面对日益猖獗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几乎无所作为。

我父亲在南京中学高一期末，1934年6月，发生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的事件。整个事件中，日本的无理骄横与中方国民政府对日方的唯唯诺诺，给年轻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令他们愤愤不平。

16岁的父亲虽然年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颇有一些经历了。他4岁时就启蒙念书，那时我爷爷在山东做官。可是军阀混战，他的官也不好做，北伐战争之前，才40出头的爷爷就“告老还乡”回到老家安徽凤阳。可是爷爷“衣锦还乡”不久，家里就遭到土匪洗劫，还把我5岁的叔叔绑了票。虽说不久之后当地政府联合红枪会剿灭了那股土匪，三叔全须全尾地回了家，但那段胆战心惊的日子给他和全家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除了匪患，还有兵乱。在北伐军打到凤阳之前，为祸地方的主要是军阀孙传芳的兵，他们鱼肉乡民，尤其是奸淫妇女，



中学毕业照
一九三六年，熊向晖

恶名昭彰。父亲15岁的二姐、13岁的三姐和12岁的四姐每天在漂亮稚嫩的脸上涂上黑灰，一听说来兵了，就赶紧躲藏在后院的柴堆里，惊恐万状，让当时只有7岁的父亲永远都不会忘记。

父亲在凤阳读小学时，北伐军打到凤阳，他和全城老百姓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北伐军。他曾回忆说，北伐军士兵精神抖擞，他们身穿灰布军衣，打着绑腿，戴着或背着斗笠，上面写着“国民革命军”。他们不住民、不扰民，受到凤阳百姓的热烈欢迎，家家给他们送茶水。他们在凤阳与孙传芳的军队作战时，老百姓自动组织抬担架运送伤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有不少潜伏下来，到农村教书。凤阳的中小学也来了一些这样的共产党员。父亲说，他们隐蔽了共产党员的身份，用巧妙的办法宣传革命思想，选课有意识地加强近代史和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介绍鲁迅等人的书给学生看。这是我父亲最早接触到共产党，虽然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但是对他们非常有好感，因为这些人有学问，有见识，有本事。他们推荐的那些书，我父亲非常喜欢

看。他曾经回忆说，那时候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受学生欢迎，鲁迅的书，还有茅盾的《子夜》，大家都抢着看，最受青年们欢迎。

父亲在南京中学读高二时，学校转来了一位新同学，名叫郑代巩。郑代巩年长我父亲四岁，来自贵州。他在贵阳县立中学读书时，联合学校里的爱国青年与贵阳各校学生共同组建“抗日学生救国团”，积极宣传抗日，在贵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抵制日货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带领同学砸碎了有他父亲股份的恒星益百货商场，以表明自己抗日的坚决。他的父亲大怒之下，将郑代巩送到首都南京，转入南京中学，由自己的友人“严加看管”。

友人可管不住这个思想活跃的年轻人。郑代巩很快就找到了我父亲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大家一起阅读、讨论邹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李公朴创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学习了《读书生活》连载的《大众哲学》——这是青年哲学家艾思奇面向普通大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优秀著作，在当时追求社会进步的读者中影响极大。

我父亲积极参加了这些读书活动。幼年时在家乡目睹的社会不公，少年时经历的国耻国难，使得我父亲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萌发了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从这些进步读物中，他渐渐认定救亡图存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他所追求的真理也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可是，他却不知道去哪里找共产党。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波及全国，父亲和他南

京中学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也参加了请愿集会和声援北平学生的示威游行。父亲认定，北平是“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力量，这样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背后一定有共产党的支持甚至领导。要找共产党，去北平，上清华大学，准没错！

上清华，找共产党

除了要找共产党，我父亲向往清华大学也因为他喜欢清华的现代气息，不像北京大学那么古老，也不像燕京大学有教会学校的神学色彩。而且清华大学有很好的学生宿舍，不像北大需要学生去租公寓住。

我父亲1936年夏天从南京中学毕业，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武汉大学和另外一所大学。清华大学那年在全国只有三个考点，分别在北平、上海和武昌。当时父亲家正好在武昌，其他几所学校也在武昌设有考点，所以他就回家投考。几所大学相比，难度最大的还是清华大学的考题，但是父亲觉得也最有意思。我父亲报考清华文学院，不知道总共考了几门，但是一些考题他几十年之后还记得很清楚。比如历史卷有一道考题给出40个历史人物姓名，要求考生按年代顺序把他们排出先后。语文考题中，有成语解释，每个成语给出四个选项，要求考生划出一个正确的，如“汗牛充栋”，给出的选项是汗多，牛多，洞多，还是书多？中文作文考题是“我的衣服”。英文作文考题则是与黄包车夫对话和篮球比赛最精彩的片段。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百分之五。

结果父亲这四所大学都考上了。清华

大学的录取名单还登在了报上。上哪所大学呢？当时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是400元，而武汉大学只需要100元。我爷爷奶奶当然不想让我父亲去北平。除了费用问题，还担心当时的北平随时都有被日本侵占，成为第二个伪满州国的危险。他们希望我父亲选择武汉大学。我父亲虽然一向比较乖，这次却坚决逆反，一定要去北平念书。他当然不能告诉家里人他去北平的目的是找共产党，不过却把非去北平念书不可的意愿表达得很明确。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如果父母不让他上清华，他就上北平大学，这所大学不仅免学费，而且管饭费和旅费。

巧合的是，我爷爷全家搬到武昌后，一直租住在闻一多的老父亲家。我爷爷一家住在楼上，闻老太爷一家住在楼下。闻一多当时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闻老太爷一直都很喜欢我父亲，认为他勤奋好学，听说我父亲考上了自己儿子执教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非常高兴，跟我爷爷说，清华可是个好学校，我儿子就在那儿当教授，孙子立恕也在那儿念书，北平虽然有危险，但是现在不会有事儿。他还说要写信告诉闻一多。

闻老太爷的态度，说服了我爷爷奶奶。就这样，他们终于同意我父亲去北平清华大学读书了。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17岁的父亲告别了家人，只身乘火车来到北平。

每当想到父亲报考清华大学的目的一时，我就特别感慨。清华大学从建校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众多莘莘学子，有几个是为了找共产党考清华的？而指引我父亲来清华找共产党的，就是“一二·九”运动。

在清华，找到共产党

我父亲可以说一出北平的前门火车站，就找到清华的党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清华民先队组织的新生接待站，就在火车站外面。

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的南下宣传团为基础，1936年2月1日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正式成立，是公开的群众组织，在北平各高校都有分队。在全国抗战情绪高涨的形势下，民先队组织发展迅速，到1936年底已在全国30多个大城市设立分部，甚至国外的巴黎、里昂、东京都有民先分部。

接待我父亲的是一位十级学长。他带着我父亲坐上从前门火车站到东单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来回穿梭的通勤车，一路上大谈“一二·九”的事情。到了青年会，则有校车开往位于西郊的清华大学。从1928年清华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后算起，我父亲他们这一级应该是1940年毕业，为清华12级。

新生注册是在体育馆，在清华第一个体育场西大操场西侧。体育馆内地板光滑，我父亲还不习惯走这样光滑的地板，两次滑倒，才到了注册的地方。注册第二天，我父亲去明斋看闻老太爷的孙子闻立恕，他是闻一多一位哥哥的儿子，比我父亲高两级。和闻立恕同一寝室的是他的同班同学、清华物理系学生杨学诚——对清华党史有点了解的都应该知道他。杨学诚与闻立恕一样都是1934年从湖北考入清华的。杨学诚正是当时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之一，不久前在1936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闻立恕从他祖父的家信中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杨学诚，故而杨对

我父亲很注意。

闻立恕带父亲拜访了闻一多教授回到明斋之后，杨学诚就和我父亲闲聊，很注意了解“一二·九”运动在南京的情况。杨学诚考入清华后，一直是埋头读书的好学生，从来不问外事。但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挺身而出，成为运动的学生骨干之一。“一二·九”运动后的南下宣传、民先队成立，杨学诚都积极参加。1936年3月10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爱国活动被捕入狱后，惨遭折磨而死，愤怒的北平大中学生在3月31日组织了抬棺游行，杨学诚也是带头人之一，在斗争中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之一。父亲说，杨学诚相貌英俊，面庞白里透红，为人诚恳，谈话说到兴奋时双眼闪闪发光，炯炯有神，好像能看透人心。跟他对谈的人，简直看不到他心里有半点私心。他的演讲非常富有感染力。

我父亲跟杨学诚讲了南京学生声援“一二·九”的活动，还把他主编的毕业纪念册给杨学诚看，里面收录了他写的两首诗：《哀辽宁》和《三年》。这本纪念册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的学生和老师的主导思想，就是抗日，以及对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不满。

几天之后，杨学诚带我父亲去见了蒋南翔。蒋南翔此时是清华民先队的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一二·九”运动那句响彻全国的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出自蒋南翔。他们谈时局，谈对抗日和对蒋介石的看法，蒋南翔听的时候多，偶尔插一两句话，提一些问题。这之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民先队。

9月1日，在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按当时清华的惯例，我父亲他们这些12级的新生，先在同方部集中。每个新生都戴上用玻璃纸折成的帽子，参加开学典礼。到了大礼堂，高年级学生已经就座，把中间位置留给12级新生。

清华大学当时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其中农学院设在长沙，已经建好但还未招生。教学承袭美国大学的教育体制，几个学院大一新生都不分系，而是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上大课。文学院大一的授课老师都是名家。教逻辑的是金岳霖先生。冬天清华的暖气很暖，金先生外罩中式皮袍大衣，里边却是西装。他进了教室就一层层脱，见此情景学生们笑，他也笑。教经济的是陈岱孙先生。英文由外文系主任王文显先生亲自担纲，教材也是他自己编的，或是英文短篇小说，或是杂文，每篇各有一个中心。比如一篇写植物园，里面是各种花卉；一篇写动物园，有对各种动物的描述；一篇写音乐会，那是各种乐器的荟萃及欣赏。这样的教材既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也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词汇量。教语文的是朱自清先生，余冠英先生担任助教。

大部分课都安排在上午，下午的课不多，我父亲和很多同学就喜欢去图书馆。下午四点以后，大家就去体育馆。除了做器械操，还可以打篮球。不管多少人，大家都一起打，学生们称之为“斗牛”。去体育馆健身，每人都会有一个locker，就是储物柜。这东西我父亲还是到了清华才第一次见到。如果不打球健身，还可以去游泳。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馆当时在全国都很罕见。

周末的时候，父亲就会和杨承栋（许

□ 纪念一二·九运动90周年

立群)等一起考上清华和北平其他大学的南京中学同学聚一聚,或者一起游览。从学校西门外的圆明园遗址、颐和园,北平城里的北海、故宫,到需要从学校附近的五道口乘火车才能去的八达岭长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如此优美的环境,如此优越的条件,清华大学为什么会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一个发源地?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总共不过900人,其中不乏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竟有200人参加民先!为什么会这样?我父亲说,这主要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国不断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屈辱历史,以及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残酷现实,太容易激发起年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了。远的不说,就是与北平紧邻的天津,自1936年4月开始,天津的海河几乎天天都会出现浮尸,半年之内就打捞出400具之多,几乎全部是20到40岁的男尸,均为赤身而亡。他们双手被反捆,有被殴打的痕迹,有些面目已被打烂。后来调查发现,这些浮尸,大部分是河北、山东逃荒来到天津的难民,被驻津日军强征当了劳工,工事完成后为



1936年9月,几位南京中学同学在清华大学校园合影。左1为许立群,他身后手搭在他肩膀上的是熊向晖,前站立者是郑代巩,右1是夏秉恒,右2是王家珍

防止泄密和不付工钱,日本人利用津门帮派组织杀人害命,丢进海河。真相大白之后,政府怕得罪日本人,竟不敢声张。

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哪个热血男儿还能坐得住呢?所以,当时清华大学很多学生加入民先,参加爱国活动,是很自然的事。而我父亲已经从这些抗日活动中产生了进一步的要求,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他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献身。

“一二·九”周年宣誓入党

清华党组织了解了父亲的心愿,决定由杨学诚和纪毓秀两位秘密党员负责联系他,抓紧对他的指导和考察。纪毓秀是江苏宿迁人,1935年从南京女中考入清华大学,先入工学院,后转到文学院外文系。她曾经也是以“读书救国”为宗旨的好好学生,但是对民族危亡的担忧促使她在“一二·九”运动中冲锋陷阵,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华民先分队的队委,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清华民先队开会,通常都在晚上,地点是生物馆大教室,当时比较偏僻。开会时门外有人放哨,里面门帘子拉下来。队员相互之间知道,但对外都是保密的。

在1936年9月初的民先队大会上,我父亲成了清华分队的五个队委之一,而且是12级新生当中唯一的一名队委。他最初负责民先队的宣传工作,刻蜡板、印传单和宣传品,然后秘密送到各个宿舍。通常是夜深人静时,从门缝里塞进去。宣传工作也包括海燕歌咏团的活动,每周几个晚上,在大礼堂的地下室,总有百来个学生参加,唱救亡歌曲,唱苏联歌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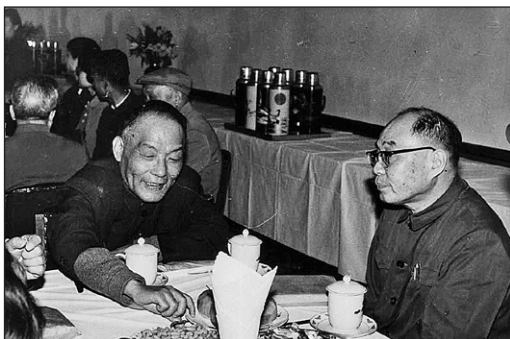
《保卫马德里》等。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里有个声光电影院，1949年以后改为儿童剧场，那是当时上映苏联电影最多的一个场所。每到有苏联电影上映，同学们就想方设法买票去看。苏联电影《大马戏团》上映时，还没开始，清华的同学就唱起了片尾曲《祖国进行曲》，散了场又继续唱。

开学不久，正赶上“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五周年。集会之后，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再次上街游行示威。曾任清华大学民先分队队长的心理系学生林传鼎，在游行时为保护同学与拿着大刀、水龙的军警英勇搏斗，被捕入狱。林传鼎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林传鼎等入狱后，我父亲受民先队委派，去城里铁狮子胡同探监，给林传鼎等被捕同学送去慰问品和同学们的关心。

那一年的10月19日，对那个时代众多青年有着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与世长辞。我父亲和清华民先队的许多同学一样，非常悲痛。他们一起唱起《鲁迅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破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的迷梦。”歌声在校园里回响，也在他们的心里回荡。

1936年11月下旬，传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所部取得百灵庙大捷的消息，清华民先队组织为傅作义部队捐棉衣，我父亲同样积极参加。清华学生以节食三顿、宿舍暖气停烧七天的行动，将节省的钱捐给前线抗日将士。

我父亲进入清华以来的种种表现，清华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看在眼里，指示杨学诚和纪毓秀抓紧对他的考察培养。杨学诚经常找我父亲谈话，了解他的家庭、历



1985年，熊向晖（左）与蒋南翔同志在清华

史和思想情况，和他一起讨论辩证法，讨论时局，也会跟我父亲讨论人生观问题。在这样的谈话中，他们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晚上，纪毓秀和杨学诚找到我父亲，带他去二院的世界语协会。房门关着，他们敲了三下，一长两短。门开了，开门的是张承先。他1934年考入清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5月秘密入党。屋外北风呼啸，室内挂着窗帘不透光，正面墙上挂着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我父亲秘密入党的宣誓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时任中共北平市学委书记的蒋南翔和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杨学诚，杨学诚和纪毓秀担任监誓人，张承先是领誓人。我父亲跟着张承先，一句一句地庄严宣誓，以“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结束。宣誓毕，四个同志手握在一起，低声唱起《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从此成为我父亲毕生的信念。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对我父亲的影响。它不仅指引我父亲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它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也成为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我在非洲的足迹

○马 绅（1965 届土木）

我1965年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房5班毕业，分配到北京华北电力设计院，从事火力发电厂和输变电土建工程设计及技术管理工作40多年。1990—1999年期间，我曾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芬兰、卢旺达、尼日利亚、南非等国家，参加过多项国外工程项目投标和总承包项目的实施。1995—1999年，我担任“华北电力非洲地区代表处”总代表。今年是我们毕业60年，回望自己的工作历程，以下记录一段在非洲开展工作的激情岁月。

考察尼日利亚电力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华北电力设计院成功申请成为全国设计院重点改革单位。单位领导提出建设“国际工程公司”的目

标，组织精锐力量，摸索经验，力求把华北院的业务从单一的工程勘察设计扩大到国际工程总承包。

有朋友介绍，非洲尼日利亚的电力市场开发潜力很大，值得投入人力和资金去开拓。尼日利亚是世界上石油出口大国之一，因此也有一定的资金实力。“非洲”二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有资源、有市场、有希望。彼时，尼日利亚不论城市和乡村、工矿企业和宾馆，每天都可能随时停电停水，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柴油发电机，老百姓对不停电的渴望太强烈了。

1995年10月，单位选派我为组长，带上翻译和山西电建一公司的四名工程师，一起出发到尼日利亚考察，主要目的是看看华北院承揽海外工程的机会有多大。

我们到达尼日利亚西南部的拉各斯后，拜访了尼日利亚钢铁及电力部国务部长Hagher，交流发现双方合作的意愿都很强烈。会谈期间，他们看到中国工程师的诚恳和在业务方面的成熟。当看到我们在计算机上同时使用汉字和英文熟练编辑文件，他们表达了惊喜和佩服。Hagher立即安排尼日利亚电业局（NEPA）



2025 年校庆，马绅学长（右 2）毕业 60 周年返校与同学团聚

的总经理接待我们，考察当时尼日利亚全国仅有的四个燃气轮机组发电厂。这四座发电厂，总共27台单循环燃机，单机容量20MW，全是80年代ABB公司的产品；其中18台已经受损搁置，在修理车间等待修复。南部石油工业区仅靠剩下的9台机组运行供电，造成大面积严重缺电，需要尽快对机组性能进行检测和检修，恢复发电能力。尼日利亚电业局希望我们提出检修方案，尽快恢复机组正常运行。考察完毕回到拉各斯，尼日利亚钢铁及电力部联邦部长Dahardu与我们签署了《尼日利亚电业局和中国华北电力（北京）公司合作意向书》，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推进项目奠定了基础。

尼日利亚专家考察华北电力

回国后，华北电业局和华北院对我们初步考察结果很满意。紧接着，华北院外事部邀请尼日利亚钢铁及电力部国务部长Hagher到中国考察，了解中国发电设备运行和电力建设情况。1996年7月，Hagher部长率九人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考察。华北院咨询部经理陪同他们去天津军粮城发电厂参观考察单机容量200MW发电机组的运行情况，后又安排他们去北京电力专科学校，体验300MW发电机组的调试培训模拟机，还去看了北京房山500kV变电站的带电运行情况。

我告诉他们，军粮城发电厂的一期工程50MW国产机组，是我1965年大学刚刚毕业后参与设计的第一个工程，到那年已运行30多年，照样能满负荷安全运转。我们的国产设备确实安全可靠，中国设备和设计水平物美价廉，很适合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眼见为实，对中国电

力工业发展和国产设备运行水平很满意，表达了与华北电力合作、扭转尼日利亚全国缺电局面的决心。

成立华北电力非洲总代表处

1996年10月，单位再次派我与院里另外三人去尼日利亚，进一步开拓市场。我们每人怀揣一万美元，托运了一些必需的炊具和中成药，就登上了去拉各斯的飞机。当年，华北院既缺乏资金去参与海外投资，更没有资金创办企业，只能以技术优势和顽强的努力争取两国的合作项目。我们在尼日利亚设立了华北电力非洲总代表处，我担任第一任总代表。在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的帮助下，在当地租了一套宿舍，购置简单的家具，装上传真电话，立即开展业务。为了节省开支，我们花3800美元购买了商务处即将报废的一辆两厢小车，雇了个当地司机，就开始运转工作。没有厨师，我们四人轮流负责每日三餐，每个人都学会了压面条和烙饼。生活自力更生，工作从头摸索。代表处制定生活规则十条：诸如单独出门要报告；晚上11点必须回住处；出门18公里以外，不许自己开车；不许出入赌场，等等。

为了努力挤入尼日利亚电力市场，我们集中关注自己熟悉的发电及输变电工程承包项目。在我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的促进下，尼日利亚电业局首先委托我们开展“尼日利亚电业局四个燃机发电厂27台燃机性能检测和设备修复可行性研究”，合同承诺咨询费25.2万美元。

我们迅速赶赴AFAM发电厂，住在当年ABB公司建设期间的集装箱办公室里开展工作。发电厂的工人积极配合，当地的厂长对我们也很关照，安排专人值班，保

证环境安全，还让他的女儿负责给我们采购食材，提供生活热水。我们四个人抓紧时间走遍了四个发电厂，查阅比对了ABB公司设备的原始资料，对每一台机组进行核定。对其中18台报损搁置的单循环燃机，在现场做了细致观察和拍照，分析问题所在，分别建立档案。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都专心投入工作，用两个月时间，对18台机组的现状和破损情况做了全面描述和总结。我们建议，尼日利亚电业局在条件比较好的AFAM发电厂，组建一个燃气发电机检测中心，制定修复计划，采购更换部件。

回到拉各斯，我们把所有资料汇集成两本厚厚的咨询文件，每册384页，送交尼日利亚电业局审核；参考业主工程师意见，修改补充后，装订成《关于AFAM等四个发电厂27台燃机性能检测和设备修复研究报告》报尼日利亚钢铁与电力部。电业局的官员和工程师对我们提交的报告特别满意，认为报告很客观，全面反映了每台机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修复措施和计划。他们特别重视我们提出的建立检修中心的建议。尼日利亚电业局官员兴奋地赞扬我们的报告比ABB过去的报告写

得好，装订得也漂亮。尼日利亚钢铁及电力部也很守信用，在审核两个月以后，就按合同付了咨询费。从此，他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很多问题都会征询我们的意见。

这是半年时间内，我们四人在海外完成的第一项技术咨询工作，收入25.2万美元。华北电力非洲总代表处（下简称代表处）有了第一笔经营所得资金，大家特别高兴。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的同志评价说：华北电力非洲代表处靠精湛的技术和顽强的精神，撬开了尼日利亚电力建设工程市场的大门。

成就国际工程总承包经营板块

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全面分析评估了尼日利亚电力市场的状况，代表处重点落实尼日利亚电业局的建议，提出了几个可以政府间合作的建设项目。

1997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非洲四国，经过中国驻尼大使馆的努力，总理访非行程中添加了到访尼日利亚。总理很关心和支持华北电力在尼日利亚的电力市场开拓，知道我们三个项目需要签署政府间的合作协议，他很高兴，还特意派出随访的七位部长之一——时任外贸部部长吴仪，代签电力工程合作项目。在尼日利亚，总理一行见证了几个中资公司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署，还专门接见了华北电力设计院的领导和我们代表处的同志。

中尼两国三个电力项目合作协议合同额接近3亿美元。此后，这三个项目推进很快，我们的标书和报价得到了尼日利亚电业局的重



马绅（左2）与华北电力非洲总代表处同事们

视，很快提请尼日利亚总统审核。在当地，我们与ABB和西门子的竞争异常激烈，我国驻尼大使馆也鼎力相助。项目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尼日利亚政权更迭等大事，整个过程虽有困难波折，但都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度过。

代表处的同志们为了项目的成功，不惧酷暑、不分昼夜地努力付出。每天特别忙碌，白天处理当地的事情，晚上处理北京电传安排的工作。大家外出工作回来，衣服和裤子都会湿透，也从不叫苦。尼日利亚的航班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准时，特别是年初旱季“哈马丹风”来临时，经常会造成拉各斯机场几个航空公司停运。我们没早没晚地往返拉各斯和项目执行地阿布贾之间，仅我个人统计，每年往返两地就多达80多次，航行中不能降落而半途返回是常事。我们乐观地面对风险与困难，一般病痛时，吃点从北京带的中成药，疟疾或肠胃急诊，就去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尼日利亚铁路项目部医务室寻求治疗。

在工作态度上，我们始终积极主动。当得知尼日利亚KDA（Kano—Dutse—Azari三地）输变电工程项目的建议书和投标书，总统府已经审批通过，并转至钢铁及电力部法律顾问审核，我们就第一时间安排拜访并积极商谈修改，当法律顾问反馈修改要求并告诉我们格式后，我们连续修改了三遍，重新印制装订再提交申请。工作过程中，这样的细节不胜枚举，大家都一心想把工作做好。我的想法里面除了为国争光，还有不能辱没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在工



1997年4月，时任外贸部部长吴仪（左3）接见华北电力非洲总代表处人员。右3为马绅学长

作中体现出来。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1999年2月15日在阿布贾联邦政府大楼，签订了“尼日利亚KDA输电线路工程项目的实施合同（230kV-125km/123kV-125km）”，协议合同额相当于欧美公司报价的7.5折。尼日利亚方的部长、司长、律师，中方的大使、项目人员、律师等参与签字仪式。

合同文本共5份，每份75页，诸多部门、代表签名盖章。总代表和钢铁及电力部联邦部长Suleimen每页小签，共签署375页，花了105分钟才签完。天气酷热，心情激动，我们每个人都大汗淋漓，汗水湿透了我的白衬衣，我们边擦汗、边签字，高兴极了，一口气签完。合同签署当天，正好是中国“戊寅虎年”腊月三十，确实是给我们“己卯兔年”春节的大礼。这个合同开启了华北电力国外工程总承包的大门，是华北院发展海外经营新板块的开端。该项目也是我国电力设计企业首个境外独立承揽的电力工程总承包项目。

1999年，“华北电力工程（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在拉各斯注册成立。项目合同签署的消息传回北京，全体员工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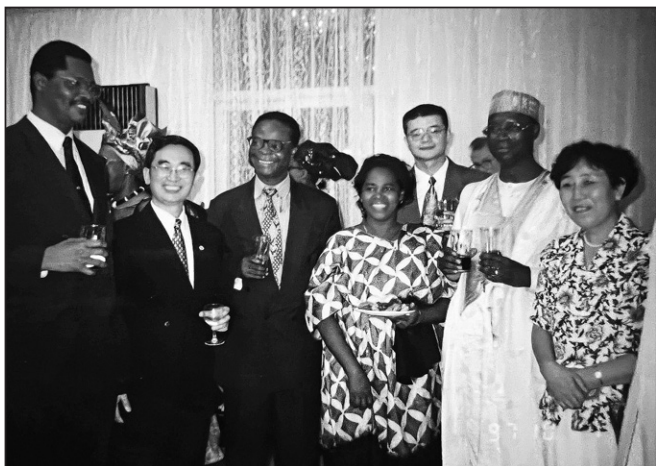
极了。单位领导一方面安排非洲代表处和外事部同志，分别在国内外考察咨询输电线路铁塔生产厂家和比选价格，联络国内输电线路安装施工单位。另一方面立即选派15个工程技术人员去尼日利亚卡偌市租了办公地点，编制施工方案，准备工程实施。每星期一总经理去阿布贾，找尼方电力部和财政部部长落实工程款。

2001年初，尼日利亚KDA项目第一批工程款到位后，华北院立即选派国际工程部的精兵强将去现场开工，尼日利亚时任总统也出席了项目开工仪式。工程进展比较顺利，到2004年全面完工，通过验收，圆满交付业主。KDA-132kV输电线路工程竣工，尼日利亚时任总统、能源部长及沿线州的州长出席竣工仪式并致辞。

整个工程实施下来，盈利相当丰盈，为华北院以后多年开发国际工程总承包经营板块积累了丰厚资金。随后几年，华北院海外工程总承包经营已经涉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安哥拉等很多非洲国家。2006年又签订了尼日利亚国家330kV骨干

电网NIPP-ALG-330kV双回路输电线路总承包工程项目；JOS-MAKURDI 330kV双回路输电线路，JOS-330kV变电站扩建和MAKURDI 330kV变电站新建总承包工程。2009年“华北电力工程（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开始实体化运营，逐步开展自营业务。2015年，华北院总承包的尼日利亚ALG-330kV双回路输电线路工程举行正式竣工仪式。尼日利亚副总统出席竣工仪式并致辞，赞赏华北电力作为优秀EPC承包商在尼日利亚电力发展中所作的贡献，并亲自为项目剪彩，宣布项目正式投入使用。2013年10月，华北院尼日利亚新基地正式进驻，这是华北院非洲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华北院国际化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里程碑。我们的国际工程总承包业务以非洲尼日利亚为中心，路越走越宽，现在成功形成了国际板块业务，加入了国家“一带一路”的行列。这是华北电力设计院几代人奋斗的结果。作为1996年非洲总代表处第一任总代表，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在非洲的工作前后六年，于1999年回国，继续在华北院从事电力工程设计管理工作。

我们的工程师在现场辛辛苦苦执行八年，为开拓这些工程项目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非洲代表处的首席翻译在合同签署后，在卡杜拉殉职于车祸。施工执行阶段，项目首任现场经理和一名测量工程师因公殉职在工程勘测途中。华北院有今天的辉煌发展，应该纪念在改革开放初期在非洲黑土地上开拓国际工程总承包的勇士和功臣们。



马绅学长（左2）与尼日利亚电业局官员在一起

阅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杨宝林（1979级电机）

在京参加的毕业四十年及校庆113周年的纪念庆典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然而，两天庆典中的一幕幕已经深深地扎入心底。那是久违的重逢音容依旧，那是苍颜的拥抱激情焕发，那是爽朗的笑语承载昨日，那是开怀的回忆同窗岁归。两天的活动短暂又热烈，充分展现了活动的中心主题：阅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走出母校大门已整整四十年，经历了匆匆岁月的风风雨雨，见惯了沧海横流的人生百态，自认已可笑对千般波澜不惊。然而，当置身同窗旧友，漫步校园荷塘，再闻导师教诲，共唱母校之歌时，心底久沉的激情却重新燃烧，昔日求学的岁月又风华再现，激动的心情难以自制。

大学五年，毕业后同窗学子各奔东西，平时除非工作中的交集，更多时忙于生计难得一见，而毕业秩年校庆日，就成

了大家相聚的契机。以往毕业秩年相聚，班里都是由上学时的班级首任团支书，也是后来的第22届校学生会副主席翟庆志牵头张罗。历次聚会活动的具体内容、同学返校的食宿出行、班级聚会的拍照及纪念品，翟庆志从来都是细致周到，妥善安排，彰显了老支书的厚德为人，而自己也习惯了从众参聚者的身份。

2024年对于1984年毕业的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届毕业生也基本走过花甲之年，退出工作岗位，或返聘发挥余热，或回家含饴弄孙，也更有条件回校参加毕业四秩的庆祝活动。离毕业秩年庆祝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班里同学就在微信群中相邀，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回学校相聚。大家还热烈讨论班级聚会活动的各项内容，谋划着能出一本班级纪念册，不少同学为此发了曾经的照片，写了回忆的文章。临近聚会日一个多月的时候，偶然获知班级聚会骨干翟庆志和孙路被本届年级庆典组委会“抓差”，在执委会为全校同届毕业同学聚会活动做筹备工作，工作量不小，班级纪念册的准备和筹划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原本参与者的身上，自己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希望能为班级的毕业纪念活动尽些绵薄之力。

一天，孙路同学突然联系我，紧急求援，说毕业四秩庆典活动上需要一段第三方讲述视频，请校友所在企业的同事来介绍其在工作40年中的兴业经历。在校友聚会活动中总是



2024年校庆返校，毕业40周年的电机系电9班同学合影。后排右2为杨宝林学长

躲在幕后的我几番踌躇，还是抹不开同窗之邀，找到自己的老同事（也是所在单位的董事长），希望完成此项任务。所幸所在单位毫不含糊，拍出了一段非常专业的采访视频，也让我这个不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出现在了本届校友面前。

毕业庆典前十多天，翟庆志突然发来微信问我：“你们所搞的输变电装备不属于大国重器？”并解释说，他所分工的一项工作就是收集整理全年级优秀校友的基本情况。我回复，当然属于，比如交流1000kV及直流正负1100kV特高压输电工程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唯有中国才有，而我从事的工作就是服务于特高压输电工程的特高压输电装备，自己也是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特高压输电工程的建设和发展里程。没过几天，翟庆志突然来电话告之，我被组委会选中，作为优秀校友将在年级毕业四秩纪念大会上发言，我当时就傻了。同届毕业的同学中有院士、有专家，也有大央企的领导和优秀企业家，怎么就轮到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校友发言？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被慎重选中作为1979级校友代表发言的原因就八个字：“西北坚守，大国重器。”我苦笑着同庆志调侃：“我都在幕后躲了四十年了，还是没躲过去。”庆志则笑言：“实干是金，实至名归。”没办法，只有服从，鸭子也有被赶上架的时候。

毕业秩年庆典活动分为两天，4月27日，在校外宾馆举行的同届校友聚会及文艺汇演。走进会场，映入眼帘的是背景墙上的“归来仍是少年”六个大字。聚会场地布置得别具匠心，有曾经求学时的宿舍和水房等场景，有反映当年同学生活的绘画展品，而最吸引人的是一面展示墙的电



杨宝林学长在一九七九级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言

子大屏上，不断滚动着当年入学时学生证上的每个人的学号和照片，当你扫码后，即刻会出现并驻留你本人当年的照片，让我们这群年过花甲之人仿佛重回年少，蜂拥着与当年的自己合影。老同学见面格外亲切，或执手畅谈或携携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之光。一下午的文艺演出更是精彩纷呈，时长堪比春晚。完全由本届学子自编自演的节目丰富多彩，让近800位参会的同学重温了当年的大学时光。舞蹈、独唱、合唱、诗朗诵、情景剧琳琅满目，彰显了本届学子的多才多艺。而本届学子的总体发展情况介绍，更是让所有参会人员体验了现代大数据的神奇，翔实呈现了本届校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演出的节目内容紧密围绕庆典主题，让参会校友无不赞叹庆典筹委会事前下了巨大功夫，挖掘题材，组织排练，只为推出一台令校友满意的节目。从与本班同学孙路的交流中，让我更深地了解了这场庆典的烦琐与艰巨的筹划过程。孙路作为本次庆典的节目总编导之一，在之前的筹备中与数位编导及演职同学呕尽心血，无怨无悔，为大家呈现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在文艺演出中也播出了我单位拍摄的介绍本人的专

题视频，让我这个并不出众的学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4月28日上午，在学校举行了本届学子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庄严的新清华学堂，本届学子近800人参会，校长及部分教师代表全程参加大会。大会由1984届毕业生、在校时第22届学生会主席宋军主持。在庄严的校歌声中大会开幕，作为本届毕业生的六位代表之一，我有幸在大会上发了言，由衷感谢了学校、电机系及老师对自己的教诲和培养，汇报了自己只身一人独行西北扎根央企为国家服务的心路历程，也汇报了在打造大国重器之路上的实践经历，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是学校及企业成就了自己的今生。大会上，校长及教师代表也讲了话，介绍了学校近年的

发展，充分肯定了这届毕业生为国家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更殷切地期待大家能充分享受退休后的美好生活，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落幕。会后，校长与教师代表与出席大会的本届学子们在新清华学堂前合影留念，让这难忘的一刻永存在记忆的相册中。

短暂的两天聚会和庆典过去了，本以为退出工作舞台的自己早已激情不再，不曾想同窗相聚的一刻，又让自己激情重燃。看校园依旧，忆同学少年，曾经的风华又别梦依稀，青春的时光又恍若眼前。回首向来，逝去的光阴如影随形，举目远眺，西边的落日漫山红遍。我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有缘同校，今生皆为知己，阅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念兹在兹——回忆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滋养

○周庆安（1996级中文）



我是1996年9月2日到清华大学报到的。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当时学校里很热闹。中文系的系办在今天文北楼（当时叫文科楼）的三层。当时的系办姚金霄老

师带着师兄们在操场给我们办的接待，次日我们到系办再办理手续，第一次见到了中文系的办公室。2022年下半年，因为新闻与传播学院馆装修，我又临时回到了文北楼的三层办公。走在26年前报到的地方，想起已经过世的徐葆耕、姚金霄一众老师们，的确感慨光阴荏苒，念兹在兹。

报考清华的时候，我是被招生简章上中文系背后括弧的科技编辑所深深吸引。当时我并没有所谓的学科交叉融合概念，而是因为自己是理科生，文科成绩也不错，总想文理兼学，将来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最终主动花落中文系。

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校领导决定恢

复文科建设。从1994年开始，中文系和英语系都复招本科生。当时清华大学办中文系，不仅在国内，甚至在校内都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声音。我们一个班33个同学，11个男生，22个女生，男女比例在校园内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以至于参加马约翰杯足球赛的预选的时候，全班男生都必须上场，一个替补都没有。好在当时中文系还有很多留学生，韩国的外援脚法了得，成为重要的场上力量，避免了中文系学生弱不禁风的刻板印象。后来，文6和英6组成了“中英”联队，人文学院还没成立之前的学生工作雏形，恐怕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一直到2001年，我们一位研究生同学在游泳馆游泳，教练问她是学什么的，她回答是学传播的。教练想当然理解成“船舶”，就勉励她说，你得好好学游泳，不然将来出海不会游泳可不行。

清华特色的通识教育

在中文系的四年本科生活，回想起来充满了清华的特质。当时我们的培养方案是，前两年完成中文系的专业学习，后两年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可以选择文学、新闻传播学或者语言学的专业课程方向。这就意味着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开始通识教育（2+2）的学生。尽管作为学生，当时并不太理解这种培养方案的特点，但是今天回过头来，对于通识教育的理解无疑更加深刻了。

通识教育，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当代理解，区别于传统的技术教育 and 专业教育，是在一个更加现代和知识体系更加多元化的社会，高等教育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能够融会贯通于不同学科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

这就意味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学生要学得得多，一个是老师要教得好。作为学生，首先感到的是课多。因为通识的体量，必然要比单一专业的体量大。学生接触到的知识量越来越大，知识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为了确保学生能够真正学进去，对于这些在高中阶段按部就班的孩子们来说，当时系里的教学方针十分明确，前两年的时间，几乎完成了中文系三年的专业课程。我记得当时课最多的一个学期，我自己完成了32个学分的课程，到今天为止都非常怀念那段奔忙的岁月。在两年的时间内，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一系列的课程，为我们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理教育。我在清华唯一一次不及格的考试，是大一下学期的高数期中考试。当时中文系、外语系、经管学院的同学，要完成一学年的高等数学，按照理工科同学的话说那就是“高数C”，言下之意就是极为简单的数学。我因为高中是理科生，所以觉得微积分不足为道，结果一样马失前蹄只考了48分。文科学一年的高数，虽然当时来看对文科生有一定的难度，但事后回想起来这一年的高数，对于后来我们面对交叉融合的知识体系有着极大的帮助。也因此我知道了当年清华园里36分（最终卷面成绩开根号乘以10）及格的传说，以及教一学二考三的传统。

尽管文理工各有不同，当时中文系的教育，给我们一个更加直接理解清华人才培养精神的契机。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学生上课天经地义，多选课，选自己喜欢的课，才是大学的模样。有“识”未必

就能“通”，但没有“识”就一定不会有“通”。因此，课程成为了我们迈向“识”的必要条件。

清华特色的大师教学

当然，“教得好”在清华大学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当时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我们学生看起来已经是大师云集。有徐葆耕、蓝棣之、张玲霞等人文大先生，有李学勤、葛兆光这样的史学大家，有黄国营、赵丽明这样的语言学翘楚，也有袁毓林这样和清华擦肩而过的著名学者。但是他们上课的方式，却不自觉地带有很强的“清华特色”。

我记得蓝棣之先生的“现代文学史”课期中考试是没有试卷的。蓝老师进教室以后，在黑板上写了十部小说的名字，然后要求每位同学就每部小说写出三个细节，每个细节三分。我们当时都很惊愕，当然也准备不足。蓝老师的意思非常明显，学文学史，就是要看书，没看过书，无从谈起文论。因此考察小说的细节，就是让学生先读书再发言，避免夸夸其谈眼高手低。同样在丁夏老师的“古代文学史（下）”期中考试里，卷面就是五十首宋元明清诗词填空，每题2分，会背就是胜利。回头想起来，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与清华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气何其一致。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又接触到了更为感性的文学世界。徐葆耕老师的“影视艺术”这门课，给我们放过一部印象深刻的电影是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情书》。我是个不爱看文艺片只爱看科幻片的中文系学生，这部当时还没有在国内上映的电影给我留下了浪漫主义叙事的强烈冲击，在印象中我认真看过而且认真分析过的文艺

片也就是《情书》了。作为获得金鸡奖的剧作家，徐葆耕老师推荐这种新且相对小众的文艺作品，另辟蹊径，为学生创造了异于传统艺术史论的教学路径。清华的大师，走的就不是传统文科学科建设的老路。

在这种大师的氛围中，学生也格外活跃。当时在宿志丕老师的“中国通史”课上，我们一个宿舍六个男生，对于明代历史格外感兴趣，也敢于和老师讨论。为了课堂做好充分的交流甚至是交锋，大家自发地把《明会要》等一系列对本科生有难度的明代历史文献搬回宿舍边上的活动室，整个通宵点灯熬油，誓要找出明史中最有挑战性的问题。在我们的手上，《清华中文报》等一系列的学生报刊也得以创立和发展，《读书》等杂志更是人手一册的必读刊物。可以说那时候的学生，受到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氛围影响，在整个文科建设上真正向清华“神仙老虎狗”中的“老虎”靠近。

清华特色的文科教学

清华文科教学的高起点，首先高在“难”这个字上。文科教育要做好，尤其是清华的文科教育，难字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字眼。文科的难，不是难在做题和实验，而是难在知识上的博学和理论上的自洽。因此学生要花更多的时间啃书本、学知识、写论文、做研究。文科生也要懂点理工，走向田野，从事实践，面对群众。当时对我们来说，难的课、难的题，答不出来的考卷才是清华该有的样子。在葛兆光老师的文献研究课上，我交的作业是唐代六部职官制度研究的小论文，这篇论文今天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为这篇论文在图

书馆文献阅览室里硬着头皮啃典籍的记忆一直都在。

清华文科教育的另一个高起点，当然就是“通”。毋庸讳言，当时清华最大的优势仍然是理工科的优势。在理工科见长的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借重理工科优势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特色，使得清华的文科在发展过程中快速成长，快速复兴。这个通也是理论和实践的贯通，从先生们的教学到培养方案的设定中，中文系的教育是和整个清华的教育紧密衔接在一起的。从大一的暑假开始，我们就自己组织前往敦煌博物院、长江三峡大坝的采风活动。那个时候从北京到敦煌的火车40多个小时，因为没有坐票，十几个同学就在火车车厢的衔接处待了两天两夜。当然，因为系里的介绍，我们也有幸在敦煌买上了专业门票，参观了当时很少人能看到的15个洞窟。2024年，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纪录片团队仍然在敦煌为博物院60年拍摄纪录片，28年的时光轮回，我们仍然没有离开中国现场。

再者说，清华文科的高起点，还在于国际视野。清华从自身的历史出发，对于国际视野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融通中外、贯穿古今的概念在我们的学习中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时除了欧美之外，中文系和历史文献研究所的学者对亚洲也有专门的研究，葛兆光、王中忱等老师对于日本的研究就对我们有很多启发。今天我从新闻传播的学术视角研究早期跨文化传播，与葛兆光老师的学术研究不期而遇，也算是给当时的学习交上了一份不断积累的答卷。

在当时看似庞杂且艰深的课程体系，对于我们后来的成长而言有弥足珍贵的意

义。很多人认为，清华条件好，搞什么都有钱有资源。但我一直觉得，清华文科的发展并不完全因为清华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独特地位，而是因为学校和院系在复兴过程中的独特视野和战略眼光。到今天来看，这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复建，不是因为人多，也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清华在战略上集中，在战术上自由；宏观上有担当，微观上敢放手，用人上有自信。90年代我在学期间，以理工科出身的徐葆耕老师掌舵中文系，以症候派诗人蓝棣之等牵引学科发展，引进了李学勤、葛兆光、王中忱、黄国营等多位不同方向的名家学者，敢于对标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形成了“人少力量大”的局面，才能在后来的文科发展中，继续快速地培育了人文学院、社科学院、法学院，以及我所在的新闻传播学院等。所以真是“一座文科楼，半部文科史”。

到今天，我都会跟自己的学生说起在中文系的学习生活。那时候礼堂前的大草坪是可以进的，每个周末草坪上都有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弹吉他唱歌；二校门边上的一教里总是会举办诗会，操着各地口音的清华园诗人在教室里大声地朗读着自己创作的诗歌，引来阵阵掌声或者嘘声；中文系的学生们能读《昭明文选》，也要做高数习题集，还偷偷看金庸，爱背诵《大话西游》的台词。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人文活动中，总会有蜂拥而至的听众。在那样的人文精神和氛围中，我们一点也不奇怪校园民谣起自清华，也十分自然地烘托了清华大学文科发展的校园环境。

20多年之后，“我也终于成为了你”，我自己留在2002年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与当年的先生们一起面对高

等教育的时代命题。中国高等教育最缺乏的自信和定力，其实应该在清华文科建设中找到一些答案。30多年之后，从学生成长为教师，我以为清华可以更加自信地回顾这段文科建设的岁月，自信地看待清华的文科建设成果。今天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非常娴熟地描述各种挑战，但是很少从容地选择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是一个“心志坚定、思想自由、行为保守”的事业，需要集思广益、审慎决策。

然而一旦决策，就要持之以恒，尊重渐渐的力量，推动稳稳的进步。

9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的清华文科复建，在我们这些学生看起来，有那么一丝贵族范儿。虽说不至于特立独行，但是也和传统的高等教育方式有所不同，甚至与当时全国高等教育的某些思路也敢于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十分感谢清华大学中文系，给了我一个别人不敢给也给不起的青春。

与水结缘：从缺水的童年到智慧治水

○黄绵松（2001级水利）



2025年，黄绵松在水业论坛发言

到目前为止，我从事水务相关工作已有20余年。我的故事始于宁夏那片干旱的土地，成长于对水资源的渴望与追寻之中。从童年时对缺水生活的深刻记忆，到如今投身水务事业，我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水紧密相连。

缺水的童年：初心的萌芽

我从小在宁夏长大，我的家乡是个干

旱少雨的地方。小时候，我在农村和城市都生活过，缺水的情况一样严重。在农村，一瓢水要先洗脸，再饮畜，最后浇地。搬到城里之后，家里到处都是存水的盆盆罐罐，洗衣水冲厕、洗菜水拖地。那时，由于缺水，气候条件也会相对比较恶劣，沙尘暴特别频繁，风里裹着的都是真正的沙子，纯属“物理攻击”，这也是西北人尤其是女性常戴面纱的原因。还有连喝水都困难的地方，比如西海固地区。那里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后来，通过实施水源涵养工程、生态移民等一系列措施，当地情况已得到根本性改善。

这些经历让我从小懂得水的珍贵，也让我意识到，水资源问题不仅仅是改善水源那么简单，更关乎人类生存根基，牵动千万人生计，影响生态、饮食、交通等民生福祉。这也给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我将来一定要为改善缺水的困境做

点实事。

高考那年，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那时候，我对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将来能干什么还不太清楚，只是单纯地希望能用学到的知识为家乡的水利事业实实在在地尽一份力。直到现在，我的工作依然围绕“水”展开。

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接触到水利工程领域的相关知识，并且有了参与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的机会。当我踏上南方的土地，看到那里水资源丰富，水利设施完善，城市因水而灵动、因水而繁荣，对比家乡的情况，更让我坚定了信念：要努力解决家乡缺水问题。

清华时光：知识与精神的蜕变

在清华，我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后，共13年，都在研究和与水有关的课题。清华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不仅让我在专业上有了深厚的积累，还重塑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清华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刚进清华时，我的成绩在年级里排在后15%，周围全是优秀的人，压力特别大。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被感染熏陶，然后慢慢地成长起来。

清华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当时三峡工程尚未完全竣工，依托学校的平台，我便有机会去了解这一世界级水利工程的样貌。还有北京密云水库，大批清华师生曾参与到建设工作当中，这让我倍感自豪。

清华更重塑了我的体魄与精神。当时，“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还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校风校训，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在清华，体育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是一种精神的磨砺。

本科毕业后，我师从安雪晖教授。推免博士时，他提出招生的三个标准：不懒、不笨、不坏。我觉得自己符合要求，就报了名，最后真的成了安教授的博士生。随着阅历增长，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三个要求其实很高：不懒，一时做到不难，但一世做到很难；不笨，顾名思义就是要有基本的学习能力；不坏，更是要求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我们实验室有句十字箴言：“团队、守信、坚持、快乐、宽容”。这五个词语，每一个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然而，真正将它们付诸实践却并非易事。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始终将这些原则铭记于心，努力让它们成为我的行为准则。

筑坝岁月：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

我在清华的这十多年里，前几年主要是学习、做研究和博士课题，后来更多的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那时候我经常去实地考察，出技术方案，做现场实验，然后将成果应用到国家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上，使之更加节能、低碳、高效。

2005年本科毕业后，我就跟着导师一起研究堆石混凝土技术体系。所谓堆石混凝土是指将大粒径的块石直接堆放入仓，然后浇筑无需任何振捣的自密实混凝土，依靠自密实混凝土自重填充堆石的空隙，形成完整、密实、水化热低、满足强度要求的大体积混凝土。这项技术被列入《国家鼓励的循环经济技术、工艺和设备名录》《国家重点低碳技术目录》等推广名录，至今仍是国际坝工领域唯一由中国人发明并得到认可的筑坝技术。

工程建设的起点是选址，它决定了整个工程的成败。首先要对地质条件进行细致入微的勘察，判断其是否符合建设要求；然后根据建造需求、地理环境及技术条件确定大坝结构形式；最后宜构适材，挑选最适合当地筑坝现状的材料。记得我第一次出差，是前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美姑县。从北京飞到成都，再转机到西昌，最后还要乘坐4个小时的越野车，才能抵达目的地。当时工程已经在建，营地条件尚可。但前期工作需要往更偏远的深山老林里走。我们常常要背着背包、拄登山杖进行地质勘查等工作。我想起了那些老一辈的水利工作者，他们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建起了那么多令人瞩目的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跟随这些老专家一起工作，是我一生的荣幸。他们不仅在专业知识上给予了我无私的指导，更在工作经验和思想境界上让我受益匪浅。

其间，我有幸参与了向家坝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等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工作，这些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应用了我们的技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于向家坝水电站一处沉井群的回填处理工作。这个沉井群深七八十米，如果采用传统技术，可能需要两三个月；但使用堆石混凝土技术回填，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大大节约了时间。这些时间转换成电站建成后的发电时间，相当于额外产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筑坝的施工现场，我们用的是大体积混凝土。为了确保浇筑质量，我们通常会选择夜间施工。有时整夜守在现场记录数据，观察细节。有一次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蓄水池边施工，我们就在旁边一块大

石头上面歇脚。每当接到任务就会迅速起身，拍照、记录、测量，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忙完之后，我们又会回到那块大石头上，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便睡着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一线带回的资料，与星辰为伍、与混凝土相伴的日子，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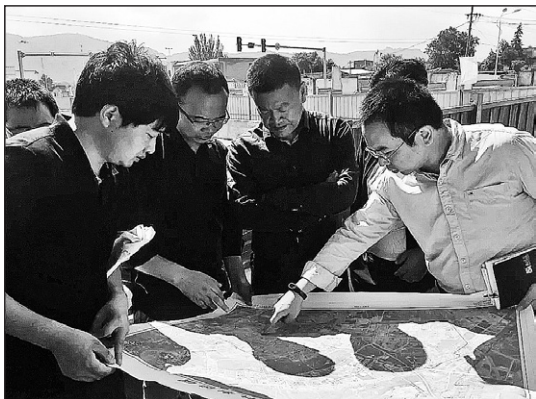
不只是我们如数家珍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还有冬奥会的引水工程、地基等，都应用到了堆石混凝土技术。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些项目，但看到自己之前的研究成果、技术能够解决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依然感到非常自豪。基于这些丰富的应用实践和显著的成效，我积极参与了水利、能源等行业标准的申请、编制和出版工作，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水利工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海绵城市：挑战与成就的交响曲

2016年，经过多年的发展，混凝土筑坝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在国内一百余项工程中得以应用，行业标准也日趋完善。彼时，关于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政策频频出台，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海绵城市建设正成为新的需求，我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离开清华大学，加入了首创环保集团。

作为国内环保产业领军企业，首创环保集团是北京市属国企首创集团旗下环保旗舰上市公司，公司深耕环保行业二十余载，在城市环境、市政公用、企业环保节能等领域为客户提供高效、智慧、绿色的“水、固、气、能”综合解决方案。

2015、2016年，国家分两批选定了30个城市开展海绵城市试点工作，宁夏固原入选。我认定这是为家乡贡献力量的机



黄绵松（右1）在固原海绵城市建设现场工作

会，迅速行动起来，与技术团队及相关单位部门沟通对接，最终促成和固原市政府的合作。非常幸运，刚踏上新的“赛道”，我就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工作——在家乡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固原市政府非常重视，将海绵城市建设列为“一号工程”，市委书记和市长挂帅，动员各方力量一起攻坚克难。

此前我们参与的多是污水厂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污染治理工作，大多属于单点整治，相对简单。然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是整个城市的环境综合整治，作为一个大系统，它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更何况，海绵城市建设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所谓海绵城市，目标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在下雨时能够吸收雨水，雨停后又能将水释放出来，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形象地说就是“大雨不内涝，小雨不湿鞋，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管理、技术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扑面而来。

我们首先梳理出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现状，规划出未来的建设目标，厘清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将它们协同

起来。最终，我们制定的海绵城市建设方案涵盖了123个项目，涉及海绵化道路、老旧小区改造、公园广场升级、河道综合整治、地下管网检测修复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负责该项目时，需要协调13个政府部门，100多个项目的设计院、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管理难度极大。

技术方案上同样挑战重重。固原本身的地质条件给建设带来了诸多困难。固原是自重型湿陷性黄土地区，这种土壤遇水会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沉陷，给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从技术上，就要解决既让雨水往下渗又不能让土层塌陷的问题。因此，在每个项目设计前，我们都要进行地质勘查、明晰土壤断面情况，然后计算并设计蓄水方案；同时，在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内部结构设置防水土工布，保证雨水安全蓄积，还整体提升了城市的抗灾能力。

不同地区、降雨条件、地形本底对应的解决方案各异。固原的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斜坡，平均高差约100米，是一个高差非常大的城市。这种独特的地形导致城市内涝问题主要集中在最低点的那片区域，也就是固原火车站的跨河大桥前。我们通过系统化的设计，在火车站桥前的积水点建了一个海绵型公园，不仅能及时收集积水，还能通过绿化和过滤沉淀等净化手段，将雨水净化后传输到清水河中。同时，这个海绵公园还实现了平急两用的功能：平时没有雨水时，它是一个旱溪，没有积水；但一下雨，它就会变成类似江南水乡的景观，为当地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让这个项目既实用又美观。

固原的情况固然复杂，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挑战，才凸显出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6年开始，固原年平均降雨量从400多毫米增加到600多毫米，单次降雨强度、频次显著增加。当时，海绵城市建设的效果尚未完全显现，而短时强降雨仍然会导致城市内涝。所以有人调侃说：“海绵城市不海绵，一到下雨看喷泉。”这让我们和当地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我们和当地政府一起努力，通过发放传单、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科普，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如今，固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固原在宁夏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城市绿化稀少，水体黑臭，环境堪忧。而现在，曾经的“墨水河”变成了水清、岸绿、景美的清水河。过去一下雨，小区就会积水，现在小区里回收的雨水不仅可以浇花、做绿化，还能用来洗墩布、洗车。建设初期，一些小区的居民因为生活暂时受到影响而有所抵触，但当第一年建设完成后，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后续建设中，居民们还主动来送水、奏乐，甚至送饭、送西瓜，与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固原的海绵城市建设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发展。曾经，固原当地黄牛名气在外，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良好的环境不仅使传统产业得到了更大发展，还为当地特色农业创造了条件，比如冷凉蔬菜、菌菇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现在，固原产的菜心直供广东和香港，质量非常好。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更多游客，促进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2024年春节期間，短短7天



二〇二五年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黄绵松分享固原发展故事

就有约40万人前往固原旅游，旅游收入高达2.15亿元。这些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当地经济，增加了居民收入，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2025年全国两会的委员通道上，我分享了固原发展的故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环保产业旺，百姓呼吸畅，腰包鼓，心里亮！”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在海绵城市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水环境综合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取得的成果不仅让百姓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为他们的生活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最优质的绿色保障。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在从追求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坚定选择的道路。

智慧环保：创新与传承的力量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需要，环保产业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也开始着力于环保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借助数字化、智慧化的管理方式，实现水环境资产管理的迭代与升级，如何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智慧环保领域进行业务管理与效率

提升，早已成为多方关注的热点。

过去，环境治理主要集中在污水处理厂等封闭区域，管理相对简单；但随着治理范围扩大到开放区域，问题接踵而至。比如，部分地区既往的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完成后，后来者甚至找不到以往建设的设施；人员变动后，新接手的人连之前做了什么都不知道。这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意识到，建设只是第一步，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长期保持治理效果。没有智慧化的手段和系统化的平台，所谓的高质量运营就是一句空话。

我们率先遇到这些问题，也率先开始探索解决方案——从传统的环保行业向智慧化转型，试图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保障环境治理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管理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缺乏整体的系统化管理，于是我们决定从最基础的设施入手，建立城市水系统的资产本底，摸清家底，然后搭建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智慧化改造、运营和决策。

2019年开始，我们基于海绵城市建设、水环境综合治理、黑臭水体整治等二十余个项目的实际运营管理经验，总结提炼了一套广泛适用的水环境资产管理理念WEAM（Water Environment Asset Management），建立了涵盖“信息采集-资产评估-分级维护-精细管理-监测预警-综合调度”城市水系统运营技术管理体系，制定了一系列可靠有效的工作机制、标准、流程、方法、模板。这些体系涵盖1000多类资产和10000多项标准，并固化到了WEAM生态智慧运营平台上，满足各类涉水项目运营管理需要，实现精细化管理，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这个平台已经在30多个城市得到应用，效果

显著，能够节约15%~20%的运营成本，提升20%~40%的管理效率。

我们不仅自己用好这个平台，还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最近，我们牵头成立了第一个智慧水环境的国家标准工作组（SAC/TC 275 WG1），这在专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工作组凝聚了很多专家的共识，新的理念和技术需要通过交流和碰撞来形成统一认识，希望通过标准的形式推广到更多城市，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倾听和发声”是我认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身份带给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我的提案和调研考察，始终瞄准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城市水系统安全方面，我更关注这些成果如何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也深刻地认识到，唯有用更高的标准去履职尽责，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影响力主动发声，建言献策，凝聚共识，站在更高的角度，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才能不负时代，实现人生价值。我的多个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当看到自己的建议一步步助推政策落地，我内心充满振奋，这更加激励我在建设美丽中国新征程上，献务实之策、办利民之事。每一次提案的落地生根，都让我深切体会到政协建言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也将专业所长融入科普实践，多次参与政协的宣讲活动，传播两会精神和国家政策，团结更多的人投身环保事业，在更广泛的层面凝聚共识，为政策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我坚信，通过科技的力量和创新的手段，环保事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编自《纵横》杂志，2025年第7期）

我画青春，也被青春画下

○陈博贤（2011级美院）

我儿时就喜欢涂鸦，那时只是在东北城中村里嬉戏玩闹的“黑土娃”，从未敢想有一天能踏入清华美术学院，追寻绘画梦想。2011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从此在清华园扎下了根。

时光如风，一次次吹熄生日的烛火，又悄然推开未来的门扉，留下风过处永不褪色的印记。本科、硕士、博士，在美术学院求学的每一天，我都觉得草长莺飞、山河烂漫。清华园的水土、风物与人文，无声地浸润着我青春的岁月；老师们的栽培与指导，则如春雨般滋养着我的艺术与灵魂。

吾爱吾师

得益于清华“研创梦工厂”项目的支持，我曾与同学合作创作长卷《吾爱·吾师》，以清华名师先贤入画。这于我而言，是一次极为宝贵的学习历程。创作期间，我细细翻阅每一位先生的事迹——他们在各自领域成就斐然，我心中不禁感慨：正是这些前辈的智慧与风骨，铸就了



陈博贤与导师陈辉（右）教授合影

清华的百年荣光，使其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

犹记得本科入学，杨振宁先生为我们作报告。具体内容虽已模糊，但那激动的心情至今鲜活，当年的讲座入场券，我也一直珍藏。杨先生特别强调了“直觉”的重要性，他说：“直觉与所学知识的相互作用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这给了我很大启发——绘画创作，何尝不是如此？后来，我偶遇杨先生与夫人观赏艺术展览、聆听讲座，才知他和钱学森、李政道等科学家一样，对艺术也满怀热忱。同样难忘的，是见文化学者汪晖先生来美术学院与师生一同挥毫；还有幸聆听数学家丘成桐先生与画家刘巨德先生畅谈艺术……这些亲历，让我真切感受到清华园是艺术与科学在高峰相遇的地方。

而我最深的幸运是遇到了硕士、博士阶段的导师——师父陈辉先生。如果说父母给了我生命的底色，那么陈老师则在这底色上，为我的人生点染了斑斓的色彩与不灭的希望。他有一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睛，总能于无声处洞察每个学生的心绪。他本人，就如同他画作中那穿透黑暗的光芒——温暖、神秘、耀眼。他从不刻意“塑造”学生，却总能“因材施教”，为我照亮脚下的方向。2015年本科毕业时，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三件风格独特的“重彩写意”作品。面对师友们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意见，有赞赏，也有质疑。陈老师始终坚定地支持我，只因我的创作源于自己的“心性”。他常说，在艺术创

作上，我们要做“有独立判断的学生”。因此，他鼓励我们大胆实验、博采众长，不拘泥于成规，始终强调技术与手段永远服务于表达，艺术创作中的“不择手段”正是为了“择一切手段”。

后来我领悟到，师父的教导，亦是清华美术学院包括其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前辈大家艺术精神的传承。这精神为我叩开了学院深厚学术传统的大门。庞薰琹、张光宇、张仃、吴冠中、祝大年、白雪石、袁运甫、乔十光、肖惠祥、杜大恺、刘巨德……众多先生心系民生、胸怀未来，以赤诚的艺术态度和不设限的实践回应时代；不畏艰难、坚定寻美求真——共同勾勒出学院乃至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脉络。博士期间，我试图追寻前辈足迹，深入研究庞薰琹先生的艺术，在阅读他和众多前辈的传记时，那些闪耀其中的家国情怀、民族立场、君子品格、自强意志、求实精神、高远理想、国际视野……常常令我深受触动，甚至潸然泪下。这一切都无声诉说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清华大学的融合，是历史与精神的必然。

山河入梦化心象，一花一木总关情

陈辉先生曾指出，艺术表达的“根”和“魂”在民族性，同时强调民族性需要融入现代的表达。刘巨德先生“回到源头”的艺术主张也深深启发着我。因此，我不断追溯悠久的诗画传统，探寻民族文化的根脉，以期熔铸传统意蕴与个人情思，催生新的艺术生命。童年时生活在东北山脚下的经历，让我有更多亲近自然的机会，这份天然的亲近感，也使山水与花鸟成为我创作的根基。以此为起点，我努力精进自己对自然与生命的感知，以及对

创作的把握能力，希望实现艺术本体与精神家园的回归。

学画二十余年，我从未想过固守某种所谓的“个人风格”。我尝试过不同的题材，探索过多变的技法，相信古今中外的文化优长都值得借鉴与吸纳。我愿意永远做个学生，不断学习、吸收、探索、变化……我深信博学方能成就大艺：博则通，通则化，化则变，变则新。所以，我也将“变中求通，通中求变”作为实践创新的方法。风格只是流变的表象，我相信心灵的轨迹终将划出一道向美而行的流线。吴冠中先生说：风格是作者的背影。我深以为然，但并不满足于此。如果我有幸创作出某种“风格”，我希望它不仅是我的背影，也能够成为我所生活的时代的背影。

感恩母校的栽培。2023年清华美术学院为我举办了首场个人画展，同年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又举办了第二场。30岁这年，我第一次向社会展示自己的绘画成果，收获了许多宝贵的鼓励与反响。导师在画展前言中寄语我：“唯有热爱与兴趣，方可抵御岁月的漫长；唯有好奇与想象，方可探求艺术表达情感的奥秘。”对此我深信不疑。但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我从未觉得岁月漫长，因为对绘画的热爱，早已融入我的生活和生命深处。

我深知，在这条求索的路上，唯有心怀希望地闻道勤行，珍重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往一来、一喜一悲的相遇，才能真正体会艺术的真意。因此，当我们惊叹于AI对心智的模拟与超越时，更应看到细腻情感之于人性的珍贵；当我们醉心于科技发展带来的便捷时，也不该忘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好风景，常常只在途中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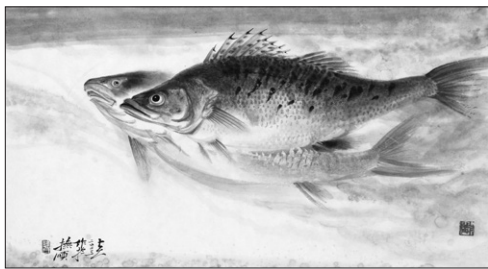
然遇见。艺术创作的旨归，不在于抵达某个终点，而在于求真寻美的过程中，那份赤诚留下的痕迹。这份特质，恰恰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弥补技术带来的某些困惑，让人重新审视生命中最珍贵的价值。我不排斥新技术对创作的拓展，也相信AI将成为艺术的有力助手，帮助我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但在艺术创作中，心灵与技术不应分离。我永远不会放弃用细腻的笔墨描绘心中的山河万象，因为我相信，双手的温度与心灵的悸动，是当下重塑艺术不可或缺根基。

永不完成的青春画卷

在本科毕业后，我光荣成为一名辅导员，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九年。期间，我荣获了清华大学林枫辅导员奖、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在多年的“双肩挑”工作中，我深深懂得，自己不仅是沟通的桥梁，更是学生青春路上的同行者与见证人。比如在思想引领时，我们是“最后一公里的传灯者”；在学生学习生活中，我们是他们“心灵的园艺师”；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是平安校园的守护者。在陪伴他们成长与自我蜕变的旅程中，我和同学们共同绘就着青春的画卷。

我始终认为，艺术家应当关心社会和时代，并付诸行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能为更多人贡献一点力量，让我感到踏实而幸福。支教活动、公益拍卖、公益讲座、乡村振兴……我都积极参与其中。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女士曾说，艺术家是社会的“仆人”，其天赋的赐予是为了更好地回馈社会。这句话常萦绕在我心头，赋予我投身社会工作的信念与力量。

有人说，社会工作会影响专业学习，



陈博贤《同游》系列之一，2023年，纸本设色，41.5cm×68cm

我并不认同。从我的经历看，“双肩挑”的经历开阔了我的视野和胸怀，提升了思想认识，也滋养深化了我对专业的理解，实现了“两促进”。繁杂的工作不仅没有阻碍我的专业发展，反而转化成了我艺术创作中源源不断的动力。博士期间，我举办了两场个人画展，以全院学分绩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博士生国家奖学金和清华大学蒋南翔奖学金，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重要展览，成果也入选了清华大学学生原创作品支持计划。2023年，我的事迹被收录进《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70周年纪念画册》，这成为镌刻在我青春岁月里一枚无比珍贵的徽章。

我曾创作过一组描绘清华园四季的油画《清华四景》——《春·英落玉面暗香来》《夏·影动翠鸣恋情柔》《秋·清雨金风舞芳华》《冬·辉映银装忆流年》。当我徐徐展开在清华园学习生活的青春长卷，那份深沉的感动就如同这组定格时光流转的画作。一笔一画间，勾勒出与同学们共度的校园春秋，也在我生命的画布上，留下了深深浅浅、永不磨灭的印记。我画青春，亦被青春画下——这相互映照的笔触，最终交织成一幅由时光晕染、心灵共绘的长卷。它始终在生长，是一幅永远等待着下一笔的未竟之作。



● 榜上有名

5 位清华人获得 2025 年科学探索奖

2025年8月25日，2025年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公布，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其中包括5位清华人，他们是（按媒体公布顺序）：

闫浚（2011级博、2016—2018博士后，医学院），女，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跨膜运输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并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研究成果系统地揭示了叶绿体蛋白转运系统和动力系统的组分、组装、工作机制和进化多样性及保守性。

徐和平（2010级博，医学院），男，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系统免疫学与免疫生理学，在调节免疫细胞分化与功能的内在分子机制与外在组织微环境方向做出了多项原创性成果。

吴嘉敏（2010级本、2014级博、2019—2021博士后，自动化），男，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致力于计算成像、介观显微仪器与跨尺度生物数据理解的交叉研究，提出扫描光场成像原理与数字自适应光学架构。研究方向：计算光学、显微仪器与光电智能计算。

胥蕊娜（1998级本、2002级博，热能；2007—2009博士后，核研院），女，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长期从事低碳能源与动力领域复杂条件下热质传递理论、方法与关键技术研究。研究方向：围绕非常规能源资源开采技术、CO₂地质封存与利用技术以及航空航天热防护领域所涉及到的热物理现象及相关的基础理论与技术开展科学研究。

宋成（2004级博，材料），男，清华

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在国际上较早开展了反铁磁自旋电子学研究。研究方向：面向高速、高密度信息存储与高频移动通讯的国家重大需求，开展信息功能材料研究，包括自旋电子学材料、声表面波滤波器和磁声耦合器件。（杨帆）

3 位校友当选“2025 年度 AI 人物”

日前，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中国·AI盛典》活动同时启幕。盛典揭晓10位“2025年度AI人物”、1项“年度AI创新应用”。3位清华校友当选“2025年度AI人物”，他们是：

张鹏（1998级本、2002级硕、2018级博，计算机），现任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研究领域包括知识图谱、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等。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GLM系列大模型、AMiner、XLORE等项目的研发工作。

陈维良（1999级硕、2020级博，微电子），沐曦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曾长期就职于AMD，负责全球通用计算GPU产品线的整体设计与管理。2020年创立沐曦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国产高性能通用GPU芯片产品的研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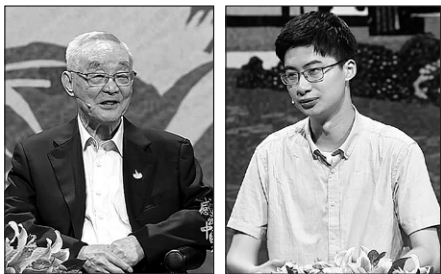
夏立雪（2009级本、2013级博，电子），无问芯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带领团队专注于构建适配中国多模型、多芯片生态的AI Native基础设施。

“2025年度AI人物”推选面向年轻一代AI奋斗者，科创范围涵盖大模型、具身智能、医疗、芯片等前沿领域。

（李萍）

清华人栾恩杰、庞众望，感动中国！

○王晓霞（2018级硕，新闻）



栾恩杰（左）、庞众望在《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发言

2025年8月16日晚，《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名单揭晓，两位年龄相差59岁的清华人同台捧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分别是清华大学精仪系校友、85岁的栾恩杰院士与同系在读博士生庞众望。

这一瞬间，是清华人跨越一甲子的荣光交汇。彰显着清华人精神血脉的赓续与传承。

栾恩杰：擎炬照月华， 把“嫦娥奔月”由神话变为现实

“从瀚海孤烟到碧空明月，如今人们把你的名字写上了星辰。绕落回三小步，成就了中国探月的一大步，嫦娥轻盈起舞的背后是无数探月人忠诚智慧的脊梁。”

当这段饱含深情的颁奖词宣读时，栾恩杰院士躬身耕耘的星河长卷在我们面前徐徐铺展：我国月球与深空探测工程的开创者之一、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参与我国第一代潜地火箭、第一代陆基机动火箭、第一代远程火箭等重大工程……有人说，栾恩杰的成绩

随便拎出来一件都值得炫耀一辈子。

1965年，栾恩杰考入清华大学精仪系攻读研究生，主攻静电悬浮陀螺等当时国内的尖端方向。在潜心钻研、锤炼报国本领的同时，他深受身边榜样感召，郑重递交了入党志愿书，并在其中写下庄严承诺：“党的决定就是我的一切。”

行胜于言，至诚报国。1968年毕业之际，栾恩杰选择进入当时刚刚组建的国家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院。他曾担任我国第一型潜地固体战略弹道导弹“巨浪-1”的型号总指挥、东风-21弹道导弹研制总指挥，还陆续参与了其他导弹型号的研制，一次次为国掀起“导弹巨浪”。

1998年，在毕业30年之际，他出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工作方向也转到深空探测领域。2000年，他倡导并组织完成了我国首部航天白皮书《中国的航天》，首次提出“大航天”概念，将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纳入国家航天发展规划体系。

月球探测工程，是我国继人造地球卫星和载人航天之后第三个标志性的重大航天工程，是我国实现深空探测零的突破的起点。2004年1月，我国正式启动了绕月探测工程。作为工程的主要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栾恩杰提出我国月球探测“探、登、驻（住）”三大步和“绕、落、回”三小步走的技术发展路线。在嫦娥一号上天前，栾恩杰带领团队开展了将近30次各类大型试验，确保工程的万无一失。最终，绕月探测工程取得了圆满成功



栾恩杰（中）与同事交流

功，事先准备的84项故障模式预案一个也没用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设计到研制再到试验，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都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2020年12月，内蒙古四子王旗气温低至零下30多摄氏度，嫦娥五号准备在这里着陆，已经80岁的栾恩杰提出要去着陆区，同事和家人都担心他身体受不了，纷纷劝他“别去了”。但他最终还是坐上火车一路奔波，深夜抵达着陆区，“我是来接嫦娥回家的，我等这天已经等了16年，这是我们航天人对祖国的承诺。”栾恩杰激动地说。

而今，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在国家博物馆里展出，中国人用自己采集到的信息制作了月球仪，中小学教材使用了嫦娥一号拍摄的月表图……

炽热的心意给了“嫦娥”，面对家人则是深沉的愧疚和想念。栾恩杰常年辗转在各地的研究机构和试验场，每次外出往往就是两三个月，以至于双亲辞世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让栾恩杰宽慰的是，父母盼望他干大事成大事的愿望实现了，就像他在父亲墓碑前所说：“我完成了你们的托付，我心中无愧。”

在经历过山河破碎、国弱民穷时代的

栾恩杰看来，探月，是中国航天能力的表达，更是国富民强的象征，“在国际航天的竞争中，谁也没有停下来等中国人。”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委名誉主任，85岁的栾恩杰依旧不懈工作，继续奔赴星辰大海。

庞众望：励志启华章， 在清华找到前进的方向

“背影留给坎坷，笑容交给阳光，名字里写着责任，步履中充满力量。磨砺过的剑，破茧后的蝶，你一直向前，一直向上，不辜负妈妈的目光，不辜负时代的期望。”

这数行闪光的文字，勾勒出精密仪器系2021级博士生庞众望骨子里的韧劲与向上的光芒。

清晨八点左右骑车来到实验室，饭点去附近食堂吃个简餐，晚上忙到九十点钟回到宿舍，这便是庞众望的日常状态。在身边师长同窗眼中，庞众望坐得住、能钻研、爱创新，“天生就适合做科研！”

今年26岁的庞众望出生于沧州市吴桥县的特殊家庭，父亲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母亲常年与轮椅为伴，自己曾因先天性心脏病命悬一线。命运似乎给了他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庞众望从未自怨自艾，而是奋发图强，2017年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

初入清华园，庞众望很在意别人的目光：“不是说在意别人看不起我，而是我害怕会有负众望。”大一大二期间，他在迷茫中不断探索，做社工、去支教、尝试科创……在清华这片鼓励自由探索的沃土上，在与身边老师同学同行中，他不断为自己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在大三期间参加SRT（大学生研究训练）项目时，庞众望惊喜地发现自己对读文献、做科研兴趣浓厚，也常因科研中的新点子欣喜很久。临近本科毕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正如庞众望所说：“大学前的经历让我有了走下去的力量，在清华的时间让我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2024年，“男生洗澡时想出第一篇SCI”冲上微博热搜。博士一年级时，一次洗澡期间的灵光乍现，让庞众望构建出了一套全新的实验思路和处理流程，在此基础上，他取得了自己科研生涯的第一项发明专利并发表了第一篇SCI学术论文。庞众望说：“在那之前，我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科研上的能力、能不能真正解决实际科研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那篇论文给了我答案，它告诉我：你能。”

博士二年级，在导师精仪系副教授王波的鼓励下，庞众望选择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方向，尝试攻关一个测试系统，用于超稳激光相位噪声的测量。此后的两年半间，他经常往返于学校和位于昌平的实验室，历经无数次推倒重来。最终在今年1月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核心测试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此外，他参与的利用轨旁光缆进行高速铁路健康监测研究也

取得重要进展。

无论是科研路上的反复试错，还是人生途中的其他风浪，庞众望从未有过丝毫退缩，支撑他踏平坎坷的是母亲庞志芹饱含力量的朴素话语：“你面对什么就要解决什么，你总是要走下去的。”像一代代清华人一样，“走下去，科研报国”是庞众望坚定选择的前进方向，正如他在一次科普论坛上所说：“我们这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科技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叫科技，掌握在别人手中，很多时候就可能成为一种威胁。”

攻读博士学位迄今，庞众望以第一/共一作者发表SCI论文三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四项，他多次获得学校各类奖学金，还被评选为2022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很多爱心人士曾表示要资助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在学校全面的资助措施下，他的学习和生活并无后顾之忧，博士期间他没有再申请助学金，而是希望把资助留给更需要的人。

从懵懂少年到报国青年，现在的庞众望对“不负众望”有了新的理解：“不是比别人做得都好，而是要不断向身边优秀的老师同学校友学习，竭尽所能做最好的自己。”

他很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全身心投身科研。面向未来，他希望自己毕业后继续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在科研报国的道路上不断攀登、不断前进。

114年来，自强不息的清华人始终以国家至上、以人民为先，一代代清华人用实干践行“我愿以身许国”的诺言。未来，正如梁思成所期待的：“中国人的脚步将越走越远，领导宇宙的新潮流。”



庞众望师门合影。左4为庞众望

刘文顺：用热血与担当铸就多彩人生

○张 超



刘文顺佩戴「全国劳动模范」奖章留影

他是清华园里立志报国的学子、深山里默默坚守的核反应堆建设者、谈判桌上用智慧博弈的中方代表、让党旗在外企高高飘扬的全国劳动模范——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7届校友刘文顺。今年已81岁高龄的他始终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精神指引，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清华人的报国答卷。

清华园里立志报国

刘文顺出生于1944年，父亲在他出生仅18天后便离世，他从小由母亲和舅舅抚养长大。舅舅是早期的大学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十分重视他的学业培养。

新中国建设初期，党中央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决定，为响应国家科技战略布局，清华大学于1958年成立了自动控制系。1961年，刘文顺从北京四中毕业，数学成绩优异，班主任建议他报考清华大学，刘文顺顺利考入了年轻的自动控制系。

“当年全系共设5个班，目的是为国

家尖端科技培养专业人才。我所在的2班是核反应堆控制班，其他还有火箭班、理论班、微电机班、计算机班。”刘文顺回忆道。

在清华求学时，刘文顺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教室、图书馆里，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为他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此外，童诗白、钟士模两位大师作为清华早期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对民族自强和科技振兴有着深切的期许，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刘文顺印象深刻：“钟老师在大教室为100多个学生讲授自动控制理论，他学识渊博，讲得深入浅出；童老师讲授电子技术基础，他常教导我们：‘你们学知识必须要学懂，要练就真本事，将来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这些教导在刘文顺心中深深扎根，“自强不息、学成报国”成为了他的坚定信念。

1967年毕业后，刘文顺先被分配到石家庄的一个军队农场，从书本到农事，历经两年军事化训练与农耕劳作，他适应了艰苦的生活，进一步磨砺了坚强的意志。

1969年，刘文顺和十多名不同系的清华毕业生被分配到四川省广元市三堆镇的核反应堆基地工作。

深山里铸国之重器

三堆镇位于白龙江畔，群山环绕的核反应堆基地犹如孤岛，几乎与世隔绝，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十分艰苦。“我们一批去的有十多个人，大部分是工程物理系、工程化学系毕业的，只有3个是自动控制

系的。”刘文顺说，“我们在学校学习了专业知识，国家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就这样，一群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扎进了深山老林，立志要用所学的知识铸就国之重器。

刘文顺参与了国家核反应堆的试运行、稳定运行。其间，由于条件简陋，没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只能对照图纸安装控制部件，在反应堆控制室内一次次调试。

深山里没有专门建好的生活区，他们只能借住在老乡家里，睡在铺了草垫子的简易地板上，地板下面是猪圈。“最令我们神经紧绷的，并不是睡觉时传来的猪叫，而是突然听到反应堆系统故障、堆芯烧结、元件损坏等声响，必须第一时间排查处理，否则可能会影响核材料的生产。”当时的经历令刘文顺至今难忘，

“那些年，我每天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保障反应堆不出错、正常运行，相较之下，生活中的那点艰苦早就被抛在脑后了。我们是六小时倒班制，清华人都是比较有担当的，没人喊苦也没人喊累，大家同吃同住，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每天都很有充实。”

在简陋的环境中，刘文顺为核反应堆事业坚守了近10年。后来，在异地的母亲身体状况恶化却无人照料，加之自身长期受核辐射影响导致白血球数值降至2000/ μ L以下，刘文顺被调回北京工作。

回京修养了一段时间后，刘文顺进入家附近的风扇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清华教给我的是要踏踏实实做事，行胜于言，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把平凡做到极致。”凭借自身的技术能力和踏实肯干的精神，他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步晋升为技术副厂长。

合资企业中的家国情怀

1990年，刘文顺迎来了职业转变，彼时恰逢中外合资企业建设热潮，他投身于医疗器械合资企业的筹建中。次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华的首家合资企业——航卫通用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获批运营，已有多年管理经验的刘文顺被提名出任公司副总经理。

项目初期，刘文顺积极争取北京市政府和亦庄开发区的支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在他的推动下，通用电气在北京亦庄开发区的投资规模从1万平方米的工厂拓展至6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和8万平方米的科技园。该项目的成功，辐射影响了通用电气医疗与航空领域在天津、无锡、上海等地的投资布局。

2000年，航卫通用电气经历股权变动，中方航天部撤出股份，形成通用电气美国总部持股90%、中方卫生部持股10%的格局。随后，通用电气美国总部提出购买中方全部股份，在谈判讨论阶段，刘文顺作为中方代表，坚决反对剩下10%的股权转让，力主中方继续持股的策略。

“我们从长远考虑肯定不能撤股，要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正是刘文顺的这份坚持，使投入的150万国有资金产生了数亿元的收益回报，更成功促使通用电气美国总部将合资企业纳入全球子公司体系，打破了产业技术的壁垒。

2010年金融危机时，企业计划裁员减薪，刘文顺通过积极争取新的项目、获取经营许可等举措，开拓出新的业务增长点，最终实现人员不减反增、薪资不降反升。

为留住人才，他推动企业成为北京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评选实验单位。同时，

他致力于在外资企业中筑牢党建工作：“既然在中国办企业，就要注重党的建设，要让党旗在外资企业中高高飘扬。”在刘文顺的积极推动下，他所在企业的党员队伍发展到了500多人。

20多年中，他多次在企业改革的关键节点推动企业健康发展。2013年退休后，刘文顺仍践行清华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以顾问身份继续工作至80岁高龄。2023年，他助力企业获批博士后工作站。如今，工作站已与深圳清华研究生院开展深度合作，助力母校人才培养。

从90年代到退休，刘文顺在合资企业担任高管数十年，他曾多次坐在关键项目的谈判桌前，始终将中方利益铭记于心，以清华人“厚德载物”的智慧，平衡着商业逻辑与家国情怀。“我们的事业道路上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但无论面对什么挑战，心态上都要稳得住，意志上更要百般顽强，发挥我们清华人的担当，永远做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刘文顺总结说。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2010年，刘文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采访中他谦逊地表示：



刘文顺（后排左1）参加通用电气医疗系统工业园奠基仪式

“我所有的成绩都是源于清华大学的培养。”为了感恩母校，刘文顺把他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档案馆。

刘文顺一直牵挂着母校，今年校庆，他回到清华园，骑着自行车一路穿过校史馆、东主楼、自强科技楼，母校在他心中始终纯粹而美好，宛如他书柜里珍藏的校徽——金属边缘虽历经岁月摩挲，却依然闪耀着熠熠的光芒。

采访最后，记者邀请刘文顺为年轻的学子们分享寄语，他深情地说道：“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深刻地理解清华校训，对于我来说，清华校训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一生的精神指引。”

在石家庄农场时，自强不息磨砺了他的意志；在四川深山时，自强不息是他对核反应堆事业的坚守；在风扇厂时，自强不息是在他平凡的岗位上将技术做到极致；在中外博弈的谈判桌上，厚德载物是他用智慧守护家国利益；在企业管理中，厚德载物是他致力于让党旗高高飘扬。

如果将人生比作一份答卷，那么在无数清华人的笔下，必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报国。这两个字，是一代代清华人用热血和担当淬炼成的精神底色，也是刘文顺波澜人生的生动写照。

“倘若我的人生经历能为年轻的学子们带来些许启发和激励，便是我作为老学长最大的欣慰啦！”爽朗的笑声里，是刘文顺一生不渝的清华情怀。

（计算机系校友会供稿）

闫建斌：破译“抗癌密码”，让“救命药”不再昂贵

○刘 帆

闫建斌，1979年生，陕西人，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合成生物学中心主任及农业农村部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02年在西北大学获学士学位，2006年在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2010年获清华大学生物系博士学位，随后在清华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展博士后研究。2013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在清华大学生命学院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18年加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担任研究员。闫建斌课题组长期专注于植物代谢与合成生物学研究，致力于推动该领域的创新发展。

从红豆杉植株中提取的天然产物——紫杉醇，是抗癌界的“璀璨明星”，广泛用于多种癌症的治疗，因为十分稀少，一度比黄金还贵，有人称“攻克紫杉醇即登顶生物合成领域的珠穆朗玛峰”。

2006年，闫建斌来到清华读博，一头扎进合成生物学领域，初步探索紫杉醇通路调控方面的工作。2013年，他毅然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国，继续投身于紫杉醇的研究。2018年，他加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十年磨一剑。2024年，闫建斌和团队终于攻克了“紫杉醇生物合成”的世界级难题，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不仅登上了国际顶刊《科学》（*Science*）、入选“2024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更让中国



闫建斌在实验室工作

在全球抗癌药研发赛道上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

“做正确的向善之事，不怕难”

“选择研究方向，要瞄准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做正确的向善之事，不怕难。”这是2006年闫建斌的导师生命学院教授谢道昕院士对他的教诲。作为谢道昕在清华的第一位博士生，闫建斌不敢有丝毫懈怠：“要敢于挑战高难度任务。学会主动‘跳火坑’，即便最终未能取得预期成果。”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研究茉莉素的识别信号转导，到探索紫杉醇的合成通路，闫建斌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

一位成年卵巢癌患者一个治疗周期所需的紫杉醇，大约需要从30~50棵20年树龄的红豆杉中提取。然而由于野生红豆杉数量十分稀少，紫杉醇在红豆杉中含量更是稀少，紫杉醇一度比黄金还贵。因此，不消耗天然红豆杉资源，直接实现紫杉醇的生物合成，是国际上百个研究团队面临

的共同难题。国际科研界半个世纪未能有所突破。

闫建斌连续数月泡在实验室，为验证数据，他反复推翻、重来上百次，浸满心血、堆起来赶超身高的实验记录本见证了他的努力与执着。他说：“科研不仅仅是大量工作的堆砌，更需要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敏锐的洞察力。”

毕业前夕，闫建斌注意到麻省理工学院已实现紫杉醇前两步的生物合成，他便出国继续开展博士后研究。2013年，闫建斌打算回国组建独立实验室，继续紫杉醇生物合成研究。他在博士后阶段的合作导师希望他留在麻省理工继续开展研究，劝说道：“如果你回国后五六年仍没有重要的科学成果，后面的发展可能很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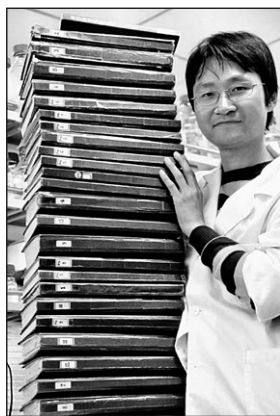
闫建斌认为，无论这项研究有多难，总要有人去突破。他说：“要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便毅然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开启了艰难的“科研长征”。

登顶，攻克世界难题

紫杉醇合成之路荆棘满布。成百上千个候选基因、错综复杂的代谢路径、庞大的红豆杉基因组……从紫杉醇发现至今的半个世纪，生物合成迟迟无法取得突破，原因在于缺少一张“蓝图”——红豆杉完整的基因组序列。

为了这张“蓝图”，闫建斌和团队深入西藏海拔四千米的原始森林，在荒山野外经历暴雨与泥石流，又在我国东北以及缅甸边境等地区采样。2021年，团队成功绘制国际首张南方红豆杉基因组图谱。

这张图谱犹如指引紫杉醇合成的“神秘地图”，而闫建斌要寻找的正是那把开启宝库的“钥匙”——缺失的酶。团队披



闫建斌展示在清华的工作记录本

沙拣金，对数万个基因进行细致筛选、验证、分析，他们处理了近两吨的植物材料，进行了无数次的分离与纯化。最终，犹如大海捞针一般，他们从58个关键候选基因中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蛋白酶。

科研长征路漫漫。要实现紫杉醇的规模化生产，为患者带来真实可及的希望，还需构建一条异源生物合成路径，这不仅是一个科研目标，更是一条关乎无数患者性命的“生命之路”。2024年1月，闫建斌团队在《科学》（*Science*）上宣布重大突破——全球首次实现紫杉醇前体的异源合成。这不仅预示着未来可在微生物或植物细胞工厂中“定制”紫杉醇，无需再砍伐红豆杉；更标志着在全球生物制造层面，中国已建立自主原创技术，在抗癌药物领域赢得了话语权。

“中国智造”紫杉醇，全球新希望

“这项成果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合成生物的起点。”闫建斌心怀壮志，要将实验室的结晶打造成“抗癌药的中国名片”。通过创新生物合成技术，紫杉醇成本预计降至传统方法的十分之一，打破国际垄断，实现自主崛起，“救命药”将不



闫建斌（左）带领团队在野外采集红豆杉材料

再遥不可及。

目前，闫建斌团队的研究成果已获多项专利，为我国紫杉醇绿色制造产业化抢

得先机。“必须把自主知识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闫建斌坚定地说。

他与团队正着手加速紫杉醇生物合成的产业化进程，下一步他们还将结合AI、植物平行反应器等技术，实现紫杉醇的高效、精准产业化构建，为全球紫杉醇研究提供重要指导和参考。

展望未来，全生物合成紫杉醇指日可待，更令人期待的是，这项技术有望拓展至其他珍稀药物合成，助力中国抢占合成生物学制高点。“科研，为世界带来美好改变。”闫建斌将持续攀登人类健康事业的新高峰。

（生命学院供稿）

杨光军：匠心雕琢中国“芯”

○赵 铭

他扎根国企16载，从0到1“雕刻”出上亿芯片产值；他手握250余项专利，却坦言“对存储器的理解还远远不够”；他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破壁者”，也是校园中的科学“播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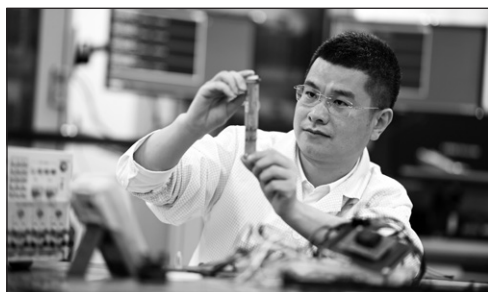
全国劳动模范，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上海制造专门委员会委员、浦东新区委员会科学城支社委员，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部级工程师兼设计部副部长……杨光军的故事，是一条彰显中国芯片人从跟跑到领跑的奋进之路，更是一曲把简单做到极致的工匠赞歌。

“一根筋”的选择

“我这人就是一根筋，属于那种不怎么灵活的。”杨光军以此自嘲，用行动诠释着“不灵活”背后的执着。

杨光军在1999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系无97班本科学习，2006年硕士毕业。大三时勤工俭学进入实验室接触到SIM卡设计，并结识了硕士阶段的导师朱钧教授，到先后加入英飞凌和华虹宏力，投身存储器设计至今，杨光军觉得人生际遇前后交集呼应，仿佛命运的安排。

从清华大学微电子所硕士毕业后，杨



杨光军检查 PCB 板上的电源和信号布线

光军的第一份工作在德国半导体公司英飞凌。在那里，勤奋刻苦的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30%的时间用于工作，70%的时间学习开放的技术资料，用一年多的时间达成了他人5年的成长进度，期间还赴德国交流，接触到了顶尖技术团队。但见识了全球顶尖技术体系的同时，他也尝到了核心技术壁垒的滋味。“最核心的东西，他们永远不会交给中国人。”他认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也印证了这一点，当赤裸裸的国与国对抗发生时，当脱钩断链不可避免时，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上。

2009年，杨光军做出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决定——以腰斩的薪资，加入国企华虹集团。“国企是能让你从‘0’开始搞研发的地方。”他认为，国有企业是创新的重要平台，有资金、有愿景、有责任去解决国家发展的“卡脖子”问题，而不受制于赚快钱的盈利压力。在华虹的最初几年里，他觉得自己更像是身在一家创业公司，忙于攻克一个个技术壁垒，带领团队解决“0到1”的根技术问题。

这些年，团队里有人离开，自主创业实现了财富自由，也有新鲜血液不断加入进来，杨光军则扎根一线16年，专注于存储器芯片设计。深受导师影响的杨光军觉得，人多少得有点情怀。“老师那辈知识分子，是发自内心为国家和科研奉献。”杨光军回忆道，“这种精神在我价值观形成期埋下了种子。”致力于赚钱的人很多，但他愿意做为国家攻克技术问题的人。“工资多点少点无所谓，在创新的过程中，在博弈的过程中，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成就

感会不断萌发，这种成就感也让人发自内心地开心。”

“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 本身就是创新”

如果你在2002年去运营商补办SIM卡，这张卡不光又厚又大还需要花费100多元，而现在的Nano SIM卡轻薄小巧还免费。彼时，中国企业尚无能力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IM卡。运营商收取的费用中，SIM卡的成本就占到80多元，其中大部分是交给外国公司的专利费用。而当2004年华虹集团推出了首颗国产SIM卡芯片后，立马迫使海外芯片厂降价90元。在技术不断迭代之后，当前一片SIM卡成本价只要几分钱，欧美芯片厂商几乎退出这个领域。

小小的SIM卡折射出中国芯片产业的飞速发展。从受制于人到突围引领，“我们不是压人工、省材料，”杨光军说，“而是把工程迭代做到了极致。”

杨光军始终记得刚到华虹时的那个圣诞前夜。初来乍到，他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130纳米嵌入式闪存电路的开发，平安夜测试样品时却发现，芯片竟形同砖头，



2003年无97班毕业合影。二排左3为杨光军

没有任何功能。他心里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满脑子都是设计和测试的种种细节。回家后边洗澡边继续思考白天测试中的一幕幕，平时只需要洗10分钟的澡，那天洗了整整一个小时，在穿上衣服的那一刻，他脑子里突然构建出了整个模型，灵光一现推测是OPC（超速保护控制）的问题导致模块电路短路，经检测后果然如此，改进后芯片顺利投产。这个技术达到了同期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卡、微处理器、智能电表等领域，并于2014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当你被逼到绝路时，反而容易柳暗花明。”杨光军笑言，“天无绝人之路，古人诚不欺我。”这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源于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创新的信念。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带领团队突破了一项项技术壁垒，完成了一项项技术创新，开发了300多个自主知识产权的闪存IP模块，助力公司成为了全球智能卡芯片的最大供应商和全球MCU芯片的主要供应商，为中国“芯”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坚固的专利堡垒，以及无可复制的工程经验壁垒。

“没有弯道超车，只有十年磨一剑。”在他看来——创新是脚踏实地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专注，是发现问题时，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答案的“死磕”；创新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是“在一个点做到全世界有发言权，再向前后看跨领域”的深度延伸；创新是山穷水尽时突然闪现的灵光，更是踩过无数坑、积累无数知识后形成的技术直觉。杨光军对创新的理解，始终扎根于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解决具体问题的务实。

愿做科学“播种人”

2019年，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和华虹集团的联合推荐下，杨光军作为创新创业青年50人代表之一，参加了创新创业青年人才座谈会，让他的视野从实验室拓展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积极参加调研研讨，将一线经验转化为议政建言，围绕光刻机产业化、GPU技术攻关等“卡脖子”问题提交多篇提案。“我提的光刻机‘破冰’建议，核心就是要产业化，哪怕从最落后的工艺开始，”他解释道，“不能只追求纳米数，没有产业化，7纳米也没用。”这些提案虽未公开，但已纳入相关部门决策参考。

工作之余，自2017年以来，通过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科普讲坛、浦东新区科普工作者等平台，杨光军连续8年走进中小学校园，年均讲座5至6场。今年频次更高，4月刚过已经讲了4场。从对专利一无所知，到变身“专利达人”，他感到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或可启发孩子们；身为奋战在技术创新一线的劳动者，他觉得播撒火种责无旁贷。

在建平实验小学，他向孩子们讲述“点沙成金”的故事；在上宝中学，孩子们向他提问“芯片植入人体的可能性以及使用寿命是多少？”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科普微讲坛上，他详解“制造一颗中国‘芯’需要几步？”在闵行区教育学院网站的“闵智学堂”栏目，他甚至生成了自己的“科学家智能体”，化身人工智能与孩子们实时对话……

“我从不照本宣科，传播知识本身不是重点。”杨光军认为，现在有众多获取知识的渠道，孩子们的知识面也都非常

广，要启发孩子们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讲座时，他往往先讲解芯片设计制作的基本原理，再请孩子们看图说话，表达自己的思考，“我的价值在于点燃他们心中的一把火。如果1000个孩子里有两三个人被启发，目的就达到了。”

“低头干活，抬头看路”

芯片行业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技术迭代几无止境。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当觉得要到终点时，最容易被人超越。杨光军总在思考，很多时候超越你的并非原本赛道的技术突破，而是跨领域的降维打击。

脚踏实地、低头干活，不代表故步自封、闭门造车。更要时时抬头看看路，认准前进方向。杨光军多次强调，要坚持“第一性原理”，在技术研发和决策过程中，对底层逻辑和本质规律进行根本性思考，从源头验证方向的正确性，避免盲目努力，贻误战机。“比如说爬山，如果你爬的方向不对，往远离山顶的方向爬，那你爬得越快，离登顶越远。”

在新技术研发中，当行业巨头砸下数十亿美元试错时，华虹的预算远不可比



2025年杨光军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肩，杨光军带领团队承担起精准判断的责任。技术判断不可能源自空想、妄想或是臆想，必然要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深度思考、知识积累和技术直觉。决策做出后，短期内他会不断复盘，假如走另外一条路会怎么样？最后判定出相对最优的路径。

“你想了一堆天花乱坠的想法，只是谈一谈而已，那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创新建立在你必须得为你的创新负责任的基础上。”面对技术生涯中的无数次重要决策，杨光军坦言“责任”和“乐观”缺一不可，“一旦做出决定，前途大概率是未知的，风险很大，但你必须乐观——因为乐观时大脑更活跃，能提供更多机会。”这种乐观，本质是责任驱动下的积极破局，也为他带来了绝处逢生的智慧。

“追求极致、敢于创新、勇于承担。”这是杨光军的劳模格言，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注脚。从清华实验室的勤工俭学生，到国际舞台的技术领跑者，他用“一根筋”的坚持，证明了中国工程师的硬核实力；他既在实验室书写中国“芯”的传奇，也在更广阔的天地播撒创新的种子。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技术的极致追求，是“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看到了对创新的勇敢突破，是“敢为天下先”的担当。

杨光军的故事，也是无数中国劳动者奋斗者的缩影。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不辍，用汗水与智慧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当越来越多的“杨光军”涌现，中国的腾飞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这，正是劳模精神的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转自“政协联线”，2025年4月30日）

李俊：有些角落，需要有人去照亮

○洛 文



李俊校友

他曾在火海和洪水中逆行，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禁区”坚守，在亟待振兴的村庄奋力破局。清华大学2014级工程物理系硕士校友、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机动二大队大队长李俊，从水与火到雪域高原，从援藏干部到驻村书记到消防大队长，他用微光照亮平凡的角落。

荣获2025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李俊说：“让温暖生生不息，就是人生最有意义的部分。”

清华园的精神馈赠

李俊的家乡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的江西省湖口县，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解救群众的感人场面，将一颗参军报国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少年李俊的心里。

2009年，从江西师范大学毕业的他，怀揣从军梦，毅然投身消防救援队伍。他

以“拼命三郎”的劲头狠劲钻研业务技能，参与灭火救援近千次，完成重大安保百余次，抢救疏散群众千余人。一次抗洪救援中，山洪围困了四十多名村民，他带队翻山越岭数小时，又顶着暴雨在过膝洪水中挽手前行3公里，往返十数次，挨家挨户拍门呼喊，最终将所有被困村民安全转移。

2014年，出于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考虑，工作5年后的李俊来到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攻读安全工程硕士，主要方向是消防安全。漫步在清华园，最让李俊印象深刻的是主干道仿佛永不停歇的自行车流。

“那景象太有生命力了！”他回忆道，“同学们都在为理想争分夺秒，就像无数棵小树苗，都在拼命地向着阳光生长。置身这样的环境，你会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自觉地去思考，去学习，去渴望在专业上不断精进。”这种浓厚到几乎“有形”的学习氛围让他着迷。

他在校友活动中遇到过几位清华老学长，听他们谈论起几十年前的学术研究课题，眼中依然闪烁着热情的光芒。“老学长们如数家珍，反复推敲，念念不忘。这种对学问、对真理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与执着，是真正高贵的品质，深深地触动了。”清华的经历，不仅赋予李俊专业知识，更塑造了他的思维方式与行动准则——认准了方向，就要心无旁骛，一直往前走，直到目标达成。这份源自清华的精神馈赠，成为他日后面对高原风雪与乡村困境时最坚实的铠甲。

雪域高原上的坚守与感动

2016年，李俊主动请缨援藏，用3年时间驻守祖国西南边境口岸。援藏第一站，是日喀则市吉隆县消防大队。那时吉隆刚经历过地震，建筑防火基础十分薄弱。李俊深感责任重大，他走遍了全县每一个村落、每一座寺庙、每一个重点工程项目，肩负起了消防监督、检查等诸多职责。经过大队全体官兵努力，全县防火工作得到了高质量提升，吉隆县消防大队获评“党的十九大消防安保先进集体”，李俊荣立个人三等功。

2018年，援藏进入第三年，李俊迎来了新的使命——转战昂仁县切热乡帕灯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帕灯村海拔高达5050米，自然环境恶劣，常年狂风呼啸，一年中有两百多天处于极寒天气。初到之时，从小在南方长大的李俊难以适应，手背、脚跟、耳朵都生了冻疮，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每晚只能睡到凌晨三四点。然而，更触动李俊内心的是这里的闭塞与落后：基础设施匮乏，没有稳定的洁净水源，取暖只能靠焚烧晒干的牛粪，夜里盖好几层被子还是冷。

到达帕灯村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在村委会前的小广场上，组织村民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茫茫雪域的映衬下，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凛冽寒风冉冉升起。那一刻，看着身边藏族同胞们无比虔诚的面庞，李俊感到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和乡亲们一起，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的生机。

“在吉隆，我的核心任务是防火。但在帕灯，我每天思考的就是怎么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怎么帮老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

‘小事’。”帕灯村缺药，李俊带领驻村工作队成员动手建立了临时医务室，而药品都是从西藏消防总队“化缘”来的；帕灯村缺水，李俊就着手筹集资金建设水井，以解决村民吃水困难的问题。

帕灯村的孩子们，牵动着李俊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是一个纯游牧村落，历史上连一个高中毕业生都没有。有的学生到五六年级了，普通话都讲不顺畅。这让我深刻意识到：有些角落，需要有人去照亮。”

李俊和队员们自发组织起来，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为村里因父母外出牧羊而留守在家的20多个孩子辅导功课。他们不仅是老师，教孩子们识字、算数、讲普通话；更像是兄长，陪伴孩子们度过孤独的时光，努力打破语言不通带来的无形屏障。李俊还积极联系社会各界爱心力量，争取到千余件学习用品和衣物捐助，成功帮助7名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获得了长期的教育资助。

李俊和队员们用真心和实干赢得了帕灯村民的信任与感情。援藏任务结束时，他和队员们计划在清晨悄悄离开。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凌晨五六点，天



李俊参加二〇一六清华
校园马拉松



2018年10月，李俊（右2）在帕灯村走访困难群众

还漆黑一片，十几位村民已经静静地守候在村口。李俊回忆道，村民们手捧洁白的哈达，在严寒中与他们依依惜别，“那一幕让我们很感动，我自己坐在车上也哭了。”这份雪域高原上的深情，成为他一生珍藏的记忆。

带领乡村发展破局的“救火书记”

2019年，李俊援藏三年期满回赣，入职江西九江武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全身心投入消防救援工作中。2021年9月，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派出3名消防员组建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进驻赣湘鄂三省交界处的修水县白岭镇温泉村。李俊主动请缨，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温泉村第一书记。初到之时，这个村的综合排名在全镇13个村（社区）中常年垫底，村民对改变缺乏信心。如何破局？李俊深知，这又是一场硬仗。

李俊从最基础的教育工作入手。深入走访后，他发现当地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基本是空白状态。很多孩子在学校表现尚可，但回到家后“连一张像样的、可以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李俊感慨：“有的

五六年级的学生，很多基本的字不认识，简单的算数也算不来，水平跟市区里同龄孩子相差很大。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我意识到，这些孩子需要被看见。”

为此，李俊依托村委大楼，迅速创建了服务留守儿童的“童心港湾”，让孩子们有一个晚上可以学习的去处。很快，三层村委大楼被充分利用起来：三楼成为集体观看红色电影、开展思想教育的阵地；二楼根据不同年级进行针对性辅导；一楼则进行最基础的补习。

每天晚上，灯火通明、书声琅琅的村委大楼，成为温泉村最温暖的风景线。为了让孩子们在家也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他还积极争取单位支持，筹集资金，为村里所有脱贫户的孩子购买了一套崭新的书桌。“这样，每个孩子回到家，至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李俊认为，一张小小的书桌，承载的是改变命运的无限可能。

李俊的目光并未止步于此。温泉小学设施陈旧，条件简陋，严重制约了教育质量提升。他下定决心，要推动温泉小学的易地搬迁。这项工程谈何容易？涉及资金、土地、规划、审批等诸多难题。李俊跑遍了相关部门，积极协调社会资源，一遍遍陈述温泉村孩子们的需要。最终，经过不懈努力，他成功协调落实了400万元资金，温泉小学易地搬迁项目终于尘埃落定。一位在村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激动地说：“这是三十年来头一遭啊！”回顾这段经历，李俊感慨万分：“做成一件事实在太难了！但只要有人认准了，咬着牙不放手，破局就有可能发生。”

乡村振兴，教育是百年大计，产业是根基。李俊积极发挥“头雁”领航作用，因地制宜，为温泉村谋划产业蓝图。他引领村集体打造“桂花树下桂花鸡”生态养殖和“黄龙山1511高山野茶”两个党建示范基地，盘活废旧房开办“白云岭上·柴火人家”生态农庄，组织留守妇女成立“白岭一枝花专业合作社”抱团增收，并利用新媒体搭建线上销售平台，不断扩大村农产品销售渠道。2022年，温泉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村集体纯收入一举突破50万元大关，比李俊刚到村时增长了4倍。村民们由衷地感叹：“这是市里派来给我们‘救火’的书记啊！”李俊“救火书记”的名号，就这样在十里八乡传开了。

回顾驻村岁月，李俊说：“做群众工作没有捷径，就是要多跟他们‘泡’在一起，唠唠家常，谈谈地里的庄稼，问问家里的猪崽，真心实意地拉近距离。”虽然驻村工作已经结束，但他时常还能接到村民打来的电话，这份情谊让李俊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奇妙的是，当你激励别人、温暖别人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更深地激励着自己、温暖着自己。我想这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熔铸“铁骑”精神，守护一方平安

如今，李俊担任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机动二大队大队长。机动二大队承担着综合保障任务：负责专业消防技能培训、执行排涝任务等重要职责。“很多学员在我们这里接受培训后，就走向了消防监督执法、应急救援的岗位，成为守护一方平安的力量。他们的消防技能、专业知识，甚至对消防事业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可以说是从这里启蒙的。”因此，他提出了“口

碑就是奖杯，岗位就是战位”口号，倡导培训工作力求“正向、有意义、高效输出”，助力每一位学员在思想上、技能上、理论上都能真正学有所获。

“人道是铁骑”是李俊的微信签名，也是他对这支队伍的精神定位——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打硬仗的钢铁之师。“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基因，就是军人作风和战斗精神。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同时，他说道，火焰蓝无论是宣传服务还是执法检查，都要带着温度，走进“人间烟火气”。“我们要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日常，让老百姓感受到，消防员不仅是危急时刻的‘守护神’，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信赖的‘安全顾问’。”李俊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正是“铁骑”精神最闪亮的底色。

2025年5月，李俊荣获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的2025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去发光发热。”李俊的话语掷地有声，“只有千千万万个微小的光芒汇聚起来，才能照亮那些容易被遗忘的角落，驱散那里的寒冷与阴霾。”他寄语青年人：“青年人不该做漠视者，而要当破局者。勇敢地付出自己的行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力所能及的改变开始。”

从火场逆行的消防尖兵，到雪域高原的驻村队员，再到力挽狂澜的“救火书记”，直至今日守护城市安全的消防指挥员，李俊始终选择坚守，在平凡的角落传递微光。这束微光，不仅照亮了他人，也照亮了他自己无比丰盈的人生旅程，传递着那份不灭的勇气与温暖。

● 紫荆花开

李婧雯：在设计中雕刻自我的形状

○曾卓崑（2003级硕，新闻）



李婧雯校友

前不久，刚刚公布的2025年未来科学大奖在科学界引发关注。作为世界知名科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的奖牌和奖状证书设计出自一位清华女设计师之手，她就是清华美术学院2014级硕士校友李婧雯。

严谨中见浪漫

“一开始其实是摸不着门道的，如何将科学探索的抽象精神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视觉语言，是应该华丽还是克制？”回忆起设计过程，李婧雯还记得最初的自我提问。

她翻遍了近十年诺贝尔奖、图灵奖等的奖牌资料，发现它们大多用金属浮雕，但未来科学大奖的“未来性”需要更轻盈的表达。最终的设计，她从“水滴”中提取灵感——既象征科学的起源，也隐喻科学探索中的微小突破汇聚成河。

奖状证书则采用“蓝金撞色”，科学严谨、冷静的“蓝”与荣耀的“金”传递出“严谨中见浪漫”的科学气质。在众多特种纸中，李婧雯选择了沉稳并带有纤维

的纸为证书基底。烫金和压印工艺制作的“未来科学大奖”中英文字样，其0.5mm高精度的凹凸造型在光线下形成微妙阴影，象征科学荣誉的“多维价值”。内页左侧页用烫金勾勒着专为每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成果绘制的艺术作品，右边的铜板镜面，用微雕技术在铜板上刻着每一位获奖者的姓名、奖项及成就，致敬科学家“于细微处见真章”的探索精神。

李婧雯的设计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好评，自2023年未来科技大奖颁奖仪式采用这套设计以来，一直在延续使用。

使命赋能设计

设计未来科技大奖奖牌和证书时，李婧雯已经从清华美术学院博士毕业。和众多清华学子一样，李婧雯认为以设计传达国家形象是当之无愧的责任，她在多个国家重大项目中都作出了贡献。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众多彩车从天安门前经过，她作为“一国两制”主题彩车的主设计，深感责任重大。“彩车设计需在短短一分半钟的通过时间内，精准传达主题。”她带领团队以象征团圆和圆满的圆形底座为车体基础，托举出熠熠生辉的紫荆花和金莲花，分别代表中国香港和澳门，在两朵金花的衬托下，车体中央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庄严、醒目。彩车底座造型为船型，四周包围海浪纹样，并将两地建筑天际线融入设计，突出两地的地域特点。每

一个细节她都反复推敲，力求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同年，清华美术学院与宝马合作推出“BMW 7系华彩辉耀典藏版”非遗车，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这款车型的设计将精湛的中国传统工艺与宝马的豪华制造融为一体，负责设计执行的也是李婧雯。

典藏版项目历时一年，每一处设计都费尽心思，每一道工艺都用料考究，最终的呈现正如其名称一样“华彩辉耀”。李婧雯设计的车身C柱上的龙纹形象，从汉代螭龙玉环中提取灵感，以“天地之间，志存高远”为寓意，通过多次博物馆考察和反复推敲，最终将传统龙纹抽象化，形成兼具力量感与流动性的点睛之笔，表达出龙腾四海，却行之大道至简、生生不息的主旨。

在车内中轴线扶手的苏绣设计中，她与非遗传承人姚兰合作，从4000余种丝线中精选4种色差微妙的灰色丝线，采用“乱针法”于缙丝上织就宋人山水图景。为达到“大象无形”的东方意境，她与团队历经6次方案修改，最终通过不同针法营造出明暗对比与层次感，使刺绣与车内烟白内饰浑然一体。

宝马车标上同样采用了非遗工艺，



李婧雯讲解彩车设计

logo中的“蓝”与“白”分别来自于宣德瓷器釉三大上品中的霁蓝釉和白瓷；

“BMW”三个字母来自螺钿工艺的巧妙拼贴，黑色外环是厚重浓郁的黑色纯天然大漆。车身喷漆的最终用色灵感来自于中国瓷器的霁红釉色，亮面红得饱和、暗面红得深邃。车中使用的降真香是让嗅觉沉浸奢华的点睛之笔，岁月凝结成充满诗意的香型，在默默诉说时间的故事。

李婧雯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开始在清华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2019年博士就读期间，通过这两个项目，李婧雯拔节式成长，在与多方的沟通合作中，在一再追求细节的完美呈现中挑起大梁，展现出跨界整合的优秀能力。

“非遗”是什么味道的？

对非遗文化的创新保护——如何用新的视角讲述非遗故事，让人们从不同角度理解非遗，被非遗所吸引，也是李婧雯设计实践的亮点之一。

2021“BMW中国文化之旅”的海南展区，在这里，一切都是可以去“闻”的。这一次，李婧雯是策展人。“这是将刚染好的线直接运到展览现场进行挂晾。”晾晒蓝染的线缓缓释放着蓝靛泥特有的草木腥气，伴随蓝靛泥中封存的发酵菌群的气息，一下子把观众带到非遗传承人制作染布的过程场景中。李婧雯选择气味载体，希望在视觉之外增加一个新的维度；她策划用4种不同的气味展示方式去呈现6种不同的味道，用气味讲述非遗背后的故事。

一件以黎族传统踞腰织机为灵感的装置作品，以梭子为原型，用3D打印出抽象的形态。一个个中空“织布

梭”挂在经线上，每只梭子都可以从中分开，中空壳中蕴藏着属于海南的各种独特味道。观众拉开梭子，便可闻到椰子的香气、海边的风、初晴的光和传承人所做农活的那片田间的气味。

“气味有很强的叙事性，又很容易牵动情绪。我们复刻当地的气息，希望观众通过嗅闻去了解和联想关于非遗传承人的一切，因为所有的非遗作品都是‘人’创作的，如果你不关心‘人’，可能慢慢地，‘物’也就消失没有了。”李婧雯说。

这种可“闻”的展览正是嗅觉设计的一种实践，也是一种展览方式的创新。李婧雯接触嗅觉设计研究始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访学的经历。“人的认知是来自多感官的，嗅觉有视觉、听觉等其他感官无法替代和模拟出的气味信息。国外在嗅觉设计方面已有多年研究，人们可以通过嗅闻一些展品的气味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我想将其引入到我的展览设计中，只有这样，人们在观展过程中的感知体验才算完整。”

设计也有温度

对于李婧雯而言，设计不仅是创造美，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智慧，可以传达关怀社会的温度。

她早期设计的“智能宠物项圈”，以及入选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JW户外家具系列”“智能移动充电机器人”，都体现了这种理念。智能宠物项圈基于对宠物肢体动作的归纳整理编程，通过内置传感器感知宠物肢体语言，并建立手机社交平台，帮助主人更好地理解宠物情绪与健康状况。而JW户外家具系列与智能移动充电机器人则展现了她在



观众以闻的方式感受非遗的味道

不同设计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李婧雯对于设计的热爱还在于点滴之间。她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设计了小红本日程本，这个看似简单的手账本“暗藏玄机”：她以设计师视角发现日常痛点，将尺规工具与日程本结合，通过精确计算实现便携性与功能性的平衡。小红本不仅是时间管理工具，更是“解决问题式设计”理念的具象化呈现——用最简练的形式满足多重需求。

李婧雯把视觉传达、展示设计、工业设计等多学科背景结合起来，在清华大学多学科交叉的环境下，结合材料、机械、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协同创新，在展示设计、工业设计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所参与的重要项目还包括：2022科技冬奥奥运场馆户外公共设施项目、中国科技馆湿地保护展/科创未来展/科普创新展/非遗保护创新成果展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TUGICC益童全球创新中心资助项目等。作为主设计，她还主持及参与了多项国家部委及国内外大型企业的创新项目。

今年，李婧雯博士后入站清华的未来实验室。“在这里汇聚了众多优秀的清华人，他们专注于各个专业，在未来实验

室，这些专业领域又都可以交叉。各学科不同的思维方式碰撞出的创意，相当吸睛、足够出彩。”说起合作者们，李婧雯的眼睛都亮了。

创新是设计的生命

不久前，李婧雯又接到宝马的新项目，为其最新款概念车打造嗅觉识别系统，“这一次是命题作文，以二十四节气为题，每个节气有自己对应的专属气味”。

即便在嗅觉这一相对前沿的设计领域，李婧雯也继续着她的深度探索。她的访学经历以及对气味与空间叙事关系的关注，让她意识到，气味与色彩的协同不仅是感官体验的叠加，更是情绪、认知与空间功能的多维重构，通过视觉与嗅觉的交互渗透，能形成“感知共振”，为使用者创造沉浸式、个性化的空间叙事。

如今在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她正致力于将嗅觉设计的相关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探索如何将气味作为一种核心设计元素，创造出超越视觉的、更为丰富立体的多感官体验。

“我非常感谢清华，清华为我们提供

了优秀的平台，前辈老师们与众多顶级品牌的良好合作一直延续，人们相信清华美术学院的设计，我们也才能在做学生时就有机会接触高规格的项目，并且在项目中得以成长。同时因为清华人对卓越有极致的追求，这在设计领域尤其重要。老师们极富责任感，我们白天上课，又常常开会讨论方案到很晚。讨论完，他们怕我们太累让我们先休息，自己还在修改方案。如此的责任感值得我们学习，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态度。”

说起设计的灵魂，李婧雯认为是创新。从本科学习平面设计到硕士学习工业设计，再到博士研究展览展示以及访学中接触到嗅觉设计研究，再到后来的气味设计的策展与实践。李婧雯一次次跨入新领域，超越自己、追求极致。她说：“只能不断和原来的自己说拜拜，每一个作品诞生前都是‘至暗时刻’，只有走过黎明前的黑暗，才能柳暗花明。”

在设计的路上永远保持激情、对新鲜事物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以一个设计师的眼光来探索世界、理解世界、改变世界。这就是“婧雯设计”的核心所在。

● 校友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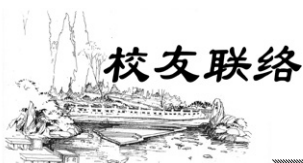
严大凡教授从教七十周年 座谈会在沪召开

今年是我国油气储运学科创始人之一、油气储运工程专家严大凡教授从教七十周年。9月10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在上海遐福养老院召开严大凡教授从教七十周年座谈会。虽已九十高龄，严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她回顾了专业的发展史，分享了从事教学、

科研和参与油气管道建设的心得感悟。严老师在退休后仍密切关注油气储运学科及行业的发展动态。

严大凡，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53年9月随所学专业转入新创建的北京石油学院，1955年毕业后留校，担任1952年创建于清华大学的石油储运专业的教师，开启毕生从事油气储运工程教育事业的辉煌历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



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2025 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举行

2025 年 6 月 21 日下午，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主楼接待厅举行。校长、校友总会会长李路明，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向波涛，校友总会副会长姜胜耀、史宗恺、吉俊民、王岩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李路明主持。

李路明感谢大家对校友工作和学校发展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情况。他指出，校友工作要更着眼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校友组织应注重“亲清公俭”：

“亲”即校友亲如一家，凝聚力强；“清”即君子之交，清白纯粹；“公”指服务校友，扶助社会；“俭”指作风简朴，不事张扬。校友工作要加强调研和研究总结，更好地助力校友成长、学校建设和国家社会发展。

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校友总会秘书

长赵劲松作校友总会工作报告及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在线教育中心主任王帅国介绍了学校人工智能赋能人才培养的情况。政策研究与规划室主任解峰介绍了学校“十五五”规划编制的背景情况。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清华校友总会关于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和《清华校友总会印章管理办法》。

在全体会议举行前，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 2025 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对于《清华校友总会院系分会管理办法》和《清华校友总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的修订。

23 位常务理事参加常务理事会议，83 位理事参加全体会议。校友总会监事杜艳、王舒列席会议。

（曾卓崑）

校党委书记邱勇调研校友工作

8 月 7 日，校党委书记邱勇到校友工作办公室、校友总会就校友联络服务工作等进行调研。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向波涛参加调研。

在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邱勇对校友办、校友总会的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学校党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强化问题意识、目标意识、效果意识，紧密结合学校中心工作，加强系统谋划和改革，推动校友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巡视整改，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严格规范，狠

抓落实，提升工作质效。校友办、校友总会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新模式，持之以恒加强班子建设和作风建设，更好地发挥联络服务校友的“窗口”作用，广泛凝聚力量，助力学校改革发展。

校友办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赵劲松汇报了当前校友工作的整体情况和巡视整改工作情况，并从构建广泛通畅的联络体系、精准有效的服务体系、引导凝聚的宣传体系和健全专业的支撑体系等方面，介绍了校友工作的发展思路。党政办、校友办相关人员参加调研。

（关悦）

第六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举行

当地时间5月23日上午，第六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在洛杉矶举行。校长、校友总会会长李路明在线出席并致辞。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向波涛在线出席。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高为元发表视频致辞。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新竹清华大学前校友服务及资源发展长李敏现场出席会议。

李路明向参会校友致以诚挚问候，向精心组织大会的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和南加州校友会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学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育人生态的重要举措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他说，无论身在何处，校友们都是清华精神的传承者。期待校友们常回母校看看，为学校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也希望校友们继续用实际行动诠释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母校赢得声誉，为国家繁荣、民族复兴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史宗恺，大会执行主席、南加州校友会会长、新竹清华大学数学系校友黄唯，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会长任钢（1979级无线电），校友代表刘兴初（1994级自动化）、史月波（1984级化工）、马列伟（1983级无线电）分别发言。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晨跑、“马约翰杯”校友运动会、北美清华校友创业大赛总决赛等活动，以及人工智能、金融、生物科技与医药、领导梯队、创业与投资、环保新能源等主题分论坛。

本届大会由清华校友总会与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共同主办，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承办。（黄婧）

清华大学2025年第二次院系校友工作会议举行

7月9日下午，清华大学2025年第二次院系校友工作会议在二教403室举行。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向波涛出席并讲话。校友办副主任、校友总会副秘书长朱亮主持会议。

向波涛表示，新时期校友工作重要性日益凸显，各院系校友工作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络机制、创新工作内容、规范运行方式、加强工作协同，推动校友工作创新发展。

校友办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赵劲松在工作报告中围绕联络工作、文化传播、发展服务、信息建设和建校114周年校友

活动等方面介绍了校友办的工作情况。他表示，校友办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联系、调研各类校友组织，形成更加系统的指导联系机制，推动各类校友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

院系校友工作分享交流环节，材料学院副院长吕瑞涛，航院党委原副书记、航院分会秘书长葛东云，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五道口金融学院分会副会长张伟，生命学院院长助理、校友与合作发展办公室主任钱文丽分别发言。

各院系校友工作代表、校友总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等80余人参加会议。（李萍）

● 行业兴趣

先进制造专委会理事会举行

6月30日至7月1日，2025清华校友总会先进制造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暨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端论坛在洛阳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专委会会长雒建斌，校友总会联络部部长田星燕，专委会秘书长马明星，80余位理事会、秘书处成员及特邀嘉宾线上线下参会。

雒建斌发表致辞，肯定专委会工作并指出，未来需进一步发挥力量，为学校和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田星燕介绍了校友工作原则。马明星在工作报告中回顾了专委会成立十年来的发展。

会议表决增补机械工程系主任周明等3位重量级学者为学术委员，并吸纳北京腾业创投高级投资副总裁何华等15位产业界精英加入理事会。

为破解产业发展中的供需错配与资源壁垒，专委会正式成立智能制造产业链小组。小组吸引了超120位来自央企、科研院所及专业服务机构的资深校友加入。

本次理事会召开期间，“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高端论坛召开。论坛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围绕低空经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校科技成果展示等主题进行分享。

活动期间，专委会调研组实地考察了洛阳轴承控股有限公司和龙门实验室，深入了解当地高端制造创新实践。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专委会在智库升级、产业协同机制创新及前沿技术共享方面取得突破，未来将继续凝聚清华力量，为中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先进制造专委会）

2025年清华校友集成电路论坛举行

8月30日，由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校友总会集成电路专业委员会、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自强芯生，聚势张江——2025年清华校友集成电路论坛”在上海张江举行。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慧，清华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赵劲松，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会长秦伟芳等嘉宾出席论坛。论坛开幕式由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校友总会集成电路专委会会长魏少军主持。来自政府部门、集成电路企业和高校院所的350余位嘉宾和校友参加了论坛。

李慧在致辞时指出，清华校友为区域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真诚地欢迎清华校友到浦东发展。赵劲松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论坛持续汇聚广大校友的智慧与资源，积极推动校友企业更好地服务社会。秦伟芳希望校友们做技术攻关的“破壁者”、产业协同的“连接者”、创新生态的“共建者”。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清华之友——集成电路学院张江高科奖学金”签约仪式。集成电路学院党委书记蔡坚，张江高科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樱作为代表进行签约。

论坛报告环节，11位嘉宾就各自所在领域进行了经验分享与展望。圆桌论坛分为两场，嘉宾们围绕行业现状、面临的机会和挑战等方面展开了探讨。

本届论坛旨在通过特邀报告、圆桌讨论、创新创业成果展示等形式，展开深度交流，搭建产学研用高度融合的互动平台，为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贡献力量。

（集成电路学院）

各地校友会简讯

内蒙古自治区清华大学校友会 注册成立大会举行

2025年8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清华大学校友会注册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姜胜耀、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领导、兄弟校友会代表及150余名清华校友共同见证注册成立的历史性时刻。

姜胜耀代表母校向内蒙古校友会注册成立表示祝贺，希望校友会紧密联结校友、服务地方发展，成为母校与内蒙古之间的桥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伟期待校友会成为汇聚人才、赋能地方的重要平台。江西校友会执行会长梅晓鹏、天津校友会会长庄宇分别代表地方校友会致贺辞，分享校友工作经验；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郭连恒作为兄弟校友会代表致辞。

内蒙古校友会会长吴景龙表示，未来要传承校友会的优良传统，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贡献清华智慧，并介绍了校友会领导班子情况。内蒙古工业大学校长宝音贺西、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周建涛、鄂尔多斯清华校友会会长刘庆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校友翟连科、鄂托克旗一中副校长乔丹等校友先后发言，分享在蒙工作生活的感悟。大会特设迎新环节，欢迎新来蒙的校友加入校友会大家庭。（胡泊）

石家庄校友会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6月29日上午，石家庄校友会赴革命圣地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西柏坡精神”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校友会党员代表、校友代表一行30余人参加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大家深入了解党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辉煌历程。随后，一行人到达南庄村中组部旧址，在会长曲俊义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建党精神”主题分享会在南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曲俊义结合西柏坡精神阐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清华人的责任担当，校友赵新朝以实干家的视角诠释了民营企业如何传承红色基因、践行社会责任。

（石家庄校友会）

嘉兴清华校友会（筹） 举办迎新座谈会

6月28日下午，嘉兴清华校友会（筹）在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举行迎新座谈会，20余位新老校友共叙情谊、共谋发展。会长、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黄开胜介绍了研究院取得的最新成果，并就深化校友合作、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发表看法。副会长、超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丰敏回顾了校友会发展历程。校友武晓峰分享了在制造业信息化领域15年的深耕经验。刚完成水利系本硕学业的张梦娇回忆了入学往事，并希望未来能为家乡发展贡献专业力量。与会校友围绕行业动态、职业发展等话题踊跃交流，加深了彼此了解，拓展了合作机遇。

〔嘉兴清华校友会（筹）〕

2025 清华莞邑新生 “学习与成长”交流会举办

7月27日，东莞校友会、广东清大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东莞日报东视频MCN、东莞市东华松山湖高级中学协办的清华莞

邑新生“学习与成长”交流会举行。近270位学生及家长现场参会，超5.8万人次通过东莞日报视频号观看直播。会长黄满权勉励新生保持真实与谦逊，脚踏实地，铭记家国情怀。10位新生代表分享了高效学习方法、备考经验、时间规划、自我管理、心理调适等经验。（东莞校友会）

奥地利校友会 接待母校学生实践支队

7月，奥地利校友会接待了来自母校日新书院的学生暑期实践支队和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暑期实践支队。在校友会的组织协调下，日新书院支队访问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支队成员在与该组织工作人员的座谈中了解其工作职能、发展方向以及当前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机械工程学院支队访问了维也纳医科大学，听取了有关医学工程交叉领域研究的专题报告，并参观了相关实验室。随后，两支支队赴国际原子能机构访问，与该机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本次活动加深了在校生对国际组织、奥地利高校的认识和了解。（奥地利校友会）

2025年南京校友会送新活动举行

8月9日，南京校友会举行送新活动，19位新生参加交流。校友会秘书长钱俊介绍了南京校友会情况。校友会代表和在校学生代表谢林蓉、李泓燕、吴雨衡向新生分享了在校的学习活动经验。来宁工作的新校友陈胜杰分享了自己的科研经历。校友会企业家分会副会长陈志兵为新生们赠送纪念品。随后，新生进行了自我介绍，并对学长们的分享表示受益匪浅。（南京校友会）

四川成都校友会举办2025迎新送新会

8月10日，四川成都校友会举办迎新送新大会。60余名新生和40余名新毕业入川工作校友参加活动。在座谈会上，在川校友介绍了学业生活及成长感悟，并与新生做深入交流。会长费永刚表示，校友会将持续提供支持与助力，陪伴大家应对挑战、稳步前行。电子科技大学原校长曾勇指出，清华与四川渊源深厚，期待与大家同心同行，共筑发展。名誉会长颜家瑾看到年轻一代的成长倍感欣慰，期待清华精神在四川接续相传。（四川成都校友会）

海南校友会举行2025年送新生座谈会

8月10日，海南校友会在海口举行2025年送新生座谈会，80余人参会。会长吴坤平在致辞中向新生们表示祝贺，并勉励大家搏击学海，未来担当天下重任。计算机系教授、海南招生组许斌老师介绍了今年的招生情况。1978级电机系校友辛健欢迎学弟学妹们加入清华大家庭。琼台师范学院副院长林琛、海南中学高三年级主任唐盛彪、新生代表和新生家长代表分别发言。座谈会上，新生们向自己的父母和参会的老师们献上鲜花，感谢他们养育教育之恩。海南校友会还为新生们赠送了纪念品。（海南校友会）

青岛校友会迎新送新座谈会举行

8月15日，青岛校友会迎新送新座谈会举行，60余人参会。校友会秘书长朱海致欢迎辞。机械系副研究员张磊向新生传递了来自清华园的关怀与嘱托。物理系副教授胡震介绍了在青岛的招生情况。北京广播影视培训中心山东省考级委员会

□ 校友联络

的赵勇主任和马镜荣老师为新生带来专业朗诵指导。随后，新生和校友们分别作自我介绍，并相互沟通交流。（青岛校友会）

2025 级天津新生与校友座谈会举行

8 月 15 日，由天津校友会、天津招生咨询组联合主办，校友会青年分部承办的新生与校友座谈会召开，近 70 名新生与 20 余位校友、师长参会。会长庄宇向新生表示祝贺。校史研究室原主任、档案馆原馆长、天津招生组组长范宝龙介绍了招生形势与成果。招生咨询组的清华师长与天津中学的教育同仁寄语新生践行清华精神，成长成才。新生们相继发言，期待用真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在读学生、招生咨询志愿者朱阅澎为新生送上建议。校友代表肖盛金、廖明等期许新生学习传承清华文化精神。校友会秘书长张翼期待同学们努力学习，报效家乡。常务副会长郝玉林寄语新生要以学为本、全面发展。名誉会长梁肃期盼新生深耕精进，强健体魄，关注天津发展。（天津校友会）

江西校友会 2025 年送新座谈会举行

8 月 16 日，江西校友会送新座谈会在南昌举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章少华寄语新生在清华书写各自的青春华章。11 名新生分享了各自的求学心路与对未来的憧憬。校友邵建生、张国书等期望学子们尚志笃学，心系桑梓，未来为家乡贡献青春力量。（江西校友会）

常州校友会 2025 年迎新送新座谈会举行

8 月 16 日，常州校友会 2025 年迎新送新座谈会在溧阳市举行，4 名新生、多

位新校友代表及在常校友、嘉宾等 50 余人参会。常州校友会秘书长汤雪平、溧阳分会会长范晶晶向新生们送上祝贺。新生代表表达了对清华园的憧憬，他们所在中学的老师们送上了嘱托。在读学生李锦，校友代表宋隆冰、方晨曦等分享了校园、职场的经历。南京校友会秘书长钱俊寄语两地校友同向同行。常州校友会会长高清期待新生们带着“清华烙印”勇闯未来，希望校友们让“清华力量”在常州这片土地上持续发光。副会长沙春元现场赋诗祝福新生，将座谈会的氛围推向高潮。

（常州校友会）

汕头校友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

9 月 13 日，汕头校友会在汕头花园宾馆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暨庆祝母校 114 周年纪念活动，近百名校友齐聚一堂。汕头市民政局、汕头市科技局相关领导，校友总会副秘书长朱亮以及广州、深圳等多地兄弟校友会代表出席活动。

汕头校友会名誉会长陈严致开幕辞。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吴潮新作工作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第一届监事会工作报告、章程修改草案，选举办法（草案），并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成员。新当选理事会会长张世渡作就职发言。朱亮肯定了汕头校友会在凝聚校友、服务母校方面所展现的积极作用，带来母校对汕头校友会及所有在汕校友的亲切关怀，同时分享了学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校史馆、档案馆原馆长范宝龙为大会带来“清华档案史料中的潮汕故事”专题分享。本次活动还制作了汕头校友会成立 40 周年的精美画册。（汕头校友会）



杨振宁、邓稼先：五十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许鹿希 邓志典 邓志平 邓昱友

在新中国物理学发展史中，绕不开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位物理学家的姓名。他们在各自从事的科研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杨振宁的贡献对20世纪后期至现在的物理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物理学的重要突破之一。杨振宁与李政道在1956年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随后由吴健雄进行了实验验证，于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邓稼先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秘密投身于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建设，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树立了榜样，为中国的

国防事业铸造了基石，在新中国科技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杨振宁和邓稼先选择了不同的科学事业道路，但两人之间的友谊从未因此受到影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是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的一句话。杨振宁在2021年9月的百岁庆典活动上说：“稼先，……我这以后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嘱望，我相信你会满意的。”这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成为了二人跨越半个世纪友谊的最好见证，是两人共同的信念。

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相识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少年时代。杨振宁于1922年10月1

日在安徽合肥出生，1929年全家随父亲杨武之来到清华园西院居住。邓稼先于1924年6月25日在安徽怀宁出生。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蜚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1929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由于两家都住在清华园西院，相隔不远，所以来往十分密切。

1933—1937年，杨振宁就读于北平崇

17-2225 31027 4795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Tung Chia Hsien	
學生註冊片		正式生		正式生	
學號姓名：鄧稼先		學籍：正式生		正式生	
籍貫：安徽省懷寧縣		年齡：十八 性別：男		(右邊各項學生不得填寫)	
院別：理學院 級別：第三年級		系別：物理 學系		入學日期：12 DEC 1941	
經過學校：校名 國立第一中學		地址 四川江津		離校：民國 年 月 日 因 休學	
家長姓名：鄧以蜚 字 敬修		職業：() 綫 閣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自請退學	
通訊處：家庭 北平西四 德勝胡同西口內四十一號		學生 本校		民國 年 月 日 著令退學	
卅一年度改名正式生(31.7.21 楊氏教授核准)		(33號除無物回正式生特錄2)		復學：民國 年 月 日 第一年級	
				畢業：民國 年 月 第 次	
				畢業： 年 月 第 次	
				畢業： 年 月 第 次	
				畢業： 年 月 第 次	

1941年12月，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时的学生注册卡片

德中学，度过了四年多的中学时光。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2年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1944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而邓稼先小杨振宁两岁，1935年先就读于北平志诚中学，后于1936年转学考入北平崇德中学，二人初次相识，从此成为一生挚友。因抗日战争的影响，北平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1940年邓稼先随家人辗转来到重庆，就读于当时的国立第九中学，完成高三学业。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

“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此乃唐代文学家李华所创作的文章《吊古战场文》的节选。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二人虽然不是同一个年级，却经常会因“跑警报”而相遇，二人相遇时常会背诵此文。对民族命运不幸、中国领土遭到侵略者践踏的哀思、悲怆、愤恨之情在二人心中常常难以排解。

赴美留学时的交集

1943年8月，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正在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时参加了第六届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选，1944年6月发榜公示，成功获取赴美留学资格。1945年11月24日抵美，翌年1月2日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1948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教授。1948年毕业后至1949年夏，任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讲师。



摄于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1945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受聘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物理系助教。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1948年秋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德克·德尔·哈尔（Dirk ter Haar）教授。1950年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6岁。

邓稼先和杨振宁在美国留学期间有着时空上的交集。因杨振宁先于邓稼先赴美求学，在邓稼先最初赴美留学选择学校时，杨振宁给予了中肯的建议。正是基于杨振宁的建议，最终邓稼先选择了普渡大学攻读博士。1949年暑假，邓稼先前往芝加哥拜访既是学长也是好友的杨振宁，和杨振宁、杨振平两兄弟相聚，借宿在杨振宁租住的公寓。据邓稼先回忆，这是他留学期间最轻松、愉快的一段时光。初到美国留学时的那段时间（1949年2月前），邓稼先生活拮据，幸得当时经济条件宽裕一些的杨振宁提供帮助，留学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通过答辩后的第九天便踏上了回国的轮

船。当时杨振宁因工作安排，未能前往普渡大学和邓稼先见面并当面祝贺。邓稼先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经香港靠岸，辗转回到新中国，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随即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奉命调入二机部九所，从此他将自己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杨振宁则留在美国，从芝加哥大学辗转至普林斯顿大学，继续从事物理学的科研工作。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以合著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荣膺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人类科学领域进取开拓。杨振宁和邓稼先在美国留学期间都经历了学术上的成长和人生观的确立，这些经历不仅是他们个人成长的重要里程碑，也为各自未来的人生找到了方向。

让二人没想到的是，自从1949年于芝加哥分别后，距离二人再次相聚竟长达22年之久。

阔别 22 年再重逢

1971年7月20日至8月17日，杨振宁开启了他的“破冰之旅”，阔别26年后首次回到祖国，先后在上海、合肥、北京等地参观访问并探亲访友，与昔日好友邓稼先重逢。而这次“破冰之旅”也为邓稼先赢得了一次人生中的转机，摆脱了一段逆境。

1971年，青海221基地连续开展了3次核武器相关实验，但结果均不理想。这些本就是科研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曲折，毕竟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需要从无数次

的“试错”中汲取经验从而得到改进。但当时221基地正处于军管中，正是特殊时期，有些人借此上纲上线，要深挖阶级敌人，大开批斗会甚至现场审判，邓稼先、于敏、胡思得、朱建士等理论部的同志都被勒令参加学习班、被迫写检查。有一天，邓稼先突然接到电话，上级要求他立即回北京参加一项重要活动。抵京后邓稼先才知道，这项重要活动正是回国的好友杨振宁提出要与自己见面。

1971年8月4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切接见并宴请了杨振宁一行，邓稼先是其中一员。时隔22年未见的好友重逢，自然要畅叙旧情，而邓稼先却因工作性质的特殊无法和好友倾心交谈，其中有太多的感情无法倾诉（因从事保密工作，分别22年间二人也无信件交往）。根据邓稼先妻子许鹿希于1990年4月24日与杨振宁的谈话录音文件佐证，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很快美国的报纸媒体就刊登了参与研究制造中国原子弹的科学家名单，这个名单中有邓稼先的名字。由此可见杨振



1972年摄于中国科学院，左起：王承书、张文裕、杨振宁、邓稼先、周光召

宁“破冰之旅”之时，心中已经猜到邓稼先的工作是和中国的核武器休戚相关的。二人的攀谈中邓稼先只是提到“我在外地工作”，或许是因好友之间的默契，杨振宁当时也没有再进一步地问下去。“我相信邓稼先是在做这里面的工作，可是邓稼先到底在中国的原子弹工作里头做了什么事情，我当然不便问，他也并没有跟我讲。”杨振宁回忆到。

在杨振宁准备离开北京时，邓稼先前去为好友饯行。临别时，杨振宁终于忍不住问邓稼先：“美国的媒体传1948年来中国的物理学家寒春（Joan Hinton）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这是不是真的？”邓稼先没有立即回答，表示这件事情需要证实一下，晚点再告诉好友。送行结束后，邓稼先立即向上级请示了这件事情，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明确批示：“如实告知。”于是，邓稼先连夜写了一封信，由专人专程送到已经抵达上海的杨振宁手中。

后来，杨振宁先生多次提及自己在赴宴时接到邓稼先的信，他在席中就展开信件，邓稼先写到：“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在早期得到苏联极少的‘援助’之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却给杨振宁极大的感情冲击，以至于热泪盈眶，不得不去饭店的洗手间整理仪容。他在《邓稼先》一文中写到：“事后我自问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激动：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从信中可感受到邓稼先当年落笔之时也是激动不已。杨振宁自然感受到了老朋友的激动，感受到了在朴实的文字

中蕴藏着的深沉的情感和其中的艰辛。他说他始终想不清楚，他未发现有足够力量的言辞，能够准确表述他与好友之间涌动的磅礴心意。此后的数年时间里，杨振宁多次回到中国，不时与昔日旧友、师长相聚畅谈。

1986年春天，因罹患癌症，经历过两次大手术的邓稼先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恶性肿瘤末期的病痛正吞噬、消耗着他的身体。当时杨振宁正值回国探亲，得知好友邓稼先病重的消息，即决定来医院探望这位心中时常挂念的老朋友。1986年5月30日、6月13日，杨振宁先后两次前往北京301医院病房，探望正在住院接受治疗的邓稼先。二人在病房中有说有笑，杨振宁的到来使得邓稼先暂时忘却了病痛，恢复了一些精神。他们二人畅谈了许多话题和共同的回忆，随后又在301医院病房楼的阳台合影留念。当时邓稼先因受到长期放射性物质辐射的影响，再加上恶性肿瘤对于身体的消耗，身体的凝血功能已濒临被摧毁。这张二人在医院中的合影可以看到，当时邓稼先右侧嘴角下方有一块未擦干净的血迹。但邓稼先即使拖着虚弱、消瘦的身体，仍开心地笑得像个孩子，对当初的大哥哥杨振宁前来看望自己十分高



1986年5月摄于北京301医院住院楼，左起：邓稼先、杨振宁

兴。杨振宁看到病重的邓稼先，回想起当年那个总是跟在自己身后、昔日求学时光时常向自己请教的弟弟，如今已走到了生命的边缘，心中百感交集。

1986年6月13日，杨振宁临别时送给了邓稼先一大束鲜花。许鹿希将这束鲜花放在邓稼先病房的窗台上面。病中的邓稼先常常凝视着鲜花，在病痛的折磨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快不行了。”邓稼先跟妻子这样说到。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与世长辞。他的遗言十分简短：死而无悔。

追思与怀念

1986年8月3日，邓稼先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当时杨振宁已回到美国，故而没能参加，于1986年7月31日向邓稼先妻子许鹿希发来唁电：“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来到北京八宝山，为这位将自己全部才智、经历奉献给中华民族的挚友扫墓。灵台上邓稼先的遗像前摆放着杨振宁献的花篮，花篮的白色缎带上面写有：“邓稼先千古 杨振宁敬挽”。

杨振宁在邓稼先的遗像前伫立良久，随后向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询问：“稼先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是在原子弹、氢弹都已经成功之后，1971年照的，当时他47岁。”许鹿希回答道。扫墓仪式结束后，许鹿希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双手交给杨振宁。盒子表面上写着：“振宁、致礼存念。”落款：“邓稼先嘱，许

鹿希赠 一九八七·十。”许鹿希将盒子打开，里面整齐地放着杨振宁、邓稼先二人共同的家乡——安徽出产的石制笔筒、笔架、墨盒、笔孟、镇尺和石印。邓稼先最后嘱托将这套坚固而又光洁纯净的家乡文房四宝送给杨振宁，寄托了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真挚纯洁的友谊。历历往事接连浮现过脑海，回忆起与邓稼先相处的点滴瞬间，杨振宁的眼泪夺眶而出，不能自己，连忙用手帕擦拭脸颊上的泪迹。

1986年7月至1987年10月间，在邓稼先去世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杨振宁先后给许鹿希寄来9封信件。其中的一封信中写到：“鹿希，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回忆。《解放军报》6月24日的文章写得很好，对稼先的为人和他的贡献都有较成熟的描述。我希望将来还有写得好的邓稼先传出版。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1986年8月15日，杨振宁来信）正因为杨振宁先生的鼓励和希冀，由邓稼先家属许鹿希（妻子）、葛康同（表侄）、邓志典（女儿）、邓志平（儿子）经过多方面调研求证、查阅资料，汇编、整理并撰写了第一本《邓稼先传》，于1998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出版后，许鹿希将《邓稼先传》亲自送到杨振宁的手中。仔细阅读后，杨振宁在给许鹿希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写到：“Dear Luxi, thanks for your book. It is very well researched. Congratulation!”（1998年9月14日，杨振宁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来）。

2016年杨振宁携夫人翁帆再次来到北京花园路一号邓稼先的家中，看望这位老



2016年，北京花园路一号院5号楼，左起：翁帆、杨振宁、许鹿希

朋友的家人们。他和许鹿希重温了许多和邓稼先的往事、回忆。杨振宁坐在邓稼先家客厅里的粗布沙发上，滔滔不绝、饶有兴致地讲述着他和邓稼先的种种往事。1972年，杨振宁第一次拜访邓稼先的住所，当时就坐在右侧靠窗的布沙发上，邓稼先坐在靠门的沙发上，二人愉快畅谈。恍惚间，似时光倒流，昨日重现，浮现出了一幅阳光穿透窗棂，洒在杨振宁、邓稼先二人的脸上，两位自少时即相识的好友正促膝长谈，真情欢聚，有说有笑的画面。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同途

邓稼先在1971年给杨振宁的信件中这样写到：“这次在北京见到你，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晚上回来后心情总是不很平静，从小在一起，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根据杨振宁的回忆：“我于1971年夏

天到中国探亲访问，很快就知道邓稼先确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至于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制造，因为是敏感消息，我觉得不应该问。

那年8月，我离开北京要去上海，过几天再从上海飞回美国，邓稼先送我去北京机场。登机前，我终于忍不住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策划？他说他觉得没有，可是要去证实一下，然后再告诉我。第二天，上海市领导请我在上海大厦吃晚饭，宴席中有专差送来一封邓稼先的信。此信给了我极大震荡。这就是这封信的来源。”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是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中广为流传的名句，邓稼先借鉴这句话，表达了祝愿自己的好友平安长久之情，二人纵然相隔千山万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因为有着共同的、纯洁坚定的信念，最终可以再度相聚的美好期望。

2021年9月22日，在杨振宁百岁华诞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杨振宁发表讲话：回忆起1971年邓稼先信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期望，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我觉得，50年以后的今天，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50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从1936年，杨振宁和邓稼先初次相识算起，直到1986年邓稼先逝世，二人有五十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2025年6月

廉洁做人、廉洁做事的楷模——朱高峰

○刘建辉



朱高峰
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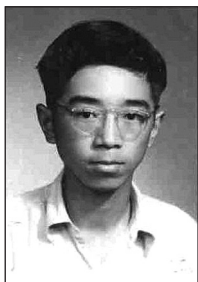
朱高峰，1935年5月27日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宁波，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1951—1952年就学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3年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获得工程师学位，同年回国被分配到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1982年起任邮电部副部长、主任级高级工程师；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每逢节日，老朋友聚餐是必不可少的。最近，一位老邮电人神秘兮兮地问我：“朱部长好吗？”这是一位比较熟悉我和朱高峰关系的人。我说：“挺好呀，87岁了，腰不弯，背不驼，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又问：“还像过去那样吗？”我一愣，瞬间明白了。他口中的“那样”显然带有潜台词。

朱高峰副部长在邮电系统工作期间，我曾多年在他身边工作，让我至今难忘的是他对于私人宴请，无论是邮电系统内还是系统外的，以及一切可能影响公务的私

人宴请都会拒绝。他对吃吃喝喝向来没有好感，也不喜欢参与。一次拒绝、两次拒绝容易，一生都能守住底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尤其是对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来说。有人称赞他自律，有人却给他贴上了“脱离群众”的标签。所以，“那样”就成了“脱离群众”的潜台词。如果不熟悉朱高峰的人听到这些传言，对他的印象肯定会大打折扣。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样的传言逐渐成形，并定格在一部分干部的印象中。尽管我曾多年在他身边工作，但始终无法理解，“脱离群众”这4个字怎么能落到朱高峰头上！难道有请必到、吃吃喝喝才能避免“脱离群众”？难道沉迷于杯觥交错就能“接近群众”？我对此不认同。所以，这也是我主动承担写作《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朱高峰传》（以下简称《朱高峰传》）的目的——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朱高峰。

朱高峰于1982年被任命为邮电部副部长，1994年又调任中国工程院的常务副院长。他在邮电部领导岗位工作的12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朝气蓬勃地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邮电通信系统从“落后”向现代化通信网大步迈进的攻关阶段。朱高峰大刀阔斧地对电信和邮政系统进行改革；呕心沥血地布局和拓展我国电信的物理网及加强、完善对外通信的渠道建设；潜心研究邮电通信的性质特点和运行规律并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在邮电部的管理工作中，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不怕你不懂，



朱高峰
清华大学读书时的

就怕你不懂装懂；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廉政建设的各项要求，人前人后从来不走样；注重对基层的调查研究和走访看望基层职工，他去过相当多的地市和县的邮电局，成为走访基层单位最多的部领导之一。

对于朱高峰的工作成绩、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可以说大多数干部是认可的。朱高峰每次出差之前，都会让秘书电话通知相关省局，明确两点要求：一是住宿必须安排在邮电招待所，如果没有招待所，就住在办公室；二是就餐必须在职工食堂，且就餐标准严格按中央要求执行。这些要求非常具体，可操作性强，体现了他对工作细节的严谨把控。他坚决反对在地方经营的饭店就餐，即使已经安排了也会让接待单位取消，一定要到职工食堂就餐。为了确保严格执行中央的要求，朱高峰不仅要求省局领导对下督办，还要求秘书每到一地，凡是到饭点时，都要去职工食堂检查饭菜的安排，一旦发现超出规定范围的菜品，一律要求撤下。朱高峰对中央指示的敬畏和不折不扣的执行态度，令所有在场的邮电人印象深刻且无比钦佩。在《朱高峰传》里，这样的场景多次出现。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些细节走近朱高峰，看到一个真实、严谨、自律的朱高峰。

《朱高峰传》中还记录了一件令人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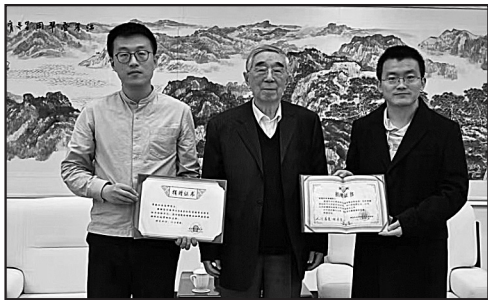
象深刻的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邮票总公司将1974—1982年发行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装订成册，作为样票供邮电部领导参考，每册定价200多元。这本邮册不仅包含了《庚申年》邮票（猴票），还有《齐白石作品选》《奔马》《从小爱科学》等诸多那个时期发行的经典邮票，其市场价格已经远超这本邮册的定价。当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朱高峰，没想到他却说：“你看看谁喜欢邮票、喜欢集邮，转让给他吧。”我有些惊讶，提醒他：“这本邮册很珍贵啊！”朱高峰却平淡地表示：“物尽其用，我不能拿它去做买卖呀。”说完，他便低头继续工作了。最终，按照朱高峰的要求，这本邮册的购买资格转给了机关里一位痴迷集邮的年轻人。

1971年底，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的研制工程处在天津召开2109工程试验总结会。由于测试过程比较顺利，工程处领导和上级相关负责人都很高兴，认为试验段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下一步可以转入京沪正式工程建设了。然而，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的朱高峰却十分清醒——如果不逐一解决试验中发现的问题，不对试验设备进一步改进，这种“带病”的设备是绝不能仓促转入正式工程建设的，这是他坚守的底线。但会议的发展方向却没能按朱高峰设想的进行，反而呈现出一边倒的肯定和赞扬。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最可能的结果是尚存问题的测试设备即刻转入正式工程建设。此时的朱高峰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他人发言结束后，在一线指挥的朱高峰能顺着前面发言的调子讲吗？作为一名正直的科研工作者，即便面对各级领导，他依然选择实事求是地将试验中发现的问题一一

阐明，并强调必须将问题解决后再推进下一步工作。这是他的态度，也是他的原则。朱高峰的发言震撼了整个会场。最终，各方经过商议，采纳了朱高峰的建议：先解决发现的问题，制作出Ⅱ型机后到京津段再进行一次测试。在面对集体决策时，朱高峰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随波逐流，避免了一次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的损失。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Ⅱ型机终于在朱高峰和他的科研团队夜以继日的努力下研制出来了。Ⅱ型机又再次被送到线路上进行试验。试验结果符合要求！面对“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严密封锁，朱高峰和他的团队在没有任何国外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鏖战，终于研制出了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

夸张一点地说，我国境内但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在邮电部门的服务范围内。所以，“点多面广”是邮电服务的特点之一。有人居住的地方就要提供邮电的普遍服务；有服务，就要有邮电职工的值守。在我国，许多邮电职工常年坚守在边疆地



2024年1月，云南省会泽县和澜沧县代表为朱高峰（中）送来捐赠证书。2023年6月，朱高峰将获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所得的100万元奖金捐赠给中国工程院定点帮扶的两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云南省会泽县和澜沧县，用于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区，那些地方往往是高山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寒冷、条件艰苦是他们生活与工作中面对的常态。朱高峰曾多次说过，有机会就要多去别人（主要指邮电部及省邮电管理局的干部）没到过的地方，去看看基层的员工。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990年、2000年和2005年，朱高峰3次前往西藏。2000年，他受邀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过一次科普报告。2005年赴藏时，他专程前往海拔近5000米的那曲市一个邮局，看望坚守在那里的邮电职工。5000米的海拔，氧气稀薄，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就是不走动呼吸都很困难。但朱高峰依然按照既定的工作节奏，先查看了邮电设施，随后与职工座谈，最后在会上发表讲话。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领导和地方政府的领导担心朱高峰一路奔波身体吃不消，劝他不必讲话了，但他执意坚持。直到与职工告别后，他才感到胸闷、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蹲在了地上，大家急忙扶他休息片刻才好些。所以，朱高峰下基层从来都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他抱定的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驱使他即便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仍然不忘自己的使命。

这就是朱高峰，一个平凡且普通的部级领导干部，他将全部的智慧、精力、热情都献给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即便已到鲐背之年，他依然心系国家建设，积极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他始终践行中央廉洁做人、廉洁做事的要求，对自己、对家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转自《朱高峰传》，人民邮电出版社，2025年出版）

徐心坦：将清华党组织珍贵史料留住

○ 李 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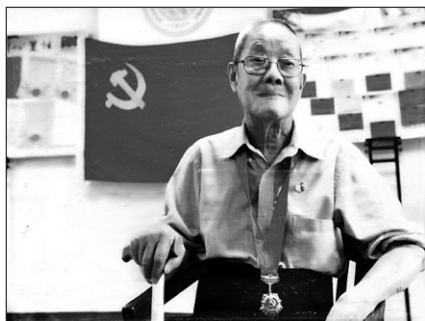
徐心坦，1930年5月8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9年任水利系人事科科长，其后历任学校保卫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党办主任、校史研究室主任等。1991年离休，返聘至2004年。曾主持编撰《清华革命先驱》《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参与编撰《清华大学志》《清华人物志》等书籍，为清华大学的人事工作、党委办公室管理工作、党史和校史研究工作等作出重要贡献。

2025年5月8日，清华大学中楼社区的一间公寓里暖意融融，阵阵欢声笑语为原本宁静的房间平添许多生气，古朴的书桌、书架上的老照片都记录着岁月痕迹，老同事和党政办工作人员围坐在徐心坦老师身边，大家带来寿桃形的蛋糕和真挚的祝福，共贺徐老师95岁寿辰。

开心的笑容一直挂在徐老师的脸上，“我特别高兴，特别感谢大家的关心！”徐心坦紧紧握住大家的手。虽然岁月已悄然带走他的视力，提起往昔，他的回忆依旧清晰而鲜活。

家国沦丧 于暗处寻光

徐心坦1930年出生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在动荡岁月中度过苦难的童年。1941年与1944年，日军接连入侵中国临海地区，福州遭受重创，两度沦陷。徐心坦目



徐心坦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睹家乡变得满目疮痍，十分愤慨：“日本人霸占了我的家，我们跟着母亲逃难。国民党的兵竟然不战而退，扔下老百姓给日本人当亡国奴。”那时，徐心坦正在福州市立中学读初中，他深感照此下去，中国的未来将没有希望。

16岁时，徐心坦考入福州市第一中学，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中，他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1948年，班上的一位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唐文光（后任中组部干部，福建省人事局局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注意到了爱国心切的徐心坦。经过一番观察，唐文光认为徐心坦可以进行发展，便开始与他接触。徐心坦向唐文光谈起对时局的担忧，觉得国民党无法拯救中国，唐文光说：我们可以找中国共产党。自此，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徐心坦心中生根萌芽。

“后来，唐文光对我说：‘我就是地下党，我发展你入党，你加不加入？’我就很乐意地加入了。”1948年10月，18岁的徐心坦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参加

地下组织工作。

传递曙光 组织创办地下小报

徐心坦学习成绩优异，在党支部担任宣传委员。那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中共的消息，徐心坦便在夜里收听新华社广播，获取来自延安的重要消息。他将收听到的新闻仔细记录，并用复写纸写出多份副本，到了白天就交给支部书记唐文光，唐文光再给到一些党员传阅。大家由此了解到延安的最新情况，深受鼓舞。然而，徐心坦逐渐感觉这种方式传播范围太小，影响也有限，他想到用蜡纸刻版印刷。

说干就干，他与同学们一起凑了些钱，购买了印材。在徐心坦家里，他与3位同志分工合作，用自创的简易印刷方式开始工作。他们将新闻内容刻写到蜡纸上，再附在刷了油墨的厚玻璃板上面，盖上白纸，用手抹平，一张张新闻纸由此诞生。“这样印了几次之后，我们都认为它可以算是报纸，想要给它取个名字。”徐心坦说，“上面的内容主要是从延安传来的有关解放的消息，所以就叫《解放之

声》。”之后报纸又改名为《小火星》，寓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最初的每期几张，到刻印技术愈加熟练后的三四十份，徐心坦组织大家共克时艰，用简易的方式坚持办报，将延安的消息一次次传及福州地下党组织。

1949年2月，徐心坦高中毕业。同年8月17日，福州迎来解放。彼时，中共办的报纸还没有发行至全国，《小火星》便在当地承担起传播新闻的任务。他们利用收缴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印刷设备，铅字排版印刷，在过渡时期，向迫切需要了解情况的百姓及时传递重要讯息。

完成高中学业后，徐心坦来到福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工作，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被晋升为办公室主任。虽然在福州解放前后，他已不再参与《小火星》的具体工作，但他带领地下党员创办报纸的思想理念、不畏困难的实践坚守，为这份地下小报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将党中央的声音和胜利的曙光持续传递。

报考大学 投身清华建设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在职人员报考大学进行深造。“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我想去大学学习科学技术，将来发挥更大作用。”徐心坦激动地说。当时有很多人劝他说在市总工会的工作很好，应该继续干。“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有89.5元，在当时算是很高的，而上大学就只有29.5元的调干生助学金，除去伙食费12.5元，仅剩十几块钱。但我觉得是值得的，下定决心去考大学。”徐心坦坚定有力地



老同事陈秉中（左3）、史宗恺（右2）和后辈同行为徐心坦（右3）庆贺95岁寿辰

□ 人物剪影

府——清华大学！”

距离高中毕业已有8年，徐心坦刻苦用功，同年便如愿考入清华。他原本打算学习发电相关的技术，在一位老同学的介绍下，选择了水利系的水利电力动力专业——既包含电力技术，也能学到机械和水利方面的知识。那一年，水动专业设有两个班，徐心坦所在的是水动11班。

两年后，由于系里缺少干部，徐心坦被抽调到系里的行政部门工作，兼顾学习专业课。1959年，徐心坦全面投入到系里的工作中，担任水利系人事科科长。其后，根据学校事业的需要，他先后担任了保卫部党支部书记、副部长，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到江西鲤鱼洲进行劳动改造。

1971年，徐心坦从鲤鱼洲回到清华，担任人事处处长。1977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刘达同志到清华主持工作，任校党委书记、校长。由于“文革”造成的破坏，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几乎陷入停滞。拨乱反正、让学校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成为当务之急。刘达希望掌握学校各级干部的详细情况，尽快为冤假错案的教职员工平反，以便恢复他们的工作。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推荐了徐心坦和工物系党委书记曹小先，协助刘达开展工作。为了确保相关的调查顺利进行，刘达亲自向各院系、部门写了介绍信，方便徐心坦和曹小先查阅专案材料、人事档案，以及与各类人员做访问和谈话。每过一两天，两人就提交几份调查报告给

刘达，经审查后，相应的人员便可以恢复工作。拨乱反正的工作扭转了学校的困境，使校园重现活力，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教学科研道路。1984年，李传信当选为校党委书记，他将徐心坦调到党办任主任。党务工作和人事工作是非常考验人的，既涉及历史考证，又涉及人员评价，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同事们对徐心坦的工作高度认可：“做事认真细致，让大家心服口服。”

1980年代初，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各级党委陆续设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和党史研究编纂机构。1982年9月，学校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徐心坦和当时刚刚从校办主任岗位退下来的何介人一同被指定为小组负责人。1984至1986年，还兼任了学校档案室主任。1986年8月，学校在校史编写组基础上，正式设立校史研究室，次年2月，徐心坦又被任命为首任校史研究室主任。

为弘扬清华革命传统，1989年初，校党委决定建立清华英烈纪念碑。李传



20世纪80年代末，徐心坦老师（前排左4）与同事参加校际工作研讨活动后合影

信当时已退居二线，担任校史编委会主任，他指出：碑名应为“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碑文上应包括每位清华英烈的简况，选用一块能代表英烈们经过风雨锤炼仍刚毅而朴实的天然岩石，碑的选址应在同学经常活动地方的附近，力争在当年9月底前建成。徐心坦负责各项任务的具体落实，时间紧，任务重，他与多个部门的同事一起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夕，纪念碑揭幕落成。如今，清华英烈纪念碑已成为校内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

1991年，徐心坦离休。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使他责无旁贷，继续返聘领导和参与校史研究工作。几年的时间里，他与校史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做了大量的校史研究工作。当年正值校庆80周年，徐心坦组织举办了校史展，展览首先在同方部开展，校庆过后又搬到了图书馆里继续展出。徐心坦经常鼓励大家放手去做，打造出团结、融洽的工作氛围。

“热心肠的老徐！”党办原主任、校史研究室原主任陈秉中回忆道，1978年他们还没有在同一部门共事时，徐心坦得知陈秉中的公公腿部骨折，便立刻前往探望，并参照自己母亲骨折后的治疗方法帮助其康复。在校史研究室后辈王向田眼中，徐老师是“党性原则强、工作能力强、态度积极认真”的领导和长辈。

“心坦，心坦。人如其名，是心胸坦荡之人。”是众多共事者对他的评价。

执笔拾光 抢救珍贵史料

徐心坦多年主持和参与学校党史、校史资料整编工作，贡献卓著。特别是在离

休后，他参与了《清华革命先驱》《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人物志》等书籍的编撰，为清华留住了珍贵的史料，亦使自己的返聘岁月熠熠生辉。

“这是一个抢救性工作。”谈及从1982年开始参加清华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徐心坦感慨说道，“因为清华地下党的历史，在档案馆或者其他地方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们首先查找了地下党老同志的联络地址，邮寄出600余份调查表，征集、核实他们的入党时间、发展人及发展对象、党内职务等信息资料。同时前往老同志家做进一步访问、调查，请相关同志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况。

收集来的大量党史资料及研究成果，除了作为珍贵的档案材料存入了校档案馆，校党史校史研究室也着手编撰成书《清华革命先驱——中共清华大学地下组织活动及组织史要》，由徐心坦、陈秉中、王向田三位同志主要承担这项任务。

书籍初稿完成后，他们发给多位老同志做补充修订，并组织座谈会，和老同志们一起讨论、修改。徐心坦清楚地记得，2001年12月，李传信同志在工字厅东厅组织召开《清华革命先驱》初稿讨论座谈会，多位老同志参会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其中，何东昌介绍了在清华园解放的当天，他到三家店解放军的军机关与解放军交流的相关情况；庞文弟提到自己去青龙桥与解放军的团级干部交流；熊向晖指出，在“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是站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的……许多宝贵的资料接续涌现。鉴于老同志们写过大量有关地下党的回忆文章，何东昌建议将这些回忆内容组织整理，编入此书作为下册。

2004年4月,《清华革命先驱》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共约100万字。老校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题写书名,并撰写序言。赵德尊、郑天翔、熊向晖、陶瀛荪、王汉斌、彭珮云、何东昌等老同志为该书题词。

《清华革命先驱》上册讲述了清华党组织的活动和组织概况,下册主要刊载了清华地下党老同志们的回忆文章及访谈记录。

经过对史料研究,徐心坦与同事们总结出了清华地下党的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清华地下党组织从未断过线。从1926年11月清华的第一个党支部建立,由王达成同志任支部书记,后续都是下一个紧接着上一个,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党组织基本上连续存在,没有断过线。1930年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得白区党组织大量暴露,损失了近百分之百,而清华地下党组织在波云诡谲的时局中依然坚挺。

第二,清华地下党组织始终坚持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学校南迁到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共有地下党员十余位,其中大部分是清华人,并陆续发展了宋平、陈舜瑶等同志,宋平入党后响应党组织号召去延安参加了革命活动。学校继续南迁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周恩来指示地下党组织要广交友人,地下党同志根据指示认真组织各种学习活动,同时与地方建立了统战关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起内战,1945年12月1日,地下党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开展声讨大会,提出“反对内战”口号。西南联合大学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6年,学校陆续回迁北平,此时的清华园里地下党组织包括“南”系和“北”系,两系相互配合发动进步学生运动,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美扶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宣传活动,并发动朱自清等百余人联合签名直斥美国救济粮;同时,联合党的外围组织,进行唱革命歌曲、读革命书籍等活动。

第三,从第一个党支部的3名党员,到清华园解放,累计共700余名党员中,没有出现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

在史料研究和书籍编纂的过程中,徐心坦深受清华地下党光辉历史的感染和教育,他说:“我特别希望广大清华师生员工能够了解这些光辉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

以笔为旗 匠心成就大事

时至今日,每当人们查阅清华校史或地下党历史时,徐心坦的贡献都是后辈做研究的扎实基础。

当年,他以笔为旗,令人起敬;如今,他大多时候是坐在家中沙发上的平静长者。而每当有来访者请教相关资料时,他总能凭借记忆清晰讲述、将数据准确报出。经年累月的资料收集与研究,使他对关键史料了如指掌,这种铭刻在记忆深处的信息早已超越了视觉的局限,融于岁月,不会忘却。

在清华,有许多“徐心坦”,他们在非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数十载兢兢业业,认真的习惯刻入骨血。于偌大的清华园中,他们平凡而重要,支撑起学校的运转,记载着学校的古今,匠心成就卓越贡献。他们记载了学校的故事,而他们的故事,也值得我们记录!



天津戈登道 27 号的清华抗战秘闻

○袁 帆（1975 级建工）

天津英租界，一个浓缩了部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戈登道 27 号，一个富有时光感的旧时地址。当二者一起叠加在“1937”的历史天幕之上，却成为一段清华抗战秘闻的代名词。

一、清华天津同学会在哪里

从 1911 年清华学堂开学，清华建校已经超过 114 年，而成立于 1913 年的清华同学会几乎与清华同龄。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开始，清华毕业生集中的华北、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建立同学会分支机构，清华天津同学会由此应运而生。

在 1933 年、1937 年清华大学编发的《清华同学录》中，天津同学会的地址都是“天津英租界戈登路 27 号”。这是如今能查到的清华校方早期记载。

在早期清华校友的天津记忆中，“戈登路”或“十三号路”屡有出现。天津英租界是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租界内部共有 74 条编号道路，其中十三号路对应的名称是“戈登道”（亦称：戈登路），因此二者表示的是同一条道路。

（一）清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的回忆

1937 年 8 月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在北平的清华教授分头前往。1937 年 10 月 14 日，浦薛凤（1900—1997）等人同路赴天津乘轮船南下。他在后来回忆录中记载，“黎明即起……至前门车站。车开后每站必停，幸坐头等，未盘问，未检查。黄昏时候，车

抵天津车站（共行九小时）。……大镇在站外相迎。遂雇车至法界六国饭店。随即结伴到紫竹林夜膳。……晚饭后到英租界十三号路廿七号访企孙，尚卧床修养，病况尚未痊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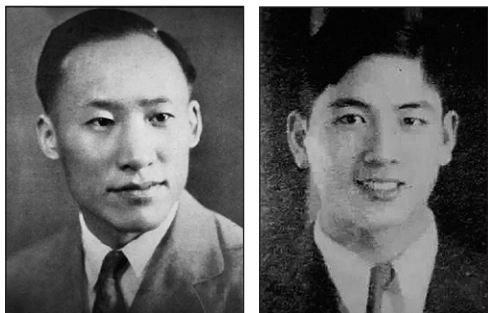
（二）清华外文教授吴宓的回忆

吴宓（1894—1978）在 1937 年 10 月 26 日，曾从北平专程赴津，探望因病滞留的叶企孙，并商讨去长沙任教的事宜。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下午 2 点至天津英界，戈登路（十三号路）27 号，清华同学会，见叶企孙，病已大愈，惟需修养。宓即宿于企孙与镇同住之室中（楼上）。”

此行使得吴宓决定去长沙，返回北平后再于 11 月 7 日到津，他的日记中又记



戈登道 27 号位置示意图（20 世纪 30 年代天津地图）



叶企孙与熊大缜（20世纪30年代）

载，“下午1:30抵天津东站，熊大缜君在站迎候，一切毫无困难。即乘六国饭店（Hotel Modern）之汽车，至法（租）界该饭店居住。……宓偕缜至清华同学会晤企孙。旋独返六国饭店”。此后他在大沽口登上轮船，辗转青岛、济南、徐州等地赶去长沙。

（三）清华毕业生苏良赫的回忆

1937年6月，1933年入学的苏良赫（1914—2007）在清华地质学系毕业，他本是天津人，彼时因家庭搬去唐山而无处居住，于是“到天津后，到日本兵尚未进驻的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同学会落脚。同学会临街，对面是一个大体育场，可以赛足球或其它球类”。他所说的“大体育场”就是天津英租界里最早的运动场——落成于1895年的“英国球场”（RECREATION GROUND）。苏良赫的回忆为确定“戈登道27号”坐落位置提供了明确的参照地标。

二、叶企孙与清华临时办事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图谋占领华北的阴谋昭然若揭。尽管清华已经对此有所准备，进行了一系列提前布局，但当1937年战争真正爆发后，还是显得措

手不及。正在江西九江参加“庐山座谈会”的校长梅贻琦（1889—1962）无法回到北平，因此清华的千余名师生何去何从，一时间失去了方向。

1937年8月14日，叶企孙（1898—1977）与助教熊大缜（1913—1939）离开北平到达天津，他们此行原本是准备尽快南下的，不料，在津时，“吾得了副伤寒症，移往李大夫医院。10月初副伤寒已愈，但又得膀胱炎，原医院治不见效，于是移往清华同学会，吾请医生医治，医疗期间约为两个月”（叶企孙自述）。

梅校长从8月底开始奉命投入长沙临时大学的组建工作。与此同时，关于清华园如何善后，如何将滞留平津的教师迁往长沙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也被纳入统筹计划之内。而重中之重，是要选择一位有能力、有影响、有担当的人物靠前负责这项工作，替清华校方分忧解难。于是，在天津治病的叶企孙就成了最佳人选。据其本人回忆，“约在10月初，清华大学在天津清华同学会成立了一个临时办事处，负责协助南下教职工购买船票等事，由我主持其事，由熊（大缜）协助”。

就这样，叶企孙被历史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戈登道27号”也将见证叶企孙与天津临时办事处书写的一系列传奇故事。

（一）协助清华教师南迁

平津沦陷后，津浦路北段铁路运输中断，清华教师欲往南方，必须从天津搭乘外国轮船，到青岛后再经胶济线、津浦路南段、陇海路、平汉路去往长沙。敌寇凶残，兵荒马乱，旅途艰险，困难重重。为了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离开天津，脱离虎口，办事处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安排食宿，



叶企孙在清华同学会养病期间留影（1937年秋）

购买船票，这些具体事宜都是由熊大缜处理，是他一次次化解困难，是他一回回迎来送往。那段时间里究竟有多少清华人在他的帮助下踏上旅途，现在已无法精确统计。但从许多人的回忆中总能看到“小熊”“大缜”的影子。

在现存清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封1937年10月初从天津发到长沙的《熊大缜报告李辑祥等行期》的电报，极具代表性，全文如下：

长沙下麻园岭（22号）梅月涵先生：筱韩、仙洲、荫章灰离津；逃生、化成、明之、筱孟、约翰、继善铕离津。大缜。

这封电报告知长沙的梅校长：李辑祥（筱韩）、刘仙洲、朱荫章、浦薛凤（逃生）、王化成、王裕光（明之）、孙国华（筱孟）、马约翰、陈继善等9位教师，分别将在10日（灰日）和16日（铕日）离津。提前预告行期是为了使校方掌握动态，以便安排到校教师的教学与生活。在浦薛凤的南迁回忆中，他记载过，“盛京轮原定十六开驶，但再三延期。迟至十八日始启碇”。这与电报的信息相互印证，只不过实际离津日期被推迟了两天。

请注意，当时这些教师都是只身一人去往陌生的异乡，而他们与仍在北平家眷

间的报平安任务也成为临时办事处的日常。仍是浦薛凤告诉我们，当他们一行人经过9天日夜奔波，于10月27日抵达长沙下榻旅馆后，他即刻“发电二：一致（天津）企孙托转各眷属，一致常熟双亲，报告托庇安抵湖南省垣”。

（二）总揽清华平津善后事务

其实，支应清华师生南下，只是临时办事处明面上的主要工作，叶企孙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同在北平的张子高（1886—1976）教授，全面负责留平人员，经费管理和校产保护工作。

北平沦陷后，清华设立了由45人组成的“校产保管委员会”，虽自成独立系统，但其后期人事安排是由叶企孙负责决定。这一点由1938年2月7日清华在长沙举行的第十二次校务会议的决议得到明确：

“一、（略）；二、函请叶企孙先生，就北平本校保管人员任职情形全权酌定应令继续担任保管人员名单，其余应给资遣散。”1938年4月19日，第十三次校务会议又确认，“追认叶企孙先生在津所定北平本校保管员处置办法”。

财务与经费管理是校产善后管理中的重要部分。清华善后过程中究竟花了多少钱，尚未看到相关研究。但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可以清晰看到叶企孙在管钱、管物两方面的工作。

1. 1937年11月19日，叶企孙函告（长沙）梅贻琦校长，“一、（略）；二、保管会之用款报告于后：九至十一月共二万零十五元，其后每月约五千三百五十元（详略）；三、保管之款尚有五万二千余元；四、自九月迄今，津方共收到京湘汇款二万七千元，内有六千借给北大，津方共用去约一万六千元，余款约有五千元，债

均已还清”。

2. 1938年6月3日，在第十四次校务会议（昆明）上梅校长报告，“据叶先生报告，本校留存北平之校款，截至四月半止，尚存三万八千五百余元”。

3. 1938年6月17日，第十五次校务会议（昆明）议决，“一、……本校发给留平教授维持费，以发至本年七月份为止。二、本校留平各保管员……现尚实际担当保管职务者，仍照前发给维持费，并保障将来回校服务机会，其人数由叶企孙、张子高两先生酌定。三、（略）。四、本校现存平款项尚有四万余元，应保留在平之保管费用外，余款请张、叶两先生视当地情形酌量南调。五、各系存平仪器，请叶、张两先生商同各系同人，嘱存件公司设法运（香）港。六、本校移存北平城内之档案簿册现已运津，其主要文件及总结账簿，可设法抄写副本寄滇，余件均暂存津市，在张叶两先生南下前另酌托人照料”。

在将近90年之后，透过这些繁琐事项和枯燥的数字，我们可以感知，清华在遭受伤筋动骨般的劫难，经过短时间的慌乱之后，很快恢复有效的领导力，凭借广大师生的爱国情怀和优良素质，迅速投入战时教育状态。这不仅是中国知识阶层在国难当头时充分体现出的担当精神，也是后来西南联合大学八年艰苦办学，创造世界教育史上伟大奇迹的基本原因。而那些由叶企孙所作的具体组织工作，正是他为“科学救国，全民抗战”添加的独家注解。

三、临时办事处变身秘密联络点

1938年春天，就在天津临时办事处的工作渐近尾声之际，一场意外的变故在清

华同学会悄然发生，戈登道27号悄然变身为一处抗日秘密联络点。而谁都不会料到，叶企孙、熊大缜等人的命运也将由此发生改变。

（一）熊大缜投身八路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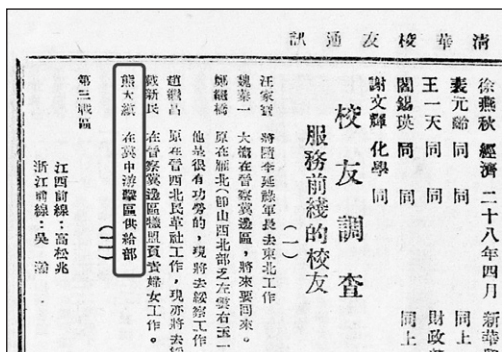
原来，随着平津沦陷，日寇沿津浦、平汉铁路线大举南侵，无暇顾及冀中腹地。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这一战略时机，联合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与抗日人民武装一起，于1937年秋开始在冀中平原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由于根据地急需医疗、通讯、军工等各类专业人才的加入，平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开始在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大专学校“朋友圈”里，积极联络、动员爱国知识分子去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曾长期担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辅仁大学助教张珍（1909—2004），利用其人脉关系寻找可能的对象，其中一位就是1932年由辅仁转学清华化学系的孙鲁，而孙鲁当时正患病不能前去，就在1938年春节利用回天津过年的机会，到清华同学会找到了此前本就认识的熊大缜，动员其去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前往。

叶企孙对此记忆深刻，他的回忆是，“1938年春节后，有一天，熊突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劝阻他”。就这样，熊大缜几天后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

1938年4月，八路军冀中军区成立，领导机关共设“司、政、供、卫”四大部。熊大缜投笔从戎后改名“熊大正”，不久他就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遂被任



《清华校友通讯》中的有关记载（1939年9月）

命为供给部长。

关于这段历史，当年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吕正操（1904—2009）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记述，对熊大正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说“他领导供给部，无论是在军工生产工作，还是从平津输送军需物品，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无独有偶，在1939年9月《清华校友通讯》的“校友调查——服务前线的校友”栏目中，竟也非常明确地记载着：熊大缜，在冀中游击区供给部。看到这条历史信息，我多少有些诧异！原来，熊大缜去冀中参加抗日的事情在当年的清华校友圈里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曾经闻名于清华园的“小熊”为了抗战，其实已在1939年夏天以极其壮烈的方式殉难于冀中平原！

（二）叶企孙秘密支持冀中抗战

熊大缜去冀中后，叶企孙自称起初十几天“神思郁郁，心情茫然”，但到后来他选择主动协助熊大缜工作，清华临时办事处亦悄然变身为抗日秘密联络点和中转站。直到后来秘密活动引起日寇察觉，叶企孙才于1938年10月5日撤离天津去昆明。

熊大缜每次到天津筹措物资，都回到戈登道27号落脚。在这里，叶企孙安排清华化学系研究生林风（1911—2018）研制烈性炸药，制作地点是在清华早期毕业生杨锦魁（1913级）在英租界里开办的宝华油漆厂。为了解决冀中军区急需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叶企孙还与原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1895—1946）建立联系，由其提供元器件，并派人秘密装配发报机，“装配地点在清华同学会三楼”（叶企孙语）。

在叶企孙和熊大缜的协同组织下，一批清华师生先后到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清华物理系的仪器管理员阎裕昌（门本中）、清华机械系技士胡同霖（胡大佛），汪德熙、李琳（李广信）、葛庭燧、张瑞清等人。其中，阎裕昌在1942年“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吕正操将军对阎裕昌（门本中）印象极为深刻：“他是爆炸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原是清华大学的技术员，到根据地后有人叫他门技师，有人叫他工程师。

（后来他不幸被俘虏）敌人把他残杀了。门本中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为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的军工生产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四、戈登道27号如今在哪里

因为叶企孙，因为熊大缜，因为当年发生在这里的秘史逸闻，“戈登道27号”对于清华大学，对于天津，都有了不寻常的历史意义。当我领悟到这一点后，当然特别想知道：这个特别的地标到底在哪里？

风云变幻，时过境迁。寻找“戈登道27号”不可避免地遇到两个问题：一是

当年的房子还在吗？二是这处房产现在如何？

（一）当年的房子还在

回顾天津近代史，中国政府于1945年11月收回已建立80余年的英租界主权，并更改原来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路名，“戈登道”被重命名为“湖北路”，至今未再变更。那么，原来的“戈登道27号”房产是否还在？地址是否原封不动换成“湖北路27号”呢？

确定房产是否还在，最直接的办法是查询公安、市政、房地产等政府管理部门的历史档案，但经过多方努力尚无结果。再一个困难是至今没有见到戈登道27号的老照片，或者当年的相关地图标注。

于是只能采取“反证法”，根据亲历者回忆中的“临街”“大体育场”“三层楼”“外加地下室”，还有进门要“走上十几级台阶”等特征关键词，进行实地勘察。2024年4月24日，经过我的实地比对，发现只有“湖北路13-19号”的建筑形式与特征完全符合，且在周边建筑中具有唯一性。由此推定，当年的清华天津同学会就设在这幢建筑中。而现在的“湖北路27号”是天津艺术研究所，无论是位



湖北路13-19号楼的凸窗（局部）

置，还是建筑形态都不符合比对要素，故可以排除。

（二）4个门牌号哪一个对应“27号”

经过反复观察发现，“湖北路13-19号”原来是一幢带凸窗的英国维多利亚式联体建筑，由4个独立单元、两两对称组合而成，每个门牌号独门独户，从地下室到三层共有四层空间，内部至少有7个房间。问题来了，13、15、17、19四个门牌号哪一个对应当年的“27号”呢？

阎裕昌烈士当年不止一次到过“戈登道27号”，根据其后代的相关回忆与描述，清华同学会进门后“一楼右手第一间临街是会议室”。这个特征符合建筑最右面19号单元的特征，而最左面13号单元在建筑平面上是（左手）反向的。

结合近年来天津“五大道”历史风貌区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当年的“戈登道27号”就是如今的“湖北路19号”，当然更希望能有确凿的历史档案资料给予结论支撑或者修正。

五、结论

关于天津湖北路上这座英式建筑的变迁，至今我们尚未知晓详情。但其寿命，即使从1933年清华同学会驻在这里起算，也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确定的是，从1937年秋天开始，这里曾经演绎了一段足以使其青史留名的抗战传奇。

今天，我们探究88年前发生在天津的一段清华秘史，源于对历史应有的尊重，源于对所有为抗战胜利作出牺牲与贡献的英雄和普通人相同的敬仰。在追寻、挖掘历史真相中，汲取文明与进步的能量，我们孜孜以求，乐此不疲。

2025年8月16日修订于上海

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

——王大珩科学人生的清华印记

○陈晓妹（2011级中文）



王大珩先生

今年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诞辰110周年。王大珩（1915—2011）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者，20世纪50年代，他带领团队熔炼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等“八大件”，结束了我国精密仪器依赖进口的历史。面对“两弹一星”工程中的技术封锁，他攻克高速摄影、靶场测量等关键技术，分建多家光机所，为大国重器装上“中国瞳孔”。作为战略科学家，他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牵头提出“863计划”，倡议建立中国工程院，力主自主研发大飞机等。他还创办多所高校光学专业，是中国光学教育的领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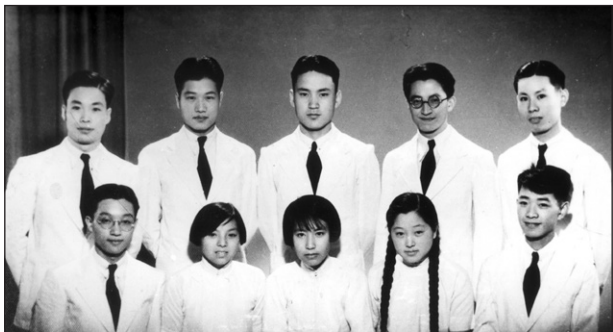
1932至1936年间，王大珩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的求学岁月不仅为王大珩的学术成长和科学研究筑牢根基，亦在其人生选择的关键节点留下深刻印记。

一、清华教育奠定学术根基

1932年，王大珩以全国第15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在王大珩看来，进入清华是他“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当时的清华学生入学后，各系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和面试情况再决定是否同意该生进入本专业学习。王大珩所报考的物理系，需经过系主任叶企孙亲自考察。叶企孙秉持“重质不重量”的理念，严格限制人数，王大珩凭借出色的表现顺利进入理学院物理系学习，学号为1878。

物理系实行精英教育，要求严格，考试频繁，淘汰率高。王大珩所在的年级，录取时有28名学生，坚持到毕业的仅10人。物理系的课程设置注重基础，叶企孙表示，“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等教育，各得门径，以求上进”，主张“本系自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为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

在课程教学上，物理系的教师注重基本概念讲授与启发思考。王大珩回忆叶企孙的课堂“采取慢说细讲的方法，他讲述的物理概念言简意赅，学生可以完整记录下来”“教学方法灵活独到，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每当讲到关键之处，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直到学生真正透彻理解了为止”。他还回忆吴有训上课“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引人入胜”。



1936年，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王大珩、黄葳、许孝慰、何泽慧、于光远，后排左起：钱三强、杨振邦、陈亚伦、杨龙生、谢毓章

此外，物理系的教师注重在教学中开拓学生眼界，叶企孙、吴有训等老师主动追踪科学前沿问题，同一课题的讲授，每年所举的例子都不相同，甚至不同班次的都不同，总要在自己的讲义中随时补充进最新的例子和最近的发展成果，“与国外高水平的教授讲学相类似”。

清华物理系课程设置的另一特点是注重实验，物理系学生“须修本系学程五十学分，其中实验学分必须有十二，理论学分必须有二十四。每实验一次，约占二小时至三小时；每星期一次，一学期完毕者，算一学分”，这意味着需要在实验课上投入大量的时间。清华着重培养的动手能力和实践精神，成为王大珩日后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基石。他回忆：

叶企孙先生经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他（吴有训）更关心学生们要培养出

从事物理实验工作的能力……着重训练我们在一般物理实验课程中所没有的内容。特别如吹玻璃等特殊技艺，这使得我们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确实显得得心应手。

王大珩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前三年的学习中，清华采用等级计分法，学生的成绩分为超、上、中、下、劣，分别用字母E、S、N、I、F代表，王大珩的专业课基本都达到了S以上。最后一年的多数课程采用百分制，专业课成绩基本都是90分，奠定了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扎实基础。

二、清华精神铸就家国情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利用美国庚子赔款的退款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这一背景使清华自诞生起便带有深刻的国耻印记，特殊的建校背景激励着清华师生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逐渐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传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华教育秉持“科学救国”的理念，积极引导学生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强调，“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叶企孙也疾呼“想要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

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这种理念深深扎根于清华的教育之中，激励学生为国家振兴而努力学习。

1935年，为反对“华北自治”，“一二·九”运动爆发。清华师生站在抗争前列，发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王大珩是游历活动的倡议人之一，此后他又参与了“一二·一六”运动，与“进步分子有所接触”，心中萌生爱国救国的种子。1936年毕业考察途中，王大珩与钱三强等同学在天津站被日本浪人驱逐下车，在自己的国家遭受外国人的欺凌，亡国耻辱与清华师长的言传身教相叠加，坚定了他强烈的科学报国信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原本在清华研究院攻读研究生的王大珩无奈南下逃难，亲身体会到亡国的威胁，途中他向同行的周培源先生提出要去兵工厂的想法，他认为“现在正值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能做到的可能也只有用我所学的那些东

西在兵工方面尽点力了。”周培源当即答应介绍王大珩到南京弹道研究所，并鼓励王大珩“应当把改变我国落后面貌作为我们的责任”“要把眼光放开，不能把自己圈在纯粹物理的小范围”。在南京弹道所的工作经历，也让王大珩“看到物理学为国防服务的广阔天地”，促使他“把光学应用于国防事业”。

1938年，王大珩考取第六届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学习应用光学，并于1940年顺利获得理学硕士学位。认识到二战中光学玻璃的战略地位，王大珩于1941年进入谢菲尔德大学攻读玻璃制造技术博士学位。1942年，以制造光学玻璃闻名的英国大型公司昌司玻璃公司急需一位从事新型光学玻璃开发研究的实验物理师，王大珩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态进入昌司公司开展研发工作，为他日后回国发展光学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王大珩曾回忆：

毋庸置疑，如果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我当然应该选择博士学位，因为学位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太重要了。学位几乎能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就应该选择光学玻璃了。……当时在中国，光学玻璃这个领域不是落后，而是空白！中国根本就没有光学玻璃！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我所珍爱的光学玻璃。……但是，我至今从未对自己当年所做出的这一选择后悔过。

这种“急国家所急”的选择逻辑，正是清华教育中“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与“科学救国”思想



1946年夏，王大珩（右1）与周培源（右2）、钱三强（左1）、何泽慧（左2）参加剑桥物理集会合影

□ 怀念师友

的延续。

1948年，王大珩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的光学事业建设。先后组建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发展成为长春光机所），带领团队研制“八大件、一个汤”等重要光学仪器，为“两弹一星”工程研制了高速摄影机、150-1经纬仪、卫星相机等众多关键光学设备，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救国”的理念。

三、清华师友助力事业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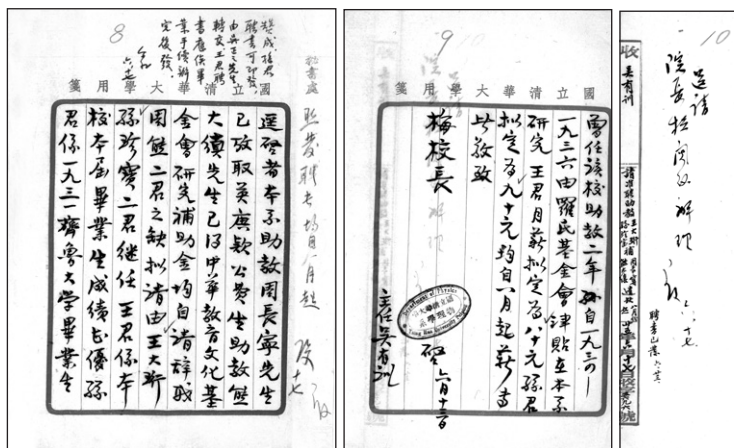
在王大珩的人生历程中，清华师长的指引与同窗校友的协作不可或缺。20世纪20年代起，清华物理系致力于为中国科技事业培养顶尖人才，有意识地构建起中国科技人才储备。一方面，叶企孙等注重发展清华物理系的师资队伍，聘请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一批学术造诣颇高的教师。另一方面，以战略眼光选才育才，结合国家的发展需求，精心选拔安排钱学森、龚祖同、赵九章、王大珩等人出国就读中国急需的专业，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选拔与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王大

珩同他们一起，在不同领域互补支持，共同助力国家发展。

在王大珩留学方向的指引上，叶企孙和吴有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英国政府正式提出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考选赴英留学生，叶企孙积极参与庚款留学计划的制定和选拔工作，考虑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薄弱基础与光学技术在军事、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叶企孙提出设置应用光学专业，为王大珩专注于应用光学研究、在该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基础。1936年6月，王大珩从清华毕业，因“成绩甚优”，被物理系聘为助教。1937年春，王大珩获史量才奖学金，师从赵忠尧开展核物理研究，后因“七七”事变中断。1938年，吴有训途经汉口出差，与被派往汉口工作的王大珩谈话，向王大珩告知当年有庚款留英考试，王大珩得以顺利赴考并中榜。王大珩在香港集中准备出国时，吴有训正好也在香港，亲自到码头为他送行，并鼓励他好好学习，待抗战胜利，更好地为祖国效劳。

在王大珩的事业发展上，吴有训更

是影响深远。1948年，王大珩放弃英国优渥的生活条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抵达上海时，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共产党正在积极筹备成立新中国，准备在已经解放的大连创办大连大学。吴有训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询问王大珩是否愿意前往，王大珩欣然应



吴有训致梅贻琦请准聘王大珩等为助教的函（1936年6月）

允，“以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参加革命而引以为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计划成立仪器馆，吴有训举荐王大珩主管筹备工作，并在筹备中给予王大珩热情的关怀和鼓励。吴有训的举荐和支持，为王大珩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使他能够在仪器制造领域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龚祖同是王大珩在光学事业上的重要合作伙伴，两人的求学轨迹和人生选择相似。1932年，王大珩考入清华物理系时，龚祖同已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正跟随赵忠尧开展核物理研究。1933年起，清华面向全国招考留美公费生，叶企孙从我国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和面临日寇侵略的急需，在科目设置中专门留出应用光学专业，并动员龚祖同报考。因为德国在应用光学领域的领先地位，龚祖同在考取美国Rochester大学后，转而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军用光学仪器紧缺。1938年，龚祖同放弃基本做完的博士论文回到祖国，为光学事业发展四处奔波。1948年，王大珩刚回国时，龚祖同曾邀请他去秦皇岛共同研制光学玻璃，却因客观情况不允许而未能实现。1951年起，王大珩与龚祖同共同参与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的建设，二人携手合作，在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们继续密切合作，为我国光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对王大珩影响最深远的，是“相识七旬称莫逆”的钱三强。王大珩与钱三强是小学同班同学，后来在清华物理系再次成为同窗好友。在王大珩的印象里，钱三强



王大珩先生 90 岁生日与夫人顾又芬女士在一起

“读书多，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学东西灵活”“眼睛总是盯着前面新的东西，热衷于了解新学科的发展方向”“看问题具有创见性”。在钱三强的影响下，王大珩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为日后在科学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思维方式上的影响，钱三强还对王大珩人生中的几个关键转折时刻都起过重要作用，王大珩说：“在国外时，是三强满腔热情地向我宣传新民主主义，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鼓励我尽早回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是三强推荐我负责筹备光机所，开拓祖国光学事业。”在“两弹一星”工程中，他们分别在各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6年，王大珩与清华校友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推动国家制定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推动我国在生物、航天、激光等七大领域筑起科技长城。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深入分析国内外科技发展形势，共同探讨中国高技术发展的战略

□ 怀念师友

方向，彰显了科学家高瞻远瞩、团结协作的精神。

在王大珩科学报国的人生轨迹中，清华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清华严格的选拔机制、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课程体系，奠定了王大珩扎实的学术基础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清华“科学救国”的精神内核，驱动他始终以“急国家所急”的选择践行

清华人的家国担当。叶企孙、吴有训等师长的引导与钱三强、龚祖同等同窗的协作，构筑王大珩科学事业发展的协作网络。从长春光机所的筹建到“863计划”的提出，处处可见清华师友共同体的力量。这种教育基因、精神谱系与人际网络的交织，塑造了一位科学家的成长范式，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家科技发展同频共振的历史见证。

师恩长忆，教泽永存

——深切缅怀林泰教授



林泰教授

林泰，1932年1月出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和思想政治教育专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致力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社会思潮研究，为推进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林泰于195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学期间曾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政治辅导员，并当

选北京市人民代表。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校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1983年参与筹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先后担任副系主任、系主任，以及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参与筹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任常务副院长；参与清华大学首个文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申报和建设，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1994年任思想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1995年参与复建清华大学法律系；1998年参与筹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

他坚守教书育人一线数十载，一生奉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他不知疲倦，著作等身，耄耋之年仍每天坚持阅读两小时“补充知识”。他真挚纯粹，信仰坚定，以九十三载生命，诠释了何为“真理为志业”。他就是著名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思想政治教育专家、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泰。2025年7月23日凌晨，林泰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他是往返于讲台与青年之间的 “思想引路人”

20世纪50年代，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林泰选择留校工作，从此走上思想政治教育之路。从校团委、党委宣传部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始终站在清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第一线。

林泰讲课，从不空谈概念。他讲历史，也讲现实；讲中国，也讲世界；更讲“作为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后，林泰最早关注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的影响，率先在清华开设了“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课程。在他的课堂上，“社会思潮”不仅是学术概念，也是影响青年价值观的真实存在；“唯物史观”不仅是政治理论，也是理解历史演进的钥匙。

关于理论课教学的方法，林泰说：“要弄清当前存在的错误思潮，比如新自

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潮的实质和表现；还要弄清这些思潮导致大学生思想上产生了什么疑惑。”

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届博士校友高永回忆道：“我读书时曾多次听林老师讲课和谈话，林老师坚定的政治立场、强烈的爱国情怀、深厚的社会主义信念，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社会思潮的敏锐鉴别力，至今怀念，深为敬佩，并一直影响着我从教从学。”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林泰作为教师代表第一个汇报发言。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林泰说：“我们要培养能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需要在青年中间培养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完成这个事情，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这方面起着最主要的作用。”

他是书桌前不知疲倦的 垦荒者

林泰先后出版了《当代社会思潮论评》《大学德育新探》《唯物史观通论》《社会思潮理论前沿求索》等重要著作，撰写的《新时期思想工作的几点理论思考》《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几点思考》《科学地历史地评析社会主义》等论文或专著，获得多个国家级及省部级奖



林泰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

□ 怀念师友

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13年，林泰主编的《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书出版，全面深入地论述了社会思潮形成、发展、演化的规律，以及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青年教育。有评价说：“能有这样一批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潮，写出这样有分量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希望带领年轻理论工作者再接再厉。”

即使已经著作等身，林泰却从未停下“问道”的脚步。耄耋之年的他，每天除了阅读理论刊物之外，还订阅了多份报纸，每天大约花两个小时阅读。他说：“补充扩充我的知识，跟上时代步伐，这也是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需要。”

他是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林泰毕生的志业和成就源自于他坚定的信仰，而他的信仰始于家国忧患。

1937年，时年五岁半的林泰目睹日寇铁蹄进入北平城，懵懂的他问上小学的哥哥：“中国真的会亡国吗？”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林泰心中的迷惘和惆怅逐渐消散，他找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1950年4月，年满18周岁的林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矢志不渝地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毕业留校工作后，他坚守三尺讲台，将课堂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90年起，他开始为清华大学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和新生党员讲党课，22年如一日，累计听课超过5万人次。

1992年，林泰受命参与策划清华大学为香港高级公务员开设的国情课程。他顶

着压力、躬身教学，深入讲授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制度与国家情况，为香港公务员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打下重要思想基础，为香港回归及稳定过渡贡献了独特力量。授课的25年里，他主讲了108期课程，推动国情教育深入人心。2016年，林泰获得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颁发的“望重杏坛”奖杯，这是一项珍贵的荣誉。

林泰常说：“我很羡慕现代青年，因为他们可以亲身去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2019年中组部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离退休干部先进事迹专题报告会上，林泰在报告中自明心志：“能为青年学生做些有益的工作，让我感受到老年生活的价值，也更让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祖国未来的意义。这已成为我的终身追求。”朴实真切的内容令在场观众动容。

“林泰老师是一位坚持到底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育人到老的优秀思政课教员”，在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届博士校友徐铭拥心中，林泰老师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大先生”，“他的锐利思想和乐观精神，闪烁在我做辅导员时读过的《问道》书里，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学院院庆舞台上爽朗的歌声中，也珍藏在我工作后专访他清华思想政治课建设历程的笔记上，一直激励我、鼓舞我。”

泰山其颓，清风犹在。当青年学子在课堂上讨论真理、在实践中践行信仰时，便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因为他播撒的火种，正在新时代清华人的心中，生生不息地燃烧。

（马克思主义学院供稿）

几载同窗，半生筑梦

——清华人与二汽的生命史诗

○王红珊



王杰学长（左）夫妇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东风公司原副总产品设计师、东风公司技术中心原车型部副部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王杰，因病于2024年5月18日在湖北十堰市逝世，享年82岁。

王杰，1942年8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武清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系。王杰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者，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全部智慧奉献给了自己钟爱的汽车事业。曾获得第二汽车制造厂车架厂“先进工作者”、第二汽车制造厂技术中心“先进工作者”、东风公司“先进工作者标兵”、十堰市劳动模范、湖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东风杰出人才奖”“车城建设功臣”等多项荣誉称号。

四月的清华园，春风又拂过百年古木。站在114周年校庆的时光坐标上回望，14年前老父亲王杰奔赴清华百年校庆

的身影依然鲜活如昨。

那时他步履矫健，眼中盛满光芒，还未开口，笑意先爬上眉梢。那些关于校庆的鲜活见闻，在他口中徐徐展开，如同一幅绚丽的画卷。

如今，父亲已离开近一年了，我无数次幻想：若时光能够倒流，我要推着轮椅上清隽消瘦的他重走熟悉的校园小径，让他与阔别多年的同窗再次相聚，重温往昔的美好岁月。

八年同窗

老父亲曾带我拜访他在北京的同学——和善儒雅的李汉忠伯伯。李伯伯在清华从事臭氧研究工作。在他家中，我品尝过热气腾腾的饺子；在校园餐厅，他热情地款待过我。李伯伯曾感慨地对我说：

“我和你父亲可不是一般的同学，我们是八年同窗啊！”简短话语中饱含浓厚情谊。

1960年，老父亲考入清华。按照当时的六年学制，本应在1966年毕业，但那场特殊的历史浪潮让他们的学业被迫中断。直到1967年末，他们才完成毕业分配，1968年初才踏上离校的征程。让他们的同窗时光整整延长到八年。

2011年，老父亲为参加清华百年校庆来到北京。我下班后赶到宾馆与他会合。那时，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一起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招待所里。老父亲住的房间

□ 怀念师友

很朴素，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两张单人床，一张木质写字台，上面摆放着一台电视，几张木椅随意散放，仿佛又回到了大学宿舍的时光。

我正和父亲聊天，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宁静。一位头发灰白的伯伯推门而入，他的目光专注地盯着手中的一叠纸，声音既认真又带着几分兴奋：“王杰，咱们明天的安排是……”说到一半，他抬头看见了我，微微一愣，但很快又接着向父亲详细交代这几日的行程。那模样，就像学生时代组织活动时，班长一间间宿舍通知大家的场景。岁月只是染白了他的头发，但从未改变他心中那份炽热的情怀。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尽管时光飞逝，但这些学子们用母校传授的知识，在各自的岗位上已经奋斗了近半生，如今带着耀眼的成绩归来，此刻重逢，回忆起曾经立下的誓言和相互倾诉的理想，该是多么感慨万千。

支援三线

与如今毕业分配时更多考虑生涯发展、工资待遇等因素不同，老父亲那一代人，用一生践行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

他在当时的“汽车与拖拉机”专业（如今的车辆与运载学院），年级共五个班，155人，他属于汽64班。毕业后，同学们大多被分配到了三线或边远地区的工厂基层单位。父亲和他的30位同学，来到了湖北省十堰市第二汽车厂。

那时的十堰不过是深山中的一座偏远小镇。1964年，国家在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建的大三线建设。十堰因承载着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任务迎来发展契机。

1966年，在武当山下，二汽筹建会召开；1967年4月1日，第二汽车制造厂在十堰炉子沟举行了开工典礼。将近八万人的



清华大学汽车系 1966 届毕业 50 周年返校留影

建设大军，从祖国各地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院校，义无反顾地奔赴这片荒凉落后的鄂西大山，拉开了十堰建设的壮丽序幕。

1968年初，老父亲和同学们来到二汽报到。当时，基地尚在规划，他们只能先到二汽驻京办事处。接着又前往长春一汽、上海、武汉等地实习。

父亲去了长春一汽。据他和同学钮炬叔叔回忆，实习主要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周6天泡在车间干活。但这种高强度的现场劳动也让他们熟练掌握了各种操作技能和生产工艺，并与基层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虽然他们来自城市，但大多家庭困苦，早已习惯了生活的艰辛，这些高强度的劳动并没有让他们退缩。

初抵十堰

1970年，老父亲和几名同学终于辗转来到十堰，开始参与二汽的工厂设计和工艺设计工作，这一路充满坎坷。从长春乘车到北京，再到武昌，接着从武汉坐车到丹江口，下了火车后又换乘卡车，在尘土飞扬的盘山土路上颠簸三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尽管出发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艰苦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那时的十堰，被称为“九山、半水、半分田”，意思是说，要垒起整整十道堰才能开出地。全市仅有一个杂货铺、一个铁匠铺、一个剃头铺，街道全是土路，汽车驶过，尘土飞扬；雨天一到，泥泞难行。当地老乡靠种植红薯、苞谷为生，住着用干打垒土墙围成的黑暗草屋，墙上开个小洞用于通风，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大山，更别说见过汽车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

汽车厂，恍如天方夜谭。而他们各自被分配去的二汽的各专业厂：总装厂、发动机厂、车桥厂、车架厂……很多还停留在图纸阶段。

几处活动板房和芦席棚就是员工宿舍和基地。大多数厂房不通公路，汽车走着走着就开入了河道的涉水路面，扁担和手推车是最常用的运输工具，跋山涉水是每天日常。

但父亲和其他建设者们就在这一无所有的土地上开启了建造现代化汽车厂的伟大征程。他们带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从城市带来的先进观念和在学校、实践中学到的先进技术，为这座藏在大山中的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奋斗青春

1972年，砖瓦楼房陆续盖起来。但按工龄排队的分房政策轮不到父亲他们，他们仍旧挤在芦席棚或地下室。1975年，我即将出生了，父亲才在毕业近10年后实习期满转正，但工资依旧很低，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工作条件一样一言难尽。干打垒的厂房围墙，用进口设备包装箱搭建的办公室，下雨天漏雨，刮风天透风；夏天热得一身汗，冬天手脚长满冻疮。技术档案资料几乎没有，一切技术文件和图纸都靠双手绘制。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伟大而淳朴的信念：一定要把我国第二个产量更大、设备更新的汽车工业基地建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和三线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71年2月，国家首次向二汽下达全年生产1200~2000辆车的计划。3月，襄渝

□ 怀念师友

铁路开通，运输条件大大改善；

7月，开始小批量试产两吨半越野车；

8月，出车45辆。

1974年末，两吨半车形成小批量生产能力。

1975年7月，第一个基本车型EQ240两吨半越野车生产线胜利建成。

1978年7月，东风五吨载重车生产阵地建成，具备年产10万辆汽车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

二汽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离不开来自全国各地支援建设的技术工人，更离不开这群兢兢业业的技术骨干。

涅槃重生

80年代初，由于国家经济调整，二汽的建设尚未完成，建设资金出现巨大缺口，一度被列入“停缓建”单位。

关键时刻，二汽领导提出了“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的改革方案，才让汽车产量逐年提高。企业综合实力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工业企业500强前列，还进行了第二次创业，开辟襄樊第二基地，建成技术中心、汽车学院、教育中心，为二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时，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已经成为二

汽各基层部门的领导或技术系统的中坚力量，在工艺、产品、工装等领域的基层一线发光发热。随着时间推移，新老干部迭代，他们逐步走上领导岗位。2人走上总厂领导层，13人在总厂各职能处室任领导，8人被调到二汽技术中心或分厂产品科成为技术领军人物，5人在专业厂任领导。

也是从那时起，二汽与清华建立了紧密联系。汽车系的教授来到二汽，在工厂授课介绍汽车技术的最新发展。随着十堰和北京开通直达列车，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来到二汽实习，并在毕业后选择留在这里，为二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90年代初，二汽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并开始向外开拓业务，先后在武汉、上海等地通过合资形式引进国外技术，合作生产轿车和汽车重要零部件。

此时，父亲的同学中，有7人因项目扩展调离十堰，2人因个人工作调动离开，1人因病不幸离世。其余21人依然扎根十堰，为东风汽车公司的发展默默奉献。他们中有20人被提升为副处级以上干部，12人晋升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东风公司的多项技术成果和发展成就中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与才华。

山河记忆

新旧世纪之交，老父亲和同学们先后退休。那时他们身体还算健康，还能时常相聚，一起回忆在十堰奋斗大半辈子的点点滴滴。

无数次，父亲带我走在十堰的街道上，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望着万家灯火的璀璨，他总是激动地夸赞这座城市的飞跃发展。



王杰学长（右2）和同事们在车间工作

我知道，在他心中，一定又浮现出当年初到这里时，那交织着激情与失望的复杂心情，想起了在一片空白中燃起斗志、开始勾勒的建设蓝图。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承载着他们的记忆，凝聚着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雕琢。

如今的十堰，新的公路如一条条巨龙蜿蜒伸展，四通八达的道路被冠以“北京路”“上海路”“重庆路”等名称。这绝不是简单的跟风和时尚，而是为了永远纪念这座城市的诞生，纪念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他们用汗水浇灌这片土地，让它从荒芜走向繁荣。

妈妈曾无数次说要和父亲一条一条走走这些新路，好好认识和熟悉这座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城市中的新动脉。

尚未成行，那些熟悉的身影却一个个离去。

王益林叔叔走了；

赵均叔叔走了；

战权理叔叔离开了；

钮炬叔叔也走了；

2024年，我的父亲也永远离开了我。

也许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叔叔伯伯也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们是将终生奉献给三线建设的前辈，他们在清华接受了特殊的“八年教育”。他们始终秉持着“自强不息、厚德



1996年，王杰（前排右3）返校参加毕业30周年活动与同学合影

载物”的精神，将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贯穿于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14周年校庆已过，水木清华的月色依旧温柔。我常常想，天上的叔叔伯伯们此刻是否正结伴遨游，是否也看到了如今校庆的盛况？他们是否还会回忆起曾经“指点江山”的青春岁月，是否依然在关注鄂西北版图上这颗正冉冉升起的城市之星？

向父亲和他的同学们致敬！

向所有兢兢业业致力于中国基础工业建设的前辈们致敬！

向为了十堰市的发展呕心沥血、奋斗终身的一代技术工作者致敬！

他们的精神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他们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向前。

附录：清华大学汽车系 1966 届分配入二汽的 31 名同学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序）

班 骁	程鸿余	黄敬达	贺季怀	黄文标	高凤莲	郭浦琼	贾恒达	金品高	李斗南
李道荣	李国伟	李文昌	孟繁德	马恒南	钮 炬	任秀英	沈邦俊	沈 晖	沈宁吾
宋延光	王 杰	王伟民	王益林	王植槐	王宗玉	夏 玲	赵国平	赵 均	战权理
张 毅									

追忆恩师崔福斋教授

○杜昶（1989级材料） 王秀梅（1996级材料） 孔祥东（2001级博，材料）



崔福斋教授

崔福斋，1945年11月4日生于江苏连云港，2025年6月13日于北京病逝，享年80岁。崔福斋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70年毕业。1978—1984年在清华大学核材料专业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间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担任讲师。1989—1991年担任材料科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1991年后在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现材料学院）担任教授。

崔福斋教授是中国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国际生物材料学界的杰出科学家。长期从事生物材料的基础研究、产品开发和临床转化，主要科研成就集中在生物材料自组装机理、矿化胶原基组织工程骨修复材料的研制以及生物材料表面改性等方面。阐明的骨生物矿化机理获国际公认；发明的专利技术开发出新一代骨植入医疗器械获数百万例成功应用。

先后承担了国家863、973项目、“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曾

担任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骨修复材料与器械分会发起人及第一届主任委员。创立学会英文会刊*Regenerative Biomaterials*并担任第一届执行主编。国际期刊*Biomedical Materials*的创刊人及首任主编、*Frontiers of Materials Science in China*（现更名为*Frontiers of Materials Science*）创刊副主编。在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首席科学家。2007年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选为会士，2008年被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选为会士。2003年获国际材料研究联合会SOMIYA奖，2008年和2011年分别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2019年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曾荣获清华大学首批“良师益友”称号。

杜昶：崔老师是中国生物材料领域的开拓者

1994年，我有幸拜于崔教授门下学习，成为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生物材料方向的首批直博生，并由此奠定了我学术和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基础。崔教授是我国生物材料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他原本的专业背景是核材料，在跟随李恒德院士进行金属材料表面改性研究的过程中，了解到医用金属材料及其表面处理方面的瓶颈，从而产生了向生物医用材料领域发展的想法。

崔老师拥有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硕

士学位和材料专业博士学位，并在荷兰FOM分子原子物理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这种跨学科的背景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推动生物材料学科的发展。

课题组最初只在工程物理系馆里面占据一个二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那里既是崔老师和冯庆玲老师的办公室，也是我们四五个学生的实验室。在崔老师的带领下，小小的实验室里迸发出无穷的创新思维火花，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天然象牙的矿化、骨折后早期骨痂的超微结构、胚胎骨的有机基质演变、自组装界面化学、仿生人工骨与骨组织工程……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崔老师对选题的前沿性和前瞻性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很多当年的工作都已经写入教科书，影响深远。

他因卓越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2007年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选为会士，2008年被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选为会士。

作为崔老师的学生，他不仅教会我们专业知识，更以身作则展示了如何将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造福社会：迈象牙塔，创办产业化公司直至上市。如今，恩师已逝，但他开创的事业仍在延续，他培养的学生在各自岗位上继续着他的科学理想。崔福斋教授的名字将永远与中国生物材料领域的发展紧密相连，他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前行。

王秀梅：崔老师教诲我们要做“有价值”的科研

2025年6月13日，恩师崔福斋教授与世长辞。崔老师为中国生物材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深耕于学术与产业前沿的学者、企业家和创业

者。他一生教导、帮助、支持并引领了无数人，也因此赢得了众多同行与学生的尊重与爱戴，永远是吾辈学习的楷模。

依然清晰记得1999年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忐忑地敲开崔老师办公室的门，怯生生地表达了想跟随他读研的愿望。崔老师非常和蔼，仔细询问了我的未来规划，并鼓励我直接攻读博士学位。那时的我，尚且懵懂，缺乏长远计划。就这样，2000年9月我正式成为了崔老师的直博生，踏入了生物材料这一领域，并与之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崔老师是我学术上的启蒙者，带我走进这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他更是我人生的灯塔，指引我寻得方向、找到所爱，让我在积累中成长，在步履间坚定。他教诲我：要做“有价值”的科研，要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他说：“一篇优秀的论文，或许只需三五同行认可；但开发一款医疗产品，却需得到成千上万患者身体的认可——那才是真正解决了问题。”因此，做科研务必脚踏实地，尤其我们从事生物医用材料研究，更应从临床中发现问题，并最终回归临床去解决问题。

25年光阴流转，恩师谆谆教诲，犹在耳边；言传身教，深铭于心。

孔祥东：崔老师对年轻人总是充满了关爱

2001年9月，我以普博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并有幸进入崔老师课题组学习。

学习期间，我知道了我们国家高端医疗器械当时严重依赖进口，生物材料研究水平与国际前沿存在巨大差距。那时崔老师课题组在生物矿化研究、骨痂形成机理、结构仿生骨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发表了多篇有较大影响力的

□ 怀念师友

国际论文。崔老师与众多国内外同行有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创新、合作、转化”是崔老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重要思路，他总是强调博士生一定要了解国际前沿，以创新思维做出创新工作；生物材料研究一定要与国际同行、临床医生、生物材料企业密切合作；要基于与医生、企业的合作，努力推动生物材料的临床转化以造福百姓。

我在实验室学习的时候，有幸聆听了Myron Spector、In-Seop Lee、James Kirkpatrick、Fumio Watari等多位国际知名专家的学术报告，也有幸见到了多位知名医院的临床医生。崔老师积极支持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的成立，并和一批优秀的中

国生物材料专家一道，默默耕耘，砥砺前行，共同开创了中国生物材料事业的崭新格局；在奋斗的征程中，他对年轻人总是充满了关爱，毫不吝于对年轻学者的指导与托举。他参与创刊的*Biomedical Materials*、*Frontiers of Materials Science*、*Regenerative Biomaterials*已成为国际生物材料领域的重要期刊；他积极推动了仿生骨修复材料的临床转化，造福上百万骨科疾病患者。

如今，从我入学算24年已过去，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医疗器械产品，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那个会故意读“熊出没（méi）注意”的可爱老人，我敬爱的崔老师，也离开了我们。崔老师的精神永存！

铸盾人生

——追记核防护科学家骆亿生的忠诚与奉献

2025年6月23日凌晨，一颗为祖国军事医学科学事业跳动七十六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骆亿生同志——这位将毕生奉献给中国核防护事业的科学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重情重义的清华学子，走完了他光辉而充实的人生旅程。当我们梳理这位杰出人物的一生，发现其中交织着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的完美契合，体现着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深度交融。

军旅铸魂： 从卫生员到科研尖兵的蜕变

1949年2月，骆亿生出生于江西奉新县这片红色热土。1969年1月，他响应祖



骆亿生
研究员

国号召参军入伍，在广州军区第47军140师担任卫生员。同年7月，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党的事业紧密相连。1970年2月，因表现优异被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

学研究所，开启了他与军事医学科研的不解之缘。

在部队大熔炉的锤炼中，骆亿生完成了从普通士兵到专业技术军官的转变。1972年4月，他被推荐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成为物24班的优秀学子。近四载寒窗苦读中，他不仅掌握了扎实的核科学技术知识，更将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内化为人生信条。在校期间，他担任物24班党支部青年委员和团支部书记，学习之余的时间里，专注团支部工作，工作有声有色，且特别注重团员、青年的学业与政治思想双素质的提高，在他的培养下，我们班有四名同学加入了党组织。1975年12月毕业后，他隐姓埋名义无反顾回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从实习研究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终于2006年12月晋升为专业研究员技术四级干部。

科研报国： 十三次直面核爆的忠诚卫士

核爆的炽光撕裂苍穹时，大多数人本能地逃离，而有人却逆向而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骆亿生，曾十三次踏入这片死亡炼狱。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之间，焦烟裹挟死亡气息弥漫，灼热与寒流交替撕扯着血肉之躯。他伏身测量仪器前，防护面罩后的目光如铁，纹丝不动地校准着光辐射、冲击波与早期核辐射的微弱讯号。每一次数字的精准捕获，都在核爆当量的狂暴与生物体的脆弱之间，搭建起关乎民族存续的科学桥梁。

三十余载科研岁月，骆亿生始终秉持“为部队建设服务”的信念。那些在核试验现场的日夜，高温与严寒轮番侵袭，看不见的辐射如无形獠牙啃噬着他的细胞。

他比谁都清楚危险，却比谁都坚守阵地。当冲击波撼动大地，他记录的不仅是冰冷数据，更是用生命为千万将士丈量的安全距离。十六项重大科研课题的背后，是无数个与死神擦肩的瞬间，是实验室长明的灯火，是一个科学家对祖国最沉默的告白。

转战清华200号反应堆后，他的战场转入更为深沉的寂静。

在中子与 γ 射线织成的死亡之网中，他带领团队构建起全新的生物照射体系。自主研发双电离室技术的日夜里，每一次调试都如履薄冰，每一次触碰仪器都意味着辐射剂量的增加。当这项技术最终落地生根，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如磐石般奠定了我国精准剂量学的根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42篇学术论文——这些荣誉背后，是一个学者在无声高辐射中屏息校准的身影，是一双被射线灼伤却依然稳定的手。

每当走出反应堆，卸下沉重的铅衣，他面色苍白却眼神清亮。那疲惫面容上的平静，是明知危险仍选择前行的从容。在“九五”至“十一五”的科研长征中，他带领团队突破的不只是技术瓶颈，更是人类在核威胁面前的生存可能。1996年的三等功勋章，1998年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些国家认可的印记，镌刻着一位科学家用生命过滤死神吐息的日日夜夜。

如今，当我们安享和平时，不会想起辐射剂量如何测算，不会思考核防护的边界在哪儿。但请记住，在祖国西北的戈壁深处，在实验室的重铅门后，曾有人以血肉之躯为我们筑起无形长城。骆亿生走过的路，每一步都刻在民族核防护的基石上——那是生命以最纯粹的方式，将未知凶险化作守护的刻度；是科学报国最壮美

□ 怀念师友

的诠释，在寂静与轰鸣交织的禁区深处，为亿万人撑起抵御核威胁的巍巍屏障。

这位十三次直面核爆的忠诚卫士，从未手持钢枪镇守边关，却用毕生心血在科学前沿筑起另一道国防线。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主义，有时就藏在那件厚重的防护服下，在那双紧盯数据不肯松懈的眼睛里，在一个平凡科学家“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无声誓言中。

同窗情深： 物24班的精神纽带

在严谨的科学家身份之外，骆亿生同志更是一位深情的同窗纽带。当岁月冲散了青春足迹，是他以赤子之心寻回失联学子；从毕业30周年到50周年，他始终是班级活动的灵魂支柱。2025年4月，在清华校庆与物24班毕业50周年双庆之际，已身患重病的他仍坚持操持庆典，强撑病体与同窗相聚。为争取更多相处时间，他放弃回家住宿，选择与同学们同住宾馆。谁曾想，这次相聚竟成永诀——不到两个月后，这位将最后光热献给同窗情谊的清华

学子与世长辞。

2006年光荣退休后，骆亿生同志依然心系党的事业。在担任其所住楼第二党支部书记期间，他积极献计献策，为基层党组织建设贡献力量。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和乐观精神，用坚强意志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骆亿生同志的一生，是忠诚与智慧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用科学家的严谨丈量核辐射的致命威力，又用人文关怀的温度守护战友生命；他以军人铁血直面科研艰险，又以同窗柔情串联起半个世纪的清华情谊。正如物24班同学在悼词中所言：“您是无惧辐射的科研尖兵，更是重情守义的永恒兄长。”

正如北京丰台区第32军干休所党总支书记在向骆亿生遗体告别会上说的那样，“今天，当我们缅怀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忠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当铭记他为我国军事医学科学作出的卓越贡献，更应学习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的崇高品格。在建设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我们需要更多像骆亿生同志这样既具深厚专业造诣、又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复合型人才”。

骆亿生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忠诚报国的精神、严谨治学的态度、珍视情谊的品格，将如同他参与构筑的核防护屏障一样，长久守护着我们前进的道路。这位将毕生奉献给祖国核盾牌事业的科学家，用忠诚与智慧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生命丰碑。

工程物理系物24班全体同学
2025年6月25日



114周年校庆，骆亿生（前排左5）与部分同学在一起

法三同学沉痛悼念恩师李兆杰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李兆杰教授，因病于2025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李兆杰，1955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3年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获学士学位。1985年与198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与图书馆信息学硕士学位，1995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8月至1989年6月、1996年1月至2000年6月，在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6月至2021年4月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先后任副教授，教授。

惊悉噩耗，我们大学时代的班主任——李兆杰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李老师的一生，堪称传奇。青年时投笔从戎，在军营中以精湛的技术立功报国；退役后，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国际法泰斗王铁崖先生；后又负笈海外，孜孜以求，先后获得法学与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李老师先在北大执教，随侍恩师王铁崖先生左右，后受聘清华法学院，桃李满园。

2003年我们入学，得蒙李老师担任班主任，何其有幸。在开学典礼上，李老师的开场白就是：“你们今天能在清华念书，it is a privilege!”对初入校门的我们来说，这既是当头棒喝，更是殷殷期许。

大学时光里，凡有活动邀请李老师——无论是严谨的学术讲座，还是温馨的期末聚餐——他总欣然应允，从不推辞。于李老师而言，我们这些孩子的事，从来都是大事。他常勉励我们志存高远、



2024年11月，同学们看望李兆杰老师。
左起：王宁（法3）、王珂（李老师博士生）、李兆杰老师、邱静（法3）、张昱（法3）

追求精深学问：低年级时即可大胆选修高年级乃至研究生的课程，自学英国国际法学者布朗利（Ian Brownlie）的国际法经典教材，多修读外教与何美欢老师的普通法课程，并积极投身国际模拟法庭的竞技场。

在李老师的激励下，稚嫩却锐气的我们，大一时便组队参加全院“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承蒙师长的呵护和勉励，初生牛犊最终获得“战斗精神”（Fighting Spirit）奖。回望李老师一生，“战斗精神”四字，亦何尝不是对他最生动的注脚！军旅生涯，他勇于挑战，荣立功勋；任职外交部国际法顾问，他秉持专业高度，直言敢谏，献出谏言。无论是从戎、治学、研究，还是作为政府高参，李老师“师夷长技以制夷”，在热忱报效深爱祖国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风骨与专业底色。

课业之外，李老师对我们的关怀如父亦如友。在明理楼四楼的那间办公室内，李老师常与学生海阔天空地畅叙；追忆青年时代的军旅传奇，述说海外游学的羁旅

□ 怀念师友

往事，追念恩师王铁崖先生在老清华的求学情景与对他的谆谆教诲。李老师待学生之心滚烫如父：他下定决心要请全年级每个同学至少吃一次饭。校园里偶遇，一句“小子，跟我吃饭去”，便领着学生下馆子；他会细细问及年级每位同学的近况，尤其关切学生在学业与生活上的挑战，总思忖着如何默默托举；他常念叨“不要早恋”，劝我们专心向学；大四时有同学沉迷游戏，李老师忧心如焚，寒夜中骑自行车四处寻觅，愤然道：“真想拎着自行车把那破网吧砸了！”那一刻他眼中满溢的忧虑与心疼——分明不是师长，而是一位焦急寻回迷途孩子的父亲！

2007年法三年级毕业后，李老师的关爱依然绵长。疫情期间，他多次发微信关心远方早已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近况。校庆时，他会驾车载着返校的学生叙旧，畅谈学院变迁与他对国际法案件的真知灼见。数年前，李老师赴港参加论坛，在港工作的同学举家在中环设宴。彼时他已退休，兴致盎然地分享与师母云游四海、寄情山水与摄影的惬意晚年。

然而天不假年。2024年初冬，学生们惊悉李老师身体抱恙，或致电问候，或亲往探望。彼时李老师自初次脑出血后康复尚可，日常言语虽无碍，却已难再深入思考艰深的国际法问题。他无限伤感地慨叹：“那个往日的李兆杰已经不在。”学生们谈及特朗普当政后国际法式微，建议他尝试视频创作，修身养性以释怀。李老师闻言，只是笑笑，继而向学生们一一展示毕生所爱：他打开珍藏交响乐唱片的柜门，介绍亲手搭建的发烧级HIFI音响系统；他展示琳琅满柜的相机、镜头和与师母环球旅行的风景摄影；他播放起哼得

出旋律却记不起名字的《命运》交响曲；他吟诵长诗《三门峡》，却一次次记不起诗句，甚至模糊了字词的发音。在场学生无不心酸，然李老师声音依旧洪亮，气质依然昂然，又让我们生出无尽的宽慰与希望。

孰料时序进入2025年，病情竟急转直下。一次次脑出血的连续重创，越来越短促的恢复窗口，让李老师从时而尚可、时而意识模糊的状态，渐渐陷入了长久的昏迷。探望的学生们守候病榻旁，眼见李老师日渐消瘦，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

呜呼！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李兆杰老师是赤诚的学者，磊落的君子，专业的权威，耿介的士人。他以国际法学术为毕生志业，生死以之。他是老派知识分子，以社会脊梁自期，眼中容不得半点苟且与宵小。执业之时，他平视权力，直言敢谏，风骨铮铮。他的座右铭“知识分子应当成为社会的良心”，正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兆杰老师更是我们法三全体同学共同的父亲。求学时，每觉他要求太高，常恐难及所望。直至离校近二十载，历经世事，方真正读懂他无论在班会还是谈心时，在那独一无二声如洪钟的教诲里，蕴藏着深不见底、无条件亦无保留的爱。李老师家客厅墙上，只端端正正悬挂两张照片——其一，便是我们法三年级那张青涩的毕业合影。师弟师妹亦言，李老师提起我们这届，语气中总带着藏不住的自豪。

原来我们，从未走出过李老师那殷切、温暖、满含期许的目光——那如同父亲般永恒注视的目光，照亮我们的前路。

恩师远去，风范长存。先生千古！

清华法三（2003级）全体同学顿首

吴大年同志逝世 享年 100 岁



江苏省教育厅离休干部、师范教育专家吴大年同志，于2025年4月22日在南京逝世，享年100岁。

吴大年，原籍上海嘉定，1925年6月出生。出生于北京市，1945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5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5年9月至1947年10月，先后在云南大学附中、西南联大附中、昆明师院附中任教；1950年2月至1956年10月，先后在常州金坛中学、常州师范、常州芳晖女中任职任教；1956年10月至1969年12月，先后在江苏省高教局、高教厅、教育厅的高教处、教学处、师教处任视导员；1974年1月至1978年12月，先后任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革委会主任；1979年1月起，先后任江苏省革委会教育局师教处、省教育厅师教处负责人、处长，1985年12月离休。

吴大年同志曾经先后参加过“一二·一”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又在教学一线和教育行政岗位上为教育事业勤奋工作长达五十余年。她勤于著述，2012年出版了回忆她学习、教学和工作经历的《跨世纪的教育情怀》；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再版了她于1939年发表、讲述1937年南京沦陷后和家人历经九个月从南京辗转逃难到昆明的经历、曾受冰心和顾颉刚等文化名人推崇的《小难民自述》；2024年出版了她回眸教育

人生、长达50万字的《百岁述往忆杏坛》，梳理总结1964—2023年发表的有关求学经历、所遇恩师、从教经历、机关工作经历、所遇众多校长教师学生和同事领导朋友的专著、文章、大事记、随笔近40篇，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念梅同志逝世 享年 96 岁



兰州大学离休干部王念梅同志，因病于2025年6月18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

王念梅，1929年12月出生，上海人。1945年7月至1946年7月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1946年8月至1949年4月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至1949年10月在青年团上海工委工作。1949年10月至1952年3月在青年团华东工委工作。1952年10月至1954年1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央团校学习兼任翻译。1954年1月至9月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1954年9月至1956年2月在鞍山钢铁总公司任翻译科副科长。1956年3月至1958年3月在北京冶金工业部建筑局任翻译科副科长。1958年3月至1960年7月在郑州七中任教研组长。1960年7月至1961年9月在郑州教师进修学院任教研组长。1961年10月至1962年9月在郑州有色冶金学院教务处任副主任。1962年9月至1965年9月在郑州大学外语系任教研室副主任。1965年9月至1971年9月在兰州大学外语教研室任副主任。1971年10月至1990年6月在兰州大学外语系任副主任。1993年12月晋升为教授，1990年7月离休。

环境工程专家胡纪萃教授逝世



我国环境工程专家、污水厌氧处理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胡纪萃先生，因病于2025年5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胡纪萃，1934年1月29日生，浙江省鄞县咸祥镇人。1959年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留校任教，先后在土木工程系、土木建筑系、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系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多次获得国家及学校奖励。1994年9月退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胡纪萃先生长期致力于废水生物处理技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特别是在废水厌氧处理领域取得了多项开创性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填补了当时国内厌氧处理技术的空白，完成了10多项科研任务，获4项专利，在国内外环境科技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70余篇。他的研究成果屡获殊荣，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3年）、技术发明奖三等奖（1998年），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二等奖（1994年、1997年2项）、三等奖（1992年），以及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等多项荣誉。他主持的国家级研究成果包括“七五”科技攻关专题《高浓度有机废水厌氧生物处理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乡有机废水厌氧生物处理机理及高效反应器的研究》和《厌氧污泥的附着及颗粒化机理研究》等。

建筑设计大师李高岚逝世



原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顾问总建筑师、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全国人大代表、

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李高岚同志，因病于2025年7月11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

李高岚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72年入职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历任技术员、建筑师、室主任兼主任工程师、副院长兼党委委员、顾问总建筑师等职务，是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的重要奠基者。

李高岚从事建筑创作秉承适用、经济、美观设计理念，一贯寻求“环境、功能、新意”三者完美结合。其主要代表作品有南京长途通信枢纽大楼、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化学楼、金陵石化大楼、南京国际商城（68层）、上海茂盛大厦、常州大厦、南京东宇大厦、西藏拉萨饭店，以及南京建设银行、江苏华泰证券大厦、江苏中保人寿公司大厦、南京市人大办公楼、南京新世纪广场（58层）、南京新街口苏宁大厦等。其中，李高岚设计的南京长途通信大楼，开中国高层建筑之先河；预制挂板形式建筑外墙，开中国装配式建筑先河。他主创的西藏拉萨饭店被誉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建筑中的杰作，项目获得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全国优秀设计最高奖——金质奖。

建筑教育家俞靖芝逝世



我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家、杰出的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俞靖芝教授，因病于2025年8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俞靖芝，1942年5月20日生于上海。1959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此后数十年，她将毕生心血与智慧奉献给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

她主持修订的《建筑初步》（第二版）成为影响深远的权威教材，推动了我国建筑学基础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她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论与实践”，两度获得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她治学严谨、关怀学生，以“春风化雨，严慈相济”的教诲方式，深受历届学子的爱戴。

俞靖芝教授长期致力于城市空间理论与实践研究。她主持完成的“城市环境的恶化及其改善”项目，获国家科委科技成果证书。合作翻译出版了国际经典著作《世界城市史》，促进了我国建筑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并积极推动了中德建筑学术交流。

在工程实践方面，俞靖芝教授主持完成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室内设计，参与了澳门厅、香港厅、常委会会议厅等重要项目设计，展现了大国气魄。她还参与完成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清华大学同方大厦、北京海淀区少年宫、珠海圆明新园西洋楼景区等项目，曾获国家教委优秀设计奖等荣誉。

● 悼念简讯

茅于杭学长（1953届电机），于2025年8月4日在澳大利亚逝世，享年95岁。茅于杭193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53年毕业留校工作。1970年自动化系成立后，从电机系调入自动化系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80年代初，茅于杭教授带领团队研发了拼音联想输入码的汉字操作系统、汉字识别技术、汉语语音合成以及机器翻译技术。1987年，他主持研发了汉盲文翻译软件，并开发出适于盲人使用的语音读屏、汉语语音和汉字输入的计算机系统。历经多年持续努力，他带领团队成功实现了相关技术的产品化，包括盲用点字显示器、带输入键的盲用笔记本等系列产品。这些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并行销国内外。

李德鲁学长（1957级硕，力学），因病于2025年7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李德鲁1957年1月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学习，1958年10月进入刚成立不久的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任教，1994年3月退休。退休前在我校工程力学系长期从事流体力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78年5月至1982年6月，历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书记。

韩旻学长（1960届电机），因病于2025年6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韩旻1937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1960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曾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地化所，1973年调回清华在电机系工作。主要从事强电流脉冲放电技术及稠密等离子体焦点等学科的研究。1983—1997年任清华大学气体放电与等离子体实验室主任。先后为本科生新开设课程“冲击大电流技术”“强电流脉冲放电技

□ 怀念师友

术”和为研究生开设课程“脉冲功率技术基础”。曾获清华大学教学工作优秀成果二等奖、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余篇，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IEEE高级会员。

董在望学长（1960届无线电），因病于2025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董在望学长生前曾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电子工程系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毕生致力于通信电路与电子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在数字音频广播（DAB）技术发展、全国高校电子技术与线路系列课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心丰学长（1965届电机），因病于2025年8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王心丰1943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5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1968年进入关中供电局（现西安供电局）工作。1978年回到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其间参与发起建立学校研究生会并担任首届校研会副主席。1981年，王心丰留在清华大学研究生处培养科工作，并担任了博士生班的班主任，参与编写了《清华大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学位工作条例》，并推广到全国高校。1986年，王心丰回到清华电机系从事电网仿真方面的科研工作，他带领团队研发的电网仿真系统应用于全国各级电网，产生了良好社会和经济效益，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刘廷文学长（1970届电机），因病于2025年7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刘廷文1946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1965年9月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1970年3月毕业留校。先后在自动化系信息教研组和电机系任教，曾担任北京市电工学会第七届秘书长。刘廷文教授长期讲授电工技术与模拟/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曾参加超声经颅多普勒血流分析仪、新型超声经颅多普勒血流分析仪、超声多普勒血流信号检测方法、颅内血流测量及脑血管成像方法等科研项目研究，共获各类奖励11项。

张思聪学长（1970届水利），因病于2025年3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张思聪1947年1月出生，福建省福州人。196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7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水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担任农田水利与水资源工程教研组主任、水文水资源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张思聪教授从事流域水文预报、水资源及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承担本科专业基础课和研究生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讲授“环境水利”“工程水文学”等课程，研究成果获得多项省部级奖励。

陈志良学长（1970届自控），因病于2025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陈志良1947年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市，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7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自1980年起，陈志良一直在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毕生致力于集成电路工艺、设备与电路设计的研究工作，主讲了研究生课程“超大规模集成网络”，作为指导教师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多次获得清华大学优秀教师奖。陈志良教授主持完成国家多项“八五”和“九五”科技攻关课题，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获得多项国家科技成果证书，是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

刚毅坚卓 奋发有为

——在2025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清华大学校长 李路明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今天，4000余名新同学来到美丽的清华园，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我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祖国西南边陲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直至1946年北上复员。西南联大是清华校史中值得铭记的特殊篇章，它让清华在战争中坚强存续、浴火重生，锻造出更加鲜明的精神品格，同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蕴含着刚健、勇毅、坚忍不拔、卓然超群等丰富内涵。镌刻着“刚毅坚卓”四个大字的纪念碑在清华园中巍然挺立，传递着穿越时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刚毅坚卓的精神彰显赓续中华文明的使命担当。大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为保留中华文脉、保存学术薪火、培育人才抗战建国，百余所中国大学冒着炮火和硝烟，几经辗转向西部和南部的大后方转移，完成了一次成建制、大规模的集体迁徙，实现了在战火中长期流亡却顽强生存发展的壮举。如此数量、如此漫长、如此曲折的大学迁徙，史无前例、世所罕见。这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为延续自身文明作出的艰



李路明校长讲话

难抉择，也是“惟我国家，亘古亘今”的独特注解。作为内迁高校的一员，西南联大“抵绝徼，继讲说”，增强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和力量。联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任继愈学长，在随近300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的途中，看到了人民生活困苦但依然积极支持抗战的景象，从“民气始终不衰”中坚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联大任教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写就《国史大纲》，发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的高呼，以此唤起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同学们，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希望你们深切领悟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做光荣自豪的中国人，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活力。

刚毅坚卓的精神撑起赤诚报国的责

□ 荷花池

任。“以天下为己任”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价值追求。联大师生时刻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纷纷投身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时代洪流。1100余名联大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保家卫国，许多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缪弘学长主动参军入伍，在1945年8月初的一场战斗中，他奋勇冲锋，不幸被敌弹击中，牺牲在抗战胜利前夕。亲赴战场的联大学子英勇报国，后方的联大师生则忍辱负重，用“上前线的激情”读书和工作，只为担负起将来建设国家的重任，“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著名物理学家、联大教师周培源先生认为“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他毅然转向在军事领域有广泛应用的湍流研究，并开设“弹道学”等课程，以物理服务国防。联大学子牢记“中兴业，须人杰”，即便要经常“跑警报”躲空袭，也如饥似渴地学习，誓要为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建设积蓄力量。同学们，爱国是西南联大的底色，也是清华人心中最深的烙印。希望你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发愤图强、实学实干，谱写爱国奉献的青春之歌。

刚毅坚卓的精神淬炼追求卓越的品质。联大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铁皮屋顶的教室一下雨就叮当作响，茅草屋顶的宿舍要挤40多人。然而，困顿的环境没有压垮师生，反而成为他们磨练意志、砥砺奋进的催化剂，激励他们勇攀高峰，做“第一等的题目”。著名物理学家、联大教师吴大猷先生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原子、分子光谱实验室，撰写出国际上沿用多年的标准专著《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他指

导联大学生杨振宁完成学士学位论文，将其引入到对称原理与群论的重要领域。这对杨先生后来的研究方向选择和学术品位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求卓越不仅要专业精深，也要广博通达、基础扎实。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联大期间发表《大学一解》，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指出“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联大要求文科学生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理工科学生必修一门社会科学课程，让学生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联大高度重视基础课，越是基础的课程，越是由著名的教授来上，为学生打牢专业学习的根基。在此教育理念的滋养下，西南联大学生中涌现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6位“两弹一星”元勋、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等一大批栋梁之材。同学们，追求卓越是清华人的人生态度，也是清华人不断创新突破的内在动力。希望你们涵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在学习科研中精益求精、日新日进，努力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贡献。

“刚毅坚卓”的精神与清华的历史和传统一脉相承，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的集中



开学典礼现场

体现。从建校伊始的“明耻图强”，到更名国立清华大学力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从“一二·九”运动中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从改革开放之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响亮口号，到新世纪“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的自觉行动，再到新时代“百年接力，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一代代清华人坚毅前行、奋勇争先，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建立了突出功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世界各国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这正是年轻一代展示才华、大显身手的好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同学们，希望你们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传续联大师生留下的宝贵薪火，勤学笃行、敢为人先，刚毅坚卓、奋发有为，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挺膺担当！

2025年8月21日

理解他人，实现更好的自己， 贡献于所有人的共同未来 ——在2025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 紫荆书院院长 张利



张利院长发言

亲爱的2025级各位本科新生、各位家长亲友，尊敬的各位老师：

能够在今天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作为一名教师发言是一个莫大的荣幸。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的教师同仁们，向“五字班”的新生同学们说：感谢你们选择清华，感谢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你们成长

经历的一部分，祝贺你们为清华人的群体注入最新鲜的活力与最蓬勃的朝气。

我自1988年作为大一新生进入清华学习以来，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一次离开清华超过一年以上。连续数十年、几乎是不间断的清华园生活并未让人对熟悉的草木屋室产生任何的厌倦，而是不断增加期待和好奇。我想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这个校园中所凝结的，是多少代清华人连接而成的自省、求索和突破的基因积淀，其时愈久，其质弥新。我想跟各位同学分享的，也正是关于这样一个不仅由物、更是由人组成的大学环境的体会。

我是在清华的大学环境中开始学会关注他人、阅读他人、理解他人，进而真正学习他人的。不论是几十年前，还是今

天，清华都为刚刚离开父母呵护的学生提供了一个知人而为善的起点。如果我们认同托尼·罗宾斯所说的“人的生活质量近同于他（她）所接触的人的品质加和”，那么，清华可能给予我们的，大概率是我们生活质量的高点之一。我记得自己当年作为北京新生，是如何在两个月时间内从频繁借故回家的“社恐”变成一个享受集体宿舍生活、乐不思乡的“社民”的。融化在日常生活里的聆听、思辨、启发、借鉴会帮助你从高中生式的孤独竞争焦虑走向成年人化的共生共赢思考。放远看，在相对狭小的空间足迹上通过深度的心智交流而推动学术高原的形成，这样的历史故事屡见不鲜：抗战后期的李庄月亮田13间房屋，同工同宿助力了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等一代宗师集体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清华主楼边的一间实验室里的“小卫星”计划，则造就了包括今天多位大学校长和两院院士在内的中国工科引领者群体。放近看，即将出现在你们身边平凡中的神奇也是忽视不得的。出现明显偏科的同学，这是好消息，因为他（她）可能是行业内下一个新赛道独角兽的创始人；出现执念学生工作热心公益的同学，这是好消息，因为他（她）可能正是未来最需要的技术管理与决策者；出现成绩总是好你一点、反应总是快你一拍的异性同学，这是好消息，因为他（她）可能是最能理解也最能激发你的人，可能是你的终生伴侣。

我是在清华的大学环境里懂得何为国际视野，何为全球胜任力的——这些都是关于跨文化的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竞争与协作的。清华自身的历史及她与祖国发展的紧密联系，要求她的任何学科

都必须具备国际化的素质。可以说，进入清华的学习，注定就是对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方法的学习，也注定承担着把中国的精神与中国的创新分享给世界人民的使命。

1997至1998年我还在读博士的时候，有幸被吴良镛先生吸纳入1999年北京世界建筑师大会的筹办学术工作队伍，在那儿经历了高层次国际学术合作的第一次洗礼。

2023年，我作为学术牵头人，与中国北京代表团的同仁们一起在哥本哈根申办成功，让世界建筑师大会在2029年再次回到北京。而这其实只是清华众多的国际交流合作当中的一个普通例子。在今天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变革、社交媒体时代的价值观冲突等挑战此起彼伏，我们总是能够听到清华各学科在世界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我们也总是能日益感知到世界上对更多的中国声音的期待。今年学校决定成立的紫荆书院，正是以清华本科教育的国际化建设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辐射的重要举措。作为紫荆书院建设的全程参与者，我的一点不成熟的观察是，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国际化是从“知己”到“知人”——也就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知人”到“知众生”——也就是要



新生参加开学典礼

了解全球不同发展水平下的丰富的多元文化，探寻教育和科学贡献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共同成长的可能性。而在这方面，可能远远不仅是紫荆书院的学生，而是在座的各位。所有清华的学生，都是这一国际化进程的参与者，也都是贡献者。

从一名学生到一名教师，我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群体在这所大学所积淀的独特的凝聚力。清华人群体是一个一旦你接近，就不会也不愿远离的群体。这个群体赋予你持续的乐观和从容，让真知、善良和美的笃信根植于你的心田，让共理心、责任心和使命感内化成为你判断与行动的自然逻辑，驱

动你的好奇心与创造力找到属于它们的理想空间，闪亮涌现，如花绽放。

亲爱的“五字班”新同学们，数年的本科学习生涯，不论其中有多少艰辛和挫折，在你随后岁月的回望中，都将是短暂而美好的，都将成为远处微笑般的窸窣光影，在你个人记忆的田野中常存。请享受这不可再复的本科时光，珍惜你前后左右的同窗学友，在从失败到成功的所有片段中，在理解他人、连接他人的所有细节中锤炼、定义更好的自己，以这样的更好的自己贡献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贡献于我们人类共同的更好的未来。

2025年8月21日

蒋南翔的精神传承与新时代启示

○杨宜勇（1980级机械）

2025年4月，由邱勇书记作序、向波涛常务副书记主编的《唯实求是 素志永笃：纪念蒋南翔同志诞辰110周年》新书已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作者之一，我有幸先睹为快，不仅使我对蒋南翔同志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收获颇丰。通过深入探寻蒋南翔同志的人生轨迹与卓越贡献，他的革命精神、教育思想以及独特人格魅力，皆给我带来了深刻的触动与启示。

一、他的革命精神 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灯塔

书中强调了蒋南翔同志“唯实求是”的精神，这是他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在工作一贯坚持的原则。蒋南翔同志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姿态，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他怀揣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热爱，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中，还是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坚守信念，

不屈不挠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他的革命精神，犹如一座灯塔，为后人照亮前行的道路。在当下，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它提醒着我们，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要坚定信念，勇于担当。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科研工作者们面临着诸多技术难题和竞争压力，蒋南翔同志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他们像革命先辈攻克敌人堡垒一样，不畏艰难，勇于探索，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这种精神都在鼓舞着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拼搏奋斗。

二、他的教育思想 是引领清华发展的智慧源泉

书中讨论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蒋南翔同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如何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需求。蒋南翔同志在教育领域的贡献堪称卓越，其教育思想如璀璨星辰，深刻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他所倡导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握。“红”，强调品德修养，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以及正确的价值观，使学生具备为国家和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操；“专”，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要求学生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发展贡献专业智慧。这一方针全面涵盖了教育的育人目标，凸显了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栋梁。对于当代教育工作者而言，蒋南翔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重要的行动指南。它提醒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不能仅仅关注学生的学术成绩，更要注重品德培养。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可以融入思政教育元素，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学生来说，这一思想引导他们全面发展，不仅要在学业上努力进取，还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关心国家大事，培养良好的品德和综合素质，为将来步入社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三、他的音容笑貌 是人格魅力铸就的精神丰碑

书中还强调了蒋南翔同志的个人品质，如他的坚定信念、无私奉献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为群众办实事！”蒋南翔同志的人格魅力与亲和力，宛如一股春风，温暖着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他的音容笑貌，承载着亲切与关怀，深深烙印在师生们的心中，赢得了大家由衷的爱戴与尊敬。在校园里，他以平等、谦和的态度与师生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种平易近人的待人方式，营造了积极向上、和谐融洽的校园氛围，让师生们感受到关怀与支持，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和工作热情。他的人格魅力不仅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更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在当今社会，无论是在校园环境还是职场环境中，具备良好的人格魅力都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促进团队协作的重要因素。蒋南翔同志的榜样力量激励着我们在与人交往中，要尊重他人、关心他人，以真诚和善意待人，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人格魅力的传承，有助于构建更加温暖、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融洽，共同为社会发展凝聚力量。

皆取其妙，美美与共

○郭 樑（1981级电机）



唐
前
锋
自
画
像

本文是清华校友总会原秘书长郭樑为唐前锋《生于1968·我的清华》等三部系列漫画图书所作的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当一个人身上附以“清华人”的标签时，可能他随后的一生都会深受这个标签的影响，因其而身负期待，因其而骄傲奋进，因其而坚韧自律。

清华校友们，不自觉地会将自己纳入时代语境下的社会角色，成为清华精神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唐前锋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两年前，五十多岁的他还因为打网球拼到骨折，这个劲头真的很“清华”。

唐前锋毕业于广东佛山石门中学，1986年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后却选择了与专业毫不相关的设计工作，40岁又重新踏入所学专业领域创业，并在几年时间内让产品取得国际领先的地位。

但是包括我在内的校友师生们对唐前锋的关注以及期盼，却是他的漫画。

从2011年至2016年，唐前锋先后出版了《生于1968·童年》《生于1968·中学》

《生于1968·我的清华》三部漫画图书，我还为《生于1968·我的清华》作序。如今，终于迎来再版新作。

唐前锋是精仪系校友，大学时开始自学钢笔画，最终能成为一名获得世界漫画大奖的漫画家，看似不可思议，却又合情合理。精仪专业要求细致的观察和严谨的绘图能力，这些功夫极深的专业素养，只需被唐前锋稍稍挪用转化，便能迅速助他成为另一领域的高手。

唐前锋自己说，作为严谨的理工男，有追求真实的一面，但如果是跟照片完全一样的效果就没有意义了。照片可以轻易实现的又何必费工夫画出来呢？画得再像也只是个工匠而已。

他认为艺术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创造力，这跟科技的关键是要创新一个道理。创作，就应该与众不同，要有照片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他追求的是既像照片但细看起来跟照片又不一样。

常规的钢笔画一大特点就是线条。用线画出轮廓线，用疏密不一的排线表达出不同的阴影。但他的钢笔画里没有线条，或者说是力争没有。线条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他不想加上人为的线条，包括轮廓线与表达阴影的排线，就另辟蹊径，以面来表达。

唐前锋认为自然界最动人的是丰富的光影变化，他希望以纯粹的黑白面来画大自然，以非黑则白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光影，这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尝试，并揣摩出观者的视觉延伸经验想象。当然，采用这种画法有时候也得做出些让

□ 荷花池

步、妥协，否则无法完全正确地把景物表现出来。

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创新画法的问题，他则说艺术需要多元，太单一或都从众就没意思了。看古典音乐既有《命运》《自新大陆》这些大众习以为常的交响乐，也有《波莱罗舞曲》《蓝色狂想曲》这种另类的作品。画画也应该如此，即使其效果见仁见智也是值得的。

唐前锋这种黑白对比强烈的画法，特别适宜于阳光灿烂的建筑场景，或者是雪景的表现，之前出版的《生于1968·我的清华》中唐前锋的一些钢笔画作品，有读者误以为是照片处理出来的效果，本次再版，他特意附上几幅创作过程图加以说明。本次再版，唐前锋还增加了一些场面宏大的大景作品，如无人机在空中俯瞰，让整部书具备了更为丰富的艺术视角。

以唐前锋严谨的治学习习惯，为了做好创作，他深入认真研习钢笔画、漫画各国各家所长，并迅速形成自己的判断和风格，最重要的是，他始终未被技法所困，

追求的是回忆真切、笔下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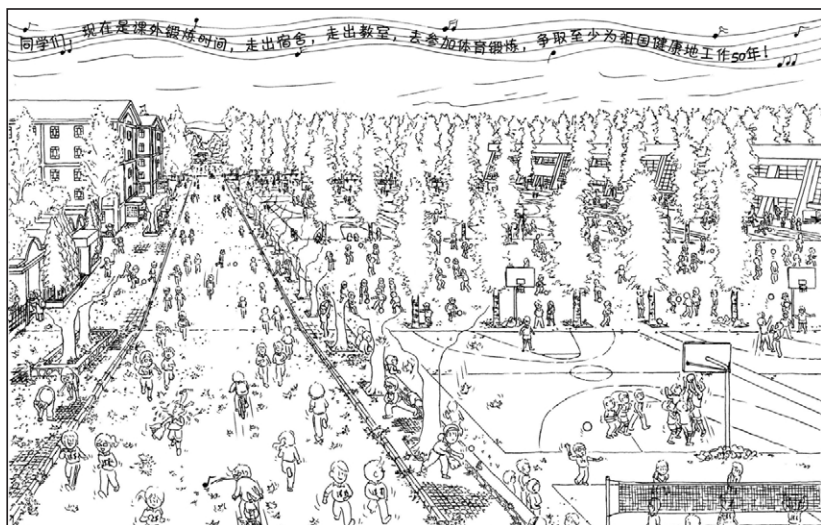
同唐前锋钢笔画丝丝入扣的绵密笔法不同，他的漫画则尽显抽象的意趣，寥寥几笔便能将人物传神，让场景到位，让读者立刻穿越到彼时的情境当中，似乎能感受到现场的风声语声欢笑声。加之其精仪专业强悍的细节观察能力，往往能将别人忽略的细节诉诸笔端，让作品展示出细腻丰富的内容，呈现十足生机。

从《生于1968·童年》到《生于1968·我的清华》，唐前锋描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经历，更是个体视角下的时代记录。他不像丰子恺的哲思、华君武的讽刺、蔡志忠的阐释，而是白描式的真实且鲜活的记录，如大数据般情境再现，似电影分镜场景。而实现这些，人生亲历、洞察能力、绘画功力缺一不可，还好有唐前锋这个理工系的“文艺男”。

如今的唐前锋留着些许白胡子，配以圆黑眼镜框，艺术气质十足。他现在已经

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的领军人物，还能抽出时间绘画、出书，虽然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我认为可能也是相得益彰。李政道先生认为，科技和艺术一定会在顶峰相见。服务于人体的科技和服务于精神的艺术，某种意义上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愿前锋皆取其妙，美美与共。



《生于1968·我的清华》 ——作品选登——

○唐前锋（1986级精仪）



二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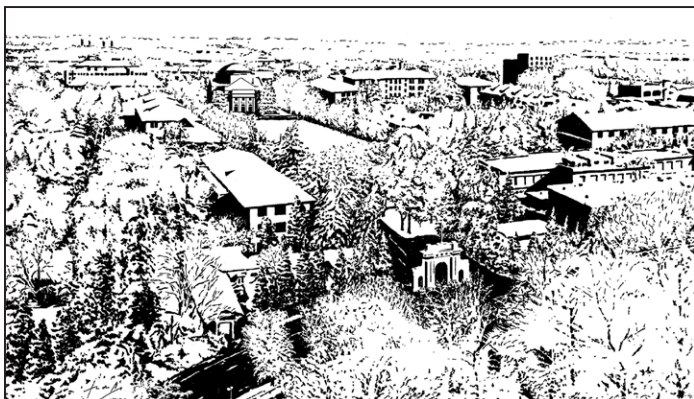
科学馆



闻亭



文科图书馆



春分春雪清华园

● 清华真情

最爱清华图书馆

○姚 坚（1980级自动化）

对1980级校友们来说，2025年校庆有着特别的意义，是我们毕业四十周年的大日子。45年前，我们在清华园相识，如今大家又热切地相约回到这里。毕业40年了，清华园里最值得我们回忆的是什么？想起了杨绛先生的话：“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学校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一、以班为单位向图书馆 捐赠阅览桌椅

相信大多数同学们是认同杨先生的话，或者说图书馆是1980级同学情之所系的“最大公约数”。十年前的2015年，当我们迎来毕业30周年前夕，1980级史宗恺等同学提议，争取以班为单位向图书馆老馆捐赠阅览桌椅。这一提议得到了当年毕业的18个院系、65个班级近1900名同学的热烈响应，同学们选择以这种方式回馈母校的培养，为清华人文精神的传承贡献绵薄之力。经过1980级工作小组的勤力工



2018年4月，捐赠小组部分成员回访查看捐赠的阅览桌椅

作、全年级同学的积极响应，向图书馆老馆捐赠的全部68套阅览桌和约600把阅览座椅，于2017年10月在老馆安装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期间正式投入使用。

今年春节假期过后一个冬日暖阳的上午，我从西门入校去学校图书馆重温往日记忆。寒假中的同学们还没有返校，西门向南排着一条蜿蜒的长龙是预约入校参观的人流，校园里到处是前来游览参观的家长 and 四处奔跑、欢声笑语的中小学生。在图书馆老馆的大台阶前注目良久，那扇永恒记忆的大铜门敞开着，四十多年前在图书馆翻阅检索目录卡片、借阅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集》时的情形，幡然映入脑海。正在犹豫之间，一位值班校工指着二楼入口右侧一个扫码盒说：“校友卡可以进馆。”

进入图书馆老馆中庭，经过1958届校友捐赠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石碑墙，就来到左侧第三阅览室了。大阅览室高大深远，如同知识的海洋恢弘无际。我静静坐了下来，回望着四周高耸的旧式书柜和历经百年的各种工具书，一缕阳光映照在书桌旁年轻同学身上，找寻着大书桌侧旁标刻着自己班级的名称，心中泛起丝丝温暖与自豪。经过四年整修的老馆“修旧如旧”重新开放，第二阅览室和第三阅览室摆放着由1980级捐赠、一如以往的长条书桌和旧式圈椅，又配上了当年式样的绿色台灯，映衬着阵阵书香。书桌上平滑整洁，并未安置充电插头接口，图书馆老师说：“希望在这里回归最本质、最

纯粹的读书环境，身边有书，窗边有树，俯仰之间皆是慢下来的沉静。”

二、老馆——“那祥云缭绕的地方”

上学的五年间，图书馆还只有被称为老馆的这一部分。1914年，时任校长周诒春聘请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制订校园规划，并设计了建校初期的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四大建筑”。1916年4月，图书馆一期即老馆东翼启动建设，由1910年庚款留美生庄俊任驻校建筑师。图书馆老馆一期于1919年3月建成使用，是一座坐东朝西的二层建筑，背后是三层书库。书库的透明玻璃钢地板，至今仍是许多前辈校友记忆深刻的回忆。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馆舍不敷使用。老馆二期工程始于1930年代初，由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师杨廷宝先生主持设计建造。时任校长罗家伦希望在扩建书库的同时，要建造一个大阅览室，他说：“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够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二期工程续建了如今老馆的西翼及45°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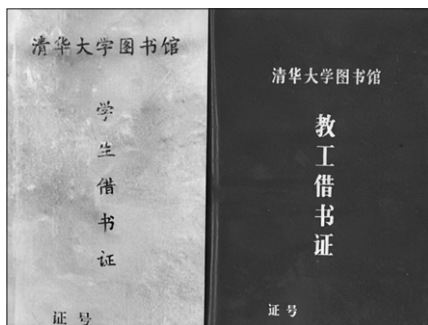


拍摄于1934年的图书馆老馆阅览室

角的中部大厅。建成后的正门放在中部大厅，从大台阶可以直上二层，当年颇为壮观。二期西翼新建部分与东翼一期皆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被称为“扩建设计中的一个罕见的范例”。

二期建成后，老馆馆舍面积也增至7700平方米，阅览座位700余席。图书馆老馆前后两期建筑组合起来构成的“L”型围合，很好地将位于校园中心的大礼堂拱卫衬托起来。老馆不仅建筑精美，还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季羨林先生说：“就图书馆而论，在当时一直到今天，他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的。光是那一座楼房建筑，就能令人神往。淡红色的墙上，高大的玻璃窗上，爬满了绿叶葳蕤的爬山虎。”历届图书馆馆长均由学术地位很高的学者担任，如文学家朱自清先生、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1933届外文系万家宝学长也就是后来成为剧作家的曹禺先生，曾在回忆的文章里提到，创作《雷雨》时“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快快走出”。

记得40多年前自习教室座位紧张，老馆成为同学们争占自习座位的首选。考试前还出现过早上六七点钟先去图书馆排队，再去吃早餐的情况。当然，记忆最深的还是图书馆的学习阅读氛围，先上大台阶走进大铜门，进去便是一个优雅的世界，左手边是望不到底的大阅览室，书桌上满是图书和书包，场景感人又催人。1951届外文系宗璞学长将老馆称为“那祥云缭绕的地方”，她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喜欢那大阅览室，这里是那样安静，每个人都在专心地读



20 世纪 80 年代的图书馆借书证

书，只有轻微地翻书页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老馆中庭一层是书报期刊阅览室，是大家晚自习结束后常去的地方，很多文学、科普、体育期刊广受欢迎。我们班有几位同学晚自习后，常去此处翻阅报刊了解国际时事，然后成为当晚宿舍卧谈的新闻谈资。

老馆不仅见证了一代代学子的成长，也见证了清华乃至民族的磨难与兴衰。抗战爆发前，在朱自清带领下曾将417箱重要图书资料整理打包后，经清华园火车站运送南下，1938年历经战乱又艰难地由武汉辗转运至重庆，保存在专门开凿的防空洞中，有部分还因战火和灾害损毁。李学勤教授曾回忆说，80年代曾在一排书架边看见一叠线装书，最上一册已烧掉一半，其封面有叶企孙先生毛笔题辞，说明是抗战内迁时被日军炸毁的孑存。老馆还一度落入日寇手中作为兵站医院，馆内藏书被抢一空、一本不剩，老馆被洗劫破坏得遍体鳞伤。陈岱孙先生作为当年负责接收的清华保管委员会主任回忆说，当时图书馆阅览室的桌椅已荡然无存，所幸在楼下如获至宝地发现了一张原来的椅子，以此为模型让阅览室恢复了旧观，至今仍保持着原样。

图书馆的“祥云缭绕”成就了一代代清华人。曾任校党委书记的方惠坚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说：“阅览室里除了能够听到翻书的声音外，几乎听不到别的声响，周围同学和老师都在专心地学习，也给自己很强的感染，督促你要集中精力好好学习，是在清华学习过的校友终生难忘的。”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清华承担起培养国家建设栋梁的重任。1958年学校提出要结合国家发展需要，在毕业班搞“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并在图书馆大阅览室举办了毕业设计展览，集中反映同学们的成果。1958年8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专程来到图书馆，在蒋南翔老校长陪同下观看各项成果，还站在图书馆的大台阶上，对聚集在馆前的1400多名毕业生发表讲话，最后用“前进，前进，再前进！”鼓励同学们。

三、新馆——“清华人文精神的传承”

在“文革”岁月，图书馆一度人去楼空，“关门歇业”长达四年之久。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图书馆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1982年，学校启动了图书馆三期工程（新馆）扩建规划，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邨先生主持设计。当年负责新馆建设的校领导艾知生老师曾在新馆选址会上说：“把清华旧区建成建好，是每个清华人的共同愿望。”80年代启动的图书馆新馆最终选址在老馆近旁西北侧，在当年“三院”的旧址上向西向北延伸。新馆建成后不仅能使校园西区面貌得以整体提升，以大礼堂为中心的校园西区更加完美，也让广大校友记忆中的校园西区和心之所系的那份美好得以延续。

图书馆新馆于1991年9月正式落成，

被命名为“逸夫馆”，建成后面积达到老馆的三倍，有2800多个阅览座位。新馆设计以“尊重历史、尊重环境、为今人服务、为先贤增辉”为设计理念。关肇邨先生说：“对于广大清华人特别是海内外校友来说，大礼堂的石柱圆顶和它附近绿树掩映的灰瓦红墙，才永远是他们心目中的清华园情怀之所系。”新馆同老馆保持着风格上的一致，使用了与清华老建筑相一致的红砖灰瓦，工程设计主持人、建筑系叶茂煦教授曾回忆说，60年后扩建新馆，“别无选择只能沿用和老馆相一致的清水红砖墙，最后设计师与施工人员配合共同上窑找砖，直至烧出的砖在质量、规格和颜色上能与老馆相媲美”。

新馆和老馆之间的那份和谐，体现出清华人文精神的接续和传承。新馆将低层部分布置在与老馆相望的前方，将高大的主体部分适当后移，避免突出新馆而置老馆于从属，同时将新馆主入口隐蔽在半敞开的庭院中，让老馆的主入口依旧得以彰显。新馆入口坐西朝东，与1916年建成的老馆一期入口遥遥相望，仿佛是跨越百年时空的一场清华人文精神对话。而百年时空，在新馆入口庭院中央放置的1922级校友捐赠的青铜喷泉，象征着图书馆始终是一代代校友的“知识之泉”，涓涓细流，绵延不断。

四、“最爱清华图书馆”

进入新百年，与新馆接续建设的图书馆李文正馆于2016年初落成，成为清华图书馆最新落成的部分。李文正馆也被称为北馆，地上5层、地下2层，向西与西大操场隔路相望，向北对望1934年建成的学生宿舍新斋。如今，李文正馆与图书馆原有

的老馆、图书馆三期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现代化的一流大学图书馆。同时，1980级校友的捐赠也得到了持续接力，2001级、2002级的校友们以班级为单位，在北馆宽敞、明亮、温馨的阅览环境中，接续捐赠了具有清华特色的老馆同款桌椅，此后2018年12月12日，由秩年校友捐赠的清华大学音乐图书馆面向读者开放，成为清华师生开展艺术学习与欣赏活动的重要阵地。

随着清华文科的逐步复建与发展，人文社科图书馆于百年校庆期间落成并投入使用。文科图书馆的主设计师是瑞士建筑师马里奥·博塔，整个建筑形如一把钥匙，位于校友们颇为熟悉的三教北端，坐落在我们读书期间的东区地下食堂原址上。文科图书馆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地下2层、地上5层，700多席阅览座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华文科的发展壮大。在法学院做博士论文期间，我曾多次在文科图书馆查阅资料、借阅图书，对图书馆优越的条件和环境感触颇深。

目前，图书馆总馆与文科图书馆及美术、金融、法律、经管、建筑等6个专业图书馆共同构成学校的图书馆体系，馆舍总面积7万余平方米，阅览座位约4000席，达到80年代老馆面积的十倍左右。如今图书馆每周开放借阅98小时，自习教室每周开放105小时，更为巨大的变化是电子资源已成为最主要的资源方式，为广大在校师生和校友们提供了服务更温馨、设施更完善、智能更充分、充满吸引力的学习、研究和交流环境。

从1912年清华学校设立图书室算起，清华图书馆已经走过113年的历史。如今，图书馆已成为清华园内当之无愧的标

□ 荷花池



1980级捐赠小组成员与时任馆长
邓景康（中）合影

志性建筑群，也早已成为一代代校友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图书馆在发展中不断得以扩建，每一步扩建既尊重历史，又与时俱进、人文日新，从一个视角延续了百年清华的人文精神和学术传统，成为广大校友心目中最温暖、最神圣之所在。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正如清华校歌所颂唱的

那样，一代代校友在图书馆中，置身浩瀚书海，敬业乐业、恬淡独处，获取营养、探索未知。让我们在颂唱校歌的同时，也记住那些为校友们服务过的一代代图书馆人：1980年代我们在校时期的馆长史国衡老师，读研期间的馆长顾廉楚老师，改革开放后第六任馆长邓景康学长，等等。

曾任职清华图书馆主任的戴志骞先生是中国新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他早在1918年就提出“图书馆为终身学校”的理念。他曾说：“学校即教育之初步也，教少年人民以温故知新之识。然学校不能教育国民之终身，人人有出学校之一日。如要国民有终身智力生长之机，除图书馆外别无较良美之法；故图书馆可称国民之终身学校也。”每位校友毕业之后，无论在教学科研、工程实践、公共服务中，还是进入自由人生或退休阶段，我们每个时期均与图书馆联系着。让我们记住前辈的话语，终生学习、服务社会、享受人生。

郝锁柱老师捐款支持《清华校友通讯》期刊工作

2025年6月16日，体育部退休教师郝锁柱来到新林院7号，向《清华校友通讯》捐款1万元，用于支持期刊的工作。

《清华校友通讯》执行主编曾卓崑代表期刊接受捐赠并向郝老师表示感谢。

郝锁柱老师1967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1973年开始为学生教授体育课。他的专长是足球，同时也擅长游泳、田径、武术、滑冰等。他先后担任过男、女足校队教练，曾带领清华女足荣获了两次全国比赛第三名。如今，84岁的郝锁柱老

师，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依然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和旺盛的精力，每天坚持游泳和练习健身功法等运动使他显得额外精神。

郝老师从八九年前开始阅读《清华校友通讯》，最初被期刊中体育教育对学生毕业后产生的影响所吸引。他说：“很高兴看到校友们保持着良好的运动习惯。

《清华校友通讯》是一份传递正能量的好刊物，在国内外都有发行，通过校友故事弘扬了清华的优良传统，扩大了清华体育的国际影响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了清华力量。”
(李 萍)

● 诗词书画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吴硕贤（1970届建筑）

当年灭寇扭乾坤，遂使神州万代存。
中外同盟驱虎豹，军民团结撼昆仑。
坚持八载明忠义，激战多番振国魂。
胜利凯歌今再奏，江山壮丽世皆尊。

贺清华百十四华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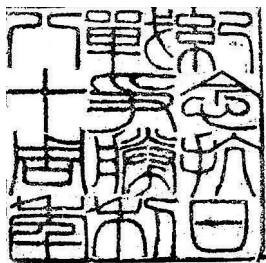
○胡平（1970届工化）

清华四月艳阳天，紫簇荆云映晓烟。
肃穆黉门传圣火，峥嵘世纪铸宏篇。
零零阁瞰星河灿，鼎盛兄谐禹甸贤。
伏枥八旬春未老，龙吟再起向峰巅。

七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八十周年

○王伯雄（1970届精仪）

卢沟桥上战旗扬，抗日烽烟起四方。
国土沦丧流血泪，九州奋起打东洋。
前仆后继舍生死，敌忾同仇齐救亡。
八十春秋换天地，中华豪迈展辉煌。



篆刻 ○王伯雄（1970届精仪）

唐多令·清华园

○殷惠民（1981级物理）

碧草带芳林。荷塘月色深。
器识先，学海惟勤。
珍惜光阴不虚掷，
齐家国，结同心。
泰斗耀乾坤。青蓝奋斗魂。
矢以忠，学贯古今。
致远笃行风雨共，
平天下，为人民。

入学清华六十年聚会感怀

○姜大源（1970届自控）

荷帙黉门六秩前，重逢凝睇泪潸然。
促膝畅叙青葱事，把袂倾谈皓首缘。
格致求真循轨范，厚德立世守箴言。
韶颜虽改心依旧，伞寿归来尚少年。

望海潮·入学六十周年感怀

○徐友春（1970届精仪）

心怀理想，京城寻梦，与君相聚同窗。
籍海泛舟，求知索技，紫荆相伴书香。
身影映荷塘。友情温馨忆，岁月绵长。
奉献青春，天空仰望，奔前方。
清华六秩情扬。盼芳菲四月，欢聚学堂。
思念往昔，重游故地，校园尽展辉煌。
名校有担当。老骥丹心在，体健安康。
微信常传问候，共度好时光。

● 回馈母校

吕大龙校友向清华大学 捐赠仪式举行

6月10日，吕大龙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仪式在工字厅举行。本次捐赠将支持清华大学设立“学生紧急救助项目”，帮助因疾病、意外伤害、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变故而陷入困境的学生渡过难关。1978级校友、清控银杏创始合伙人、联席董事长吕大龙，校长李路明，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白本锋等出席仪式。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主持仪式。

吕大龙分享了自己求学时的经历和感悟，对学生在学术发展和个人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感同身受。他表示，希望尽己所能帮助正处于适应期或面临困境的学生，让他们安心完成学业，未来也将持续关注和支持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助力每一位清华学子都能在健康平安的基础上实现人生理想。

李路明代表学校感谢吕大龙校友对母校长期的关心支持和多次慷慨捐赠。他说，吕大龙校友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树立了回馈

母校、造福社会的榜样。学校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完善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成才的支撑保障体系。此次捐赠将为“学生紧急救助项目”注入源头活水，精准支持帮扶更多身处困境的学子坚韧地面对挑战、追求梦想，努力成为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学生部部长、武装部部长赵岑介绍了清华大学学生资助工作的基本情况。他表示，此次捐赠显著提升了学校在学生紧急救助方面的保障力度，相关部门将不断提高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实效性，将每一分钱用在同学们最需要的地方。

1980级校友、清控银杏创始合伙人、董事长罗茁，研工部、教育基金会相关负责人等参加仪式。
(基金会)

孙家广院士捐赠仪式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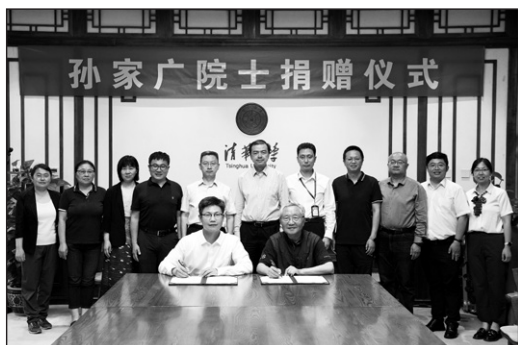
6月24日下午，孙家广院士捐赠仪式在工字厅举行。1970届自动控制系校友、软件学院教授孙家广院士，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向波涛出席仪式。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赵劲松主持仪式。

此次捐赠将用于设立“清华校友—孙家广励学金”，旨在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激励；设立“清华校友—软件学院孙家广奖学金”，用于支持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的人才培养，奖励软件学院及其他院系致力于软件工程专业学习的全日制在读优秀学生。

孙家广院士表示，作为入



签署捐赠协议



签署捐赠协议

学清华60年的老校友、老教师，很高兴能为学校、为学生培养做点事。清华大学肩负着历史的使命、百姓的信任，应该努力把学生培养好。软件学院要努力培养学生做出能用、管用、好用的软件，形成新质生产力，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未来希望能继续尽己之力，为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作贡献。

向波涛表示，孙家广老师的慷慨捐赠不仅是支持学校办学、学生成长的物质财富，更饱含对清华学子的拳拳深情与厚望。校友励学金是清华精神的传承，也是校友参与和支持母校人才培养的直接渠道，体现了广大校友“爱国奉献，爱校感恩，爱友互助”的精神面貌。相信有孙家广院士为代表的教师和校友发挥表率作用，一定会激励和支持学校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做得更好。

软件学院院长王建民表示，作为捐赠的受益单位，软件学院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一定不负期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孙家广院士和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计经纬共同签署捐赠协议。向波涛为孙家广院士颁发捐赠证书。软件学院、校友总会、教育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参加仪式。

（关悦）

计算机系举行郑纬民 奖学金启动仪式

7月1日，计算机系在自强科技楼举行郑纬民奖学金启动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机系高性能所教授郑纬民，计算机系党委书记贾珈、党委副书记赵颖，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任艺林，以及评审委员会代表、捐赠企业代表等参加仪式。计算机系高性能所副所长钱学海主持仪式。

郑纬民院士回顾了自己的科研生涯和从教心得，表示科研探索之路复杂多变，希望年轻师生发挥清华人的使命担当，始终将科研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勇于挑战“卡脖子”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难题，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创新。

贾珈表示，奖学金的设立既是对郑



与会人员合影

纬民院士学术精神和育人情怀的致敬，也是对优秀学子勇攀科研高峰的激励。希望年轻学子们以郑纬民院士为榜样，潜心治学、锐意创新，赓续并传承好计算机系的学术薪火。

北京长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朱文雷（2008级计算机），上海全量全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法务副总监李静恬，北京海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EO杨再飞，无相智研（贵州）科技有限公司CEO黄柯作为捐赠企业代表发言。朱文雷校友表示，他曾于高性能所求学多年，希望通过捐赠奖学金助力母校教育事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福新、计算机系高性能所教授汪东升作为评审委员发言。计算机系高性能所所长翟季冬介绍了郑纬民奖学金的设立背景和相关章程。该奖学金由郑纬民院士的学生捐赠发起，由个人与企业共同资助筹集。

（计算机系）

“清华校友—龚晓南土木工程启杰优秀大学生奖”设立

2025年6月7日，“清华校友—龚晓南土木工程启杰优秀大学生奖”设立仪式在清华大学新土木馆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土木系1967届校友、浙江大学教授龚晓南一行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聂建国，土木系教授宋二祥，土水学院院长吴璟等出席仪式。

龚晓南回顾了清华园度过的难忘岁月，表达了对母校悉心培养的深深感激。



捐赠仪式现场

他详细介绍了捐资设立“清华校友—龚晓南土木工程启杰优秀大学生奖”的背景与初衷，期望通过这一奖项，激励更多清华土木学子胸怀家国天下，脚踏实地钻研，矢志追求卓越，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吴璟高度赞扬龚晓南院士心系母校教育事业的赤子情怀。他强调，龚晓南作为清华土木人的杰出代表，其成就与精神是学子们的宝贵财富。这份奖学金更是一种精神传承，将有力激发土木学子爱国奉献、实干创新的热情。

聂建国总结发言，他对龚晓南情系母校、设立奖项培养人才的行为表示高度赞赏，同时向龚晓南介绍了清华大学土木学科近年来立足国家重大需求的新发展，对以龚晓南为代表的杰出校友关心与支持母校的发展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华校友—龚晓南土木工程启杰优秀大学生奖”的设立，是清华校友“爱国奉献、爱校感恩”精神的生动写照。它不仅为优秀本科生的成长提供了新的助力，丰富和弘扬了清华土木人“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精神谱系，更在清华土木学子心中播下了传承薪火、报效祖国的种子。

（土木系）